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目录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关于作者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致谢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封面说明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概述

中国灵魂争夺战

一个加入了道教的学生不知道何时能被接纳为道士。几十名基督徒被禁止庆祝圣诞节。藏人喇嘛在“爱国再教育”学习班被迫学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一名维吾尔农民因为在野外祈祷而被判九年徒刑。东北一名四十五岁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拘留几天后死于看守所。

这几个例子显示了中国的信徒们在寻求和平地实践其信仰时所遭遇的障碍，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多方位控制的结果。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方法，共产党的政策旨在限制信仰群体的快速增长，根除某些信仰和修行，但同时又利用宗教的某些特点，为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当局加强了对宗教的限制，宗教迫害整体来说趋于上升。但是信仰者的抵程序度令人意外，包括一些一直以来与党和政府官员保持着合作关系的信仰群体。

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宗教迫害整体来说趋于上升。

不断升级的打压以及抵抗显示了中国当局宗教政策根本上的失败。这些打压不仅没有能够阻止宗教的自然扩展，并将其置于政治控制下，共产党严厉的控制措施反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黑市，强迫很多信仰者法外运作，并视中共政权为一个不讲理、不公正或不合法政权。

本研究报告详细考察当今中国宗教复兴、打压和抵抗的动态，它们最新的变化以及更加广泛的意义和影响。这份报告着重考虑七个宗教群体、涉及共三亿五千多万信仰者：它们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佛教（中国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以及被取缔的法轮功。法轮功是被禁止的几个气功修炼者群体、新宗教运动以及半基督教群体中最大的一支。

不管是哪个宗教，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精神复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则依据地点、民族、与教派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地方，普通的信仰者并不一定感到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当局甚至对某些活动提供积极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中国官员禁止信仰者庆祝节日，破坏敬拜场所，使用致命的暴力。在全国不同地方，安全力量逮捕、酷刑或杀害各种信仰者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一个群体或个人受到什么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视他们为多大的威胁、或者对党的利益有什么好处，但也取决于当地官员的态度。

非暴力形式的控制更为普遍，但是对许多信仰者来说，这样的控制仍然非常令人反感，直接侵犯宗教组织的内部功能。这包括对宗教领导人进行审查过滤，看他们是否政治上可靠；对新的寺院或神职人员的人数进行限制；根据党的需要对宗教教义进行操纵等。对私人敬拜进行的深入监视、“再教育”运动、以及对私人敬拜的限制影响了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精神生活。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经济报复和盘剥导致紧张气氛，并催化抗议。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扩大了许多这样的做法。原来非正式的限制现在变成了法律。对未注册、或甚至国家承认的敬拜场所与宗教领导人的打压有增无减，好几位神职人员被判处很长的监狱刑期。对儿童参与宗教生活的限制变本加厉。本报告中所考察的宗教群体中，有四个群体所经历的迫害更加严重：新教基督徒、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和回穆斯林。

然而，在令人意外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变化。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回暖，中梵有可能就任命天主教主教达成协议。这样一个协议将移除中国教会中一个主要的争议来源。法轮功学员尽管仍然受到严重迫害，但是在许多地方，随着一些主导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在党内斗争中遭到清洗，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所缓和。另外，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在草根阶层多年不懈地与低层官员接触，也转变了后者当中一些人对法轮功的态度。

共产党将其控制强加于各种信仰和理论之上的努力在重要的方面难以成功，或适得其反。

所有信仰群体的成员在应对官方的控制时都显示出了创造性和勇气，有时还获得相当瞩目的胜利。不管每次较量的结果如何，显然的一点是，共产党将其控制强加于各种信仰和理论之上的努力在重要的方面难以成功，或适得其反。

共产党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消灭的宗教组织、信仰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获得了更大的传播。这标志者共产党在打压能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失败。与此同时，官方的行动在信仰群体中激发了怨气、不服、和倡导活动，而这些人本来不带政治色彩，对共产党统治也基本上满意。

这些动态和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政策范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总体上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放眼未来，习近平和他的同僚面临一个重大选择：他们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松宗教控制呢，还是继续强力推动这个对政权的长远合法性和稳定性构成威胁的打压和抵抗模式？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精神之战的最终代价如何，将取决于中共领导人的决定。

几千年以来宗教和精神深刻地存在于中国文化和身份认同中。这个事实对1949年掌握权力、并誓言为无神论者的中国共产党构成一个挑战。在执政几十年里，它对待宗教的策略起伏跌宕。

总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宗教现实的交锋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年），共产党采取了极端措施消灭宗教。成千上万的寺院、教堂、清真寺被毁灭，和尚被还俗，难以数计的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被投入监狱、遭到酷刑、被杀害。

毛泽东去世后，1982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文革时期消灭宗教的政策。³相反，它寻求通过管制去管理宗教，利用宗教的影响力去达到党的其它目标，同时压制宗教对党的权威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这一做法的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封建”宗教思想必将消失。

“[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团结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

—习近平，2016年4月¹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道教创始人²

然而三十五年过去后的今天，共产党领导人面临一个难题：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预言被证明十分不准确。尽管自19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以及人均收入取得了爆发性增长，宗教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消失。相反，各个宗教都在经历不同寻常的复兴和扩大。今天，中国有至少三亿五千万信仰者，另外成千上万的人从事不同形式的心祷活动与民间宗教仪式。许多信仰者说，他们寻求属灵的慰藉和引导，以便应对超物质主义现代环境下的生活。

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采取了管制、适应、和压制相结合的手段对这个难题做出回应。2012年上任的习近平以及他领导的本届中共中央常委会也不例外。事实上，从他的言论和行为看，习近平提高了“宗教工作”在党的议程上的位置和重要性。⁴

本报告研究这些动态变化，它们对理解当今中国至关重要。本报告评估宗教复兴的状况，当局控制宗教的多方面做法，以及宗教群体的各种反应。本报告尤其着重于习近平上台头四年的做法，所研究的对象则包括七个主要的宗教群体：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藏传佛教、和法轮功。本报告试图帮助理解以下问题：⁵

- 在今天的中国，精神领导人和信仰者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和机会是什么？
- 自从2012年以来，党国宗教政策、管控方法、实施情况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 哪些因素在驱动这些变化，在应对每个宗教群体时，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达到

江苏省一个景区内的寺庙上挂着的横幅：“学习、宣传、贯彻宗教法规规章，维护宗教和睦，促进社会和谐！”

图片来源：Kuei-min Chang



了它的目的？

- 这些动态对中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带来了什么影响？

在准备这份报道的过程中，自由之家的分析员考察了数百份官方文件和讲话、法庭判决书、媒体报道、以及学者、智库和人权组织的研究，有中文

的，有英文的。分析员还对中国境内外大约三十名律师、宗教领导人、和尚/喇嘛、草根活动者、评论人士、以及学者进行了访谈。我们还吸取了参与本报告撰写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顾问在中国境内所做的田野观察。⁶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支柱

随着中共领导人接受了宗教在中国社会持续存在并明显扩大这个事实，他们制订了复杂的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共产党统治谋取利益，同时把威胁压至最小。从实施情况看，这个战略有四大支柱：

- **机会主义的利用：**收获宗教的好处，为推进中共更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服务
- **‘依法治国’：**建立法律和官僚建构来控制宗教行为和宗教机构
- **有选择性地消灭：**严厉打击那些被认为威胁党的统治或重大政策的宗教群体、信仰和个人，通常是通过法外途径这样做
- **长期遏制：**采取措施控制宗教的扩大，加速其在年轻一代中的绝灭

它寻求通过管制去管理宗教，利用宗教的影响力去达到党的其它目标，同时压制宗教对党的权威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

共产党当局针对不同的宗教群体和下属群体，结合以上这些基本元素，给不同的信仰群体制造不同的环境，导致看似矛盾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党的领导人经常指出宗教在社会中能够起积极的作用，鼓励慈善工作，提供资金对重要的朝拜地、旅游点进行修新，还为相关国际会议提供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一个具有巨大经费的官僚和安全机器监视和压制在世界其它地方被认为无害处且正常的范围广泛的宗教活动，有时他们通过野蛮武力这样做。

每一届中共领导人都遵循了这个总体做法，只是着重点和实施上有所不同。江泽民在讲话中曾强调宗教对实现共产党社会和经济目标“潜在”的积极贡献。但是在1999年，他发起了一个学者所称的“文革以来最恶劣的宗教迫害事件”⁷，即对很受大众欢迎的法轮功的大规模灭绝。

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视政府许可的宗教为促进“和谐社会”的一个方法。在他的任期期间，政府开始为世界佛教论坛提供资助，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同时很多地方官员对宗教扩展采取了柔和态度，或寻求从中获得经济好处，很多新教堂和回族清真寺得以修建。但是胡锦涛任期内也对宗教事务采取了全国性的限制措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对成千上万信仰者进行了打压，在西藏和新疆发生重大抗议活动后进行了严厉镇压。

习近平治下的轨迹：强化限制，出人意外的改善

从2012年至今，习近平和他的同僚基本上保持了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继续了前任的一些具体措施。然而，某些特点和着重点在这些年里浮现出来。

从修辞上来看，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更强调要通过中国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来支撑共产党的合法性，将这两者与他的“中国梦”概念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又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运动，限制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警告外国势力在宗教领域的渗透。这两个讯息更强化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即共产党更倾向于诸如佛教和道教这样的亚洲宗教，尤其是当它们的扩展可能有助于制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时。共产党对这后两种宗教更加心怀戒备。

习近平还对中国的公民社会采取了关闭政策，宗教组织也未能逃避这个整体上的打压趋势。的确，本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宗教迫害整体上有所增加，四个宗教群体经历了这个迫害：新教基督徒、藏传佛教、回教穆斯林和维吾尔穆斯林。

与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治下的宗教政策有以下四个不同：

- **限制性更强、更加严厉的法律环境：**中国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通过了一系列新的、限制性的法律，在有些情况下将原来非正式的政治指令法律化。这包括直接与宗教政策相关的规定，如对全国宗教事务规定的更新、在刑法一个关键条文中规定更加严酷的惩罚、在新疆禁止宗教服装、在西藏处理自焚事件的司法方针。新的国家安全法和反恐法中也加入了能够被用来压制和平宗教活动的条款。
- **扩大打压目标：**与胡锦涛时代相比，宗教迫害的目标扩大了，原来受到容忍的活动和个人现在不再被容忍。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扶植的宗教领导人和敬拜场所也面临惩罚，包括被判重刑以及被拆毁。而这些做法以前只发生在未登记的或被取缔的宗教组织身上。日常的宗教表达，如在户外或医院敬拜、烧香、或观看宗教录像都招致严厉的惩罚。打压还发生在原先少见打压的地理区域，或针对那些向受迫害的信仰者伸出援手的人，如人权律师和家庭成员。
- **国家机器更多地干预日常宗教生活：**在以前没有感觉的地方，现在在某些宗教活动中以及宗教身份中能感到国家机器的控制。党的干部和包括武装警察在内的安全力量在某些地区更直接地介入了寺庙、清真寺和教堂的日常管理，一些更是永久性地进驻敬拜场所。对普通信仰者来说，大众节日被禁止，儿童宗教教育和参与受到限制，诸如穿戴头巾、留胡子、或禁食这样十分个人的决定受到当局的命令干预。
- **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从录像头、无人飞行器，到网络监控，各种



2012年，新疆乌鲁木齐一辆带有监控设备的警察面包车停在一个清真寺外。

图片来源：Graham Adams

形式的电子监控方法被戏剧性地扩大到了敬拜场所以及信仰者常去的公共场所，在巨大的告发人网络之外，提供更多监控信息。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应用的增加，当局的应对措施包括对特定应用进行定点阻断、囚禁在QQ或微信上分享宗教内容的用户、对仅仅是下载非官方宗教内容或下载有关违反宗教权利信息的信仰者进行迫害。

尽管总体环境趋于收紧，但是一些信仰群体中出现的现象令人乐观，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一些佛教学者对习近平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佛教的一些具体言论表示欢迎。在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后不久，方济各教皇登基，从那时以来，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大大升温。在2016年底，双方似乎非常接近于达成一个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尽管一些天主教重要人物对这样一个协议在多大程度上会缓和中共对“地下”天主教徒的迫害表示怀疑。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对法轮功的打压在一些地方似乎有所缓和，特别是考虑到共产党过去17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消灭法轮功的努力。习近平没有做出明确信号表示他打算改变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态度，但党内斗争的隙缝看来给了低层官员一些空间，使得他们可以选择不对法轮功成员进行迫害。有些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留几天后便获得释放，警察允许法轮功学员在囚禁期间打坐，或者警察积极保护学员不受惩罚，这些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却出现在中国不同地方，看上去不像是孤立事件。

驱动改变的因素

不管是好是坏，看来一系列因素在驱动这些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变化。在共产党总体上钳紧对公民社会控制、习近平反西方意识形态越来越凸显的情况下，宗教群体也受到了牵连。共产党在为经济下滑的政治影响做准备，同时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新的宗教限制带有习近平治国的印记，包括“依法治国”，强调立法，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扩大党的代表，以及强力打压社交媒体活动。

与此同时，政府的某些项目似乎是针对特定宗教群体而发起的。司法方针和集体惩罚措施被用来压制藏人自焚事件。在其它表达途径被阻断的情况下，藏人使用这种尤其绝望的抗议形式来表达不满，自焚在2012年达到高峰。对回族和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似乎来自于对越来越多的暴力攻击以及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主义的传播，还有中国公众当中越来越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当法轮功学员发明了传播法轮功信息以及受迫害情况的新办法时，当局试图加强电子监控、部署定位能力来找到并逮捕他们。

基督教的情况，个体官员的特点和考虑似乎特别有影响。浙江省书记过去曾与习近平一道工作，据说对公共场所过分显眼的基督教标记非常反感。他在浙江省领导了一个大规模的拆十字架运动，一千五百多教堂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新教皇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他的耶稣会背景，中共更愿意跟他对话，为主教任命协议扫清道路。从梵蒂冈的角度看，在中国，天主教主教空位之多前所未有，这也许促使方济各教皇向习近平做出他特有的姿态。

党内斗争平添另一层复杂性。党的干部要求采取更加强调同化的民族政策，那些主张相对文化自治的干部受到排挤，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的限制更加严厉。在积极的一面，随着前政法委员周永康以及其他负责打击法轮功的官员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遭到清洗和监禁，对法轮功的打击在官僚领导层面的出现空隙，为抱同情态度的地方官员采取比较宽松的做法制造了空间。地方领导人同样也显示了对其它宗教群体的宽容，这常常是在与当地寺庙、教会、或清真寺领导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如此，政策执行显示出有紧有松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专制统治有几个长久的特点，所有官员在计算处理宗教事务或一个具体事件的代价和好处时都会受到它们影响。一般来说，他们倾向于打压而不是更加进步的政策选项。共产

图1: 宗教迫害的轻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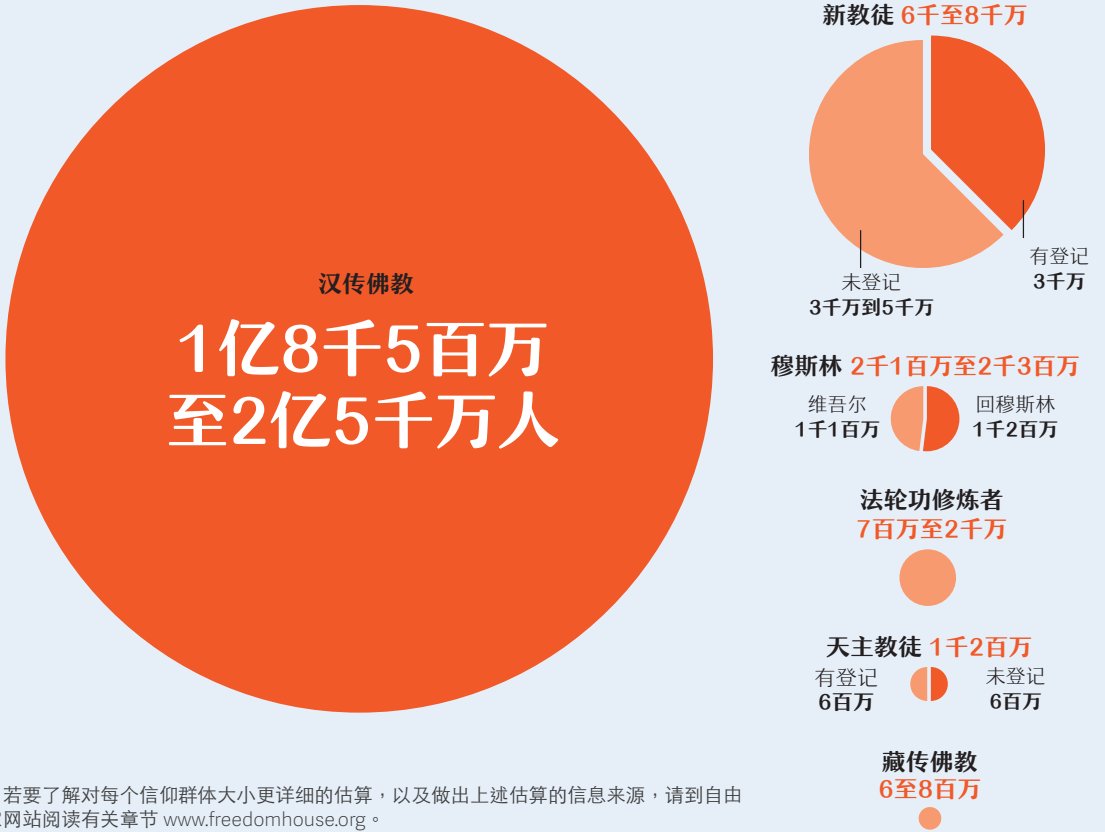
非常低	低	中度	高	非常高
道教徒	汉传佛教徒 回穆斯林	天主教徒	新教徒	藏传佛教徒 维吾尔穆斯林 法轮功修炼者

注：自由之家研究人员和学术顾问根据本报告对每个群体的描述、以及第16页关键宗教控制一览表所提供的分项指标，而对各宗教群体受迫害的程度做了如此评估。

图2: 中国宗教群体:

中国有3亿5千万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另有数以亿计的人信奉不同的民间传统。要决定中国各宗教群体的人数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受官方认可的宗教也是如此。政府统计排除那些在没有登记过的寺庙或教堂敬拜的人以及18岁以下的信仰者，许多中国人混合宗教与民间信仰。官方提供的穆斯林人数和藏传佛教人数是根据该民族人口数而做出的，其隐含的假设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成员都信奉一个特定宗教。对被查禁的群体，如法轮功，官方则无现有统计数字。

然而，对宗教信仰者整体以及每个群体相对大小有一些粗略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的性质。以下是根据官方数字、民意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宗教群体自己的统计，而对本报告中所涉及宗教群体的合理估计（道教除外，无现有统计存在）。



在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2009年被从敬拜场所驱赶后，一名妇女在一次户外敬拜中唱圣歌。在官方多年的骚扰后，守望教会于2016年解散。

图片来源: Beijing resident



党对信仰者忠实于它控制外的一个权威深感焦虑。当一个特定的信仰或一套做法变得十分受欢迎时，常常就会引发官方的打击，对新教教会更严厉的限制以及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就体现了这一点。不管是党内提升的正式评判标准，还是对党所排斥的东西进行镇压而不受惩罚这个事实，党内总的来说奖励打压行为，对违反宗教自由的党国机器赋予权力。最后一点，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纪念敏感周年日或北京主办国际活动的时候调动安全力量，导致他们采取极端措施防止他们认为会损害共产党声望的宗教表达。

共产政策的作用以及限制

共产党的宗教控制机器以及从2012底以来的压制行为在许多方面非常有效。藏人自焚得到了遏制。在浙江省，教堂上的十字架不见了。受到骚扰的家庭教会被迫分散。在公共场所戴头巾的维吾尔妇女和留长胡子的维吾尔男子少多了。

一批在政治上忠实于共产党的宗教领导人得到树立，新一代在官方办的神学院和佛学院接受训练。不少信仰者感到他们从事宗教活动没有障碍。作为政府“软实力”的一个胜利，中国2014年第一次主办了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际佛教组织的会议。

但是即使不同的管控措施和强化打压取得了实效，共产党仍面临严重的政策失败，其战略的有效性面临限制。在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以及摧毁了难以数计的信仰者的个人生活后，党试图改变人民信仰的努力总体上来说没有奏效。

许多藏人继续尊奉达赖喇嘛。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仍然禁食、仍然教他们的孩子背诵可兰经、仍然前往麦加朝觐。在全国各地，基督徒继续在地下“家庭教会”敬拜。成千上万中国人仍然练习法轮功，众多法轮功学员据说撤回了他们在酷刑下被逼迫做出的放弃法轮功的声明。

事实上，共产党宗教政策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用差的问题。政府故意为培训正式教牧人员制造瓶

颈，禁止无害的敬拜活动，对官方认可的教会领导人进行更多的骚扰，惩罚那些试图采取和解姿态的喇嘛。这些行为看起来适得其反，把更多的信仰者驱赶到非官方认可的聚会，表明与官员建立合作关系不是有用的做法。非政治化的信仰者被迫在法律之外从事信仰活动，这使得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政府及其规定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在体制内寻求隙缝，扩大宗教实践的空间，抵制官方禁令，或明确反对打压性政策。

数以百万计的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不理睬官方的限制，有些公开这样做，另一些人则秘密地这样做。宗教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和自愿者把宗教象征和精神意义带入了在正式敬拜场所之外进行的活动中。维吾尔穆斯林挂深色窗帘，以防止斋月期间被看见在日出前进食。藏人为达赖喇嘛祈祷长寿。法轮功学员在家里戴着耳机，坐在黑暗中打坐。对领导力培训感兴趣的基督徒从香港电台节目中或隐蔽在山中的私人工作室获得帮助。很多信仰者通过互联网、手机、地下出版物、自制DVD、以及卫星接收装置接触或传播非官方认可的信仰文本。

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抵抗形式是不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藏人寺院中的喇嘛拒绝出席“爱国教育”班，或逃进山里。其他参加政治培训的人则假装参与，同时却阅读他们自己带去的书。天主教神学学生抵制他们自己的毕业典礼仪式，以避免与共产党扶持的、不具合法性的主角一起做弥撒。维吾尔人把政府的一些文件或政府主办的一些庆祝活动视为伊斯兰中的禁忌之物。诸如这些行为都有被惩罚的危险，但是许多信仰者仍然这样做。

就一些群体和一些问题而言，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体系倡导改变是一个选项。道教组织不久前赢得了一个反对将一个圣人商品化的诉讼，回族穆斯林试图推动一项关于清真食品的立法。在其它案例中，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地方官员的合作或默认。佛教寺庙领导人成功地通过论辩和公共施压，与当地政府谈判，保证了寺庙的开放，降低了门票价格，阻止了拆毁、或者和尚对寺庙收入获得了更大的管理权。

一些未经登记过的教会领导人在举行活动的时候预先通知当地政府，或者向负责监控他们的当地警察释放善意。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员对他们辖区内的“家庭教会”给予默许，警察预先通知教会领导人即将到来的搜查。中国境内外的法轮功成员在一个齐心协力的行动中，与成千上万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联系，揭露共产党宣传的不实之词，鼓励他们不要参与对无辜者的迫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巨大努力带来了成效，一些地方警察拒绝监禁法轮功学员，2015年一个法官在一个法轮功案例中做了事实上的无罪宣判。这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例这样的案例。

很多信仰者越来越对政府的政策不满，表现得越来越不服从。本报告所考察的几乎每个宗教群体内的成员，包括一些“爱国”宗教协会的领导人，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直接抗议**。在好几次情形中，佛教和尚向来访者关闭大门，试图反抗政府的一项新的商业化项目。在浙江省，来自官方认可教会的新教和天主教领导人发表了公开信，敦促政府结束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行为，他们的信徒则静坐抗议，或形成“人墙”来阻止对他们教堂的破坏。

在西藏，单独一人的抗议者举着达赖喇嘛的画像从市场走过，数百人不顾政府禁令而纪念死于监狱的一名重要的喇嘛。大批法轮功酷刑幸存者利用司法规定中的一个变化，直接在中国境内对领导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

共产党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是却没有能够去除一些宗教群体、信仰、或某些具体的教义，这本身令人印象深刻。这反映了有些公民愿意为更高的原则和精神救赎做出牺牲，党在打压这些公民时遇到了特殊的困难。

2014年3月的一天，卞小辉站在河北一所监狱外拉横幅：“我要见父亲”。她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拘押。卞小辉不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但是这幅照片在网络流传后，她被判处三年徒刑。

图片来源：《大纪元》



一些这样的努力迫使政府作出了让步或导致了其它实际改变，尽管许多从事抗议活动或散布被禁信息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强拆得到了阻止，被关押信徒获得释放，政府的抹黑宣传被戳穿。

也许这些行动总体上最大的成就就在于他们所展示出的精神韧性。共产党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是没有能够去除一些宗教群体、信仰、或某些具体的教义，这本身令人印象深刻。这反映了有些公民愿意为更高的原则和精神救赎做出牺牲，党在打压这些公民时遇到了特殊的困难。

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共产党管控和施虐的人类代价非常巨大。宗教犯人是中國良心犯中人数最大的一群。每一天都有更多中国公民因为从事和平宗教活动而被扫进党国的专政机器。家庭被分离，信仰者受到身体和心理伤害，有时失去生命。在中国有些地方，如新疆、浙江和黑龙江，对信仰

的高强度迫害涉及多个信仰群体，警察和法官被要求打击几个信仰群体的人。

考虑到直接受影响的人数之多、地理分布之广、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多样化，这些违反人权的行为在这些群体当中、在中国社会整体、在共产党当中产生了极大的涟漪效应。这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 **加速系统分化：**大规模宗教迫害强化中国司法、执法机器最坏的倾向 - 酷刑、免责、腐败以及司法政治化 - 损害任何建立真正法制的努力。它还加强国家机器内部的强硬派分子，保证他们的资源，为完善审查、“再教育”、恶行做法提供机会，而这些手法又被用于对其它宗教群体和世俗活动人士进行迫害。
- **加重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对日常普通的精神活动进行宗教管控会使得信仰者激进化，导致更多的人从事直接抗议、参与非官方许可的聚会，或分享被禁信息。有些人甚至针对包括与政府合作的宗教领导人在内的权威象征或平民进行暴力攻击。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新疆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所声称的宗教事务目标及其更广泛的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都受到了威胁。
- **失去的精神与经济机会：**对宗教群体、个体领导人以及精神教义的打压，包括试图剥除官方认可宗教的重大神学教义，无异于剥夺中国人以及世界有价值的文化与精神资源，同时损害中国实现其“软实力”潜力。更实际一些，浪费在既无效益且适得其反的宗教迫害上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本可以用于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上，如照顾老人，保护环境。
- **损害共产党的合法性：**随着宗教压迫范围的扩大，包括更多官方认可的宗教群体成员，这些人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正在下降。当非信仰者有机会看透欺骗性的政府宣传是在支持压制政策

时，他们对党的信念也会遭到实质上的动摇。党国机器内部的一些个人对参与迫害显然是无辜的人似乎感到日益不安，导致内在的抵触以及暗助那些受打击的信仰者。

这几点突出显示了共产党宗教政策在一些关键方面的失败，衡量的标准是它们并没有帮助实现党的目标和重点，尽管有些政策在其它方面取得了成功。失败的根源在于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的刚性、不合时代性的政治体系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无法治理一个迅速现代化、多样化的社会，无法通过有益而人性的方式解决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相反，政府继续使用一贯的压制工具，重复一个暴力和抵抗的恶性循环。

未来展望

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如果希望从政策失败中解脱出来的话，他们有不少选择。他们可以放松有关宗教群体登记的规定，把更多信仰者带入一个现实的法律框架中，尽管这也许意味着允许登记过的群体在“爱国”协会框架外运作。他们可以扭转过去那些令信仰者非常反感、并损害了共产党合法性的任意做法，如禁止敬拜达赖喇嘛、禁止法轮功、拆除官方认可教堂的十字架等。在迫害维吾尔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应该区分和平的宗教活动与暴力活动。这样的步骤会在多个信仰群体中产生相当大的善意，但又不会对共产党保护其它核心利益有重大妨碍。

从长远看，在对中国灵魂的争夺战中，不加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会失败。

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这些选择似乎都不太可能。从这份报告的结论看，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宗教政策不会出现从上至下的松绑，尽管因为一些其它原因，某些宗教群体可能会享受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份报告凸显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力量和地理多样化对保护宗教信仰者的生命、扩大宗教活动空间、培养有益的政府-宗教关系上起着关键作用。

考虑到宗教复兴的趋势以及信仰者所体现出来的坚韧，从长远看，在对中国灵魂的争夺战中，不加改革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会失败。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尽管中国政府使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信仰，但是本报告在对多个群体的考察中看到有些控制方法具有共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国机器的四个方面、它们近来的变化对普通中国人造成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们也使得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当局如何与信仰群体互动：

1. 扩大对宗教领导人和敬拜场所的控制

在中国，五个官方认可的宗教都有自上而下的“爱国”协会，构成共产党对宗教进行建制性控制的基础。这些机构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以及党的统战部监督和领导。五大协会分别是：中国佛教协会(BAC)、中国道教协会(CTA)、天主教爱国协会(CPA)、新教三自爱国运动(TSPM)、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党国试图通过这五个协会以及各级宗教事务局(RABs)而对宗教活动进行全面控制。敬拜场所受到登记，宗教领导人受到监视，神学内容遭到控制，年度宗教庆祝活动或诸如麦加朝圣这样的朝圣活动都由官方组织。随着宗教信仰者人数在中国迅速增加，这些机构越来越难以达到它们希望达到的控制水平，有时则是出于自我限制。这导致更多粗鲁的官僚干预。

当局还没有对监管框架做出充分的调整来满足大众对宗教领导越来越大的需求。

这些爱国协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负责遴选和培养政治上忠诚于共产党的神职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继续教育。根据官方讲话，共产党希望通过控制宗教组织领导人，把信仰者导向政治上忠于党的神职人员，确保宗教教诲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合法性或政策。属于爱国协会的宗教领导人常常需要为共产党的政策说话，甚至帮助将共产党对其他信仰者的迫害合法化。

然而，当局还没有对监管框架做出充分的调整来满足大众对宗教领导越来越大的需求，即使受官方推崇的中国佛教和道教也不例外。中国当局继续对宗教教育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制，只任命极少的道教教士，对具体寺庙能接收多少和尚学习做出上限限制，基督教神学院的空位不够充分。其结果是，很多信仰者不得不通过法外渠道进行学习。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受到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都是党的传声筒。一些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受到信徒的尊重，因为他们不仅有知识，而且试图在体制内捍卫信徒的利益。在为数不少的案例中，党所栽培的忠实领导人、“模范”因为信仰的指引或政府一些压迫行为而“反水”，使他们认为无法在不背叛良知的情况下扮演党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反应总是解除这些本来受到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的职务，甚至关押他们。最近几年出现的例子包括天主教马德钦主教和新教顾约瑟牧师。

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正在快速跳过宗教中介人，直接插手宗教。党的干部、宗教事务管理局官员、或安全力量被直接派进藏人寺庙，上教会讲台讲党的政策，密切监督那些进入维吾尔人、

甚至回民清真寺的人。政府运作的一个新的数据库确认谁是经过“认证”的活佛。中国佛教协会的高层领导中越来越多的人是前政府官员。

政府控制敬拜场所合法登记的的努力面临类似于管理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障碍。从国际上看，宗教组织需要登记并不少见，甚至在民主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伴随登记而来的各种干预远远超过了一般为人接受的宗教自由国际标准。不仅如此，登记要求以及相关的程序，如财政报告和会计规定，非常复杂和累赘，可能要求提供在过往的政治运动中被销毁的文件。结果是，一些小的寺庙和教堂本来愿意登记，但却无法这样做。

其结果是，很多信仰者不得不通过法外渠道进行学习。

当局制造的其它障碍也导致信仰群体对登记望而却步。一些“家庭教会”很难登记，因为附近有“爱国”教会，相互利益冲突，而政府又不接受不属于三自爱国运动或天主教爱国协会的教会。教会领导人不愿意按照要求报告聚会信徒的名字，担心这些成员会受到监控。近来对官方认可的教会的骚扰表明，登记并不表示不会受到这样的干预，这使得非官方认可的教会更没有登记的积极性。

其结果就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非官方认可的、法外宗教活动空间，不仅包括广为人知的“地下”教会，也包括成千上万未经登记的佛教和道教寺庙。在许多地方，底层官员对这些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政治敏感期或由比较高层官员领导的运动中，未经登记的敬拜场所极有可能遭到骚扰、突袭、以及财产被摧毁。当局经常采取行动组织为登记场所的活动，将信仰者指向别的地方，如在场所挂表明是否登记的牌匾、禁止捐款、或威胁对敬拜者罚款，如果他们不转而前往官方许可的地方敬拜。

2. “思想改造”：教义操纵以及“再教育”

虽然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而且保证要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但是这个政权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资源和强迫手段，影响宗教传授和文本的内容以及个体信仰者的思想。这些措施反映了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毛泽东主义的残余，常常要求信仰者背弃或违反他们的核心信念。

在好几个案例中，与政府有联系的宗教组织或学者在由政府出资的项目对神学教义进行分解，确定他们认为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容的成分，制作出版物和指针，在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仰者当中分发和推广。

对新教基督徒来说，一场“神学建设运动”着眼于削弱“因信称义”的传统教义，由此鼓励中国新教徒把党国权威置于宗教权威之上。对穆斯林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对伊斯兰教法进行分析，并规定伊斯兰讲经的内容，大量这样的小册子在全国各地政府许可的阿訇中传播。一个《可兰经》维吾尔文新译本据说加入了新的内容，强调对国家的忠心。2011年发起的一个项目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重新解释，据说喇嘛寺庙被要求阅读由此制作的小册子。

习近平强调外来宗教“中国化”，在党的“宗教工作”中特别提到其重要性。如此，对宗教教义的操纵在未来若干年看来将会有增无减。

不管是对宗教领导人进行挑选和培训，还是提供朝圣或出国旅行许可，还是获得政府职位或资助，各种形式的“爱国再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藏的宣传运动过去十年持续扩大，不仅限于寺院，而且扩大到了普通藏人。参加这种“再教育”班的人通常都必须谴责达赖喇嘛。在新疆一些地区，希望获得社会福利或政府公职的穆斯林必须签署保证书，保证不戴面

各种形式的“爱国再教育”是对宗教领导人进行挑选和培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纱，或者在斋月的时候不禁食。天主教领导人被强迫出席非教宗任命的主教所主持的仪式。

在法轮功方面，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彻底根除这个群体及其信仰，政府的行动一直集中在“改造”上。这个意识形态再教育过程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身体酷刑、心理操纵、反复书写“思想报告”，迫使信徒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承诺不再练功。

对中国各地的宗教领导人、寺院、以及普通信仰者来说，政府强迫他们违反宗教信仰，并可能暴力报复不从行为，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两难处境。即使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我保存，许多被强迫服从于这种要求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心理伤害，他们感到自己背叛了个人信仰、身份认同、以及对精神领导人或神灵的敬拜。即使在再教育学习班结束、或被从关押中释放很久以后，这样的经历仍给他们留下了持久的创伤。很多信仰者后来宣布他们在刑讯逼供下说的话无效，逃离中国以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经历，或者祈求原谅。

3. 严酷惩罚与致死暴力

对那些回避或拒绝服从官方限制的宗教领导人与信仰者所施加的惩罚有时是最为严酷的，超过对任何形式的异议者的惩罚。法律条款允许对前者判处无期徒刑，法官动辄对显然是非暴力行为判五年以上徒刑，而在几年前，类似的情况是不会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

本报告中所记录的案例包括一名官方教会领导人因为反对省政府拆十字架运动而被判处14年徒刑。一名维吾尔少年因为在手机上观看宗教录像而被判处15年徒刑。⁸ 一名高资历藏人喇嘛被判处18年徒刑，因为警察在查抄他的寺院时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画像和录音讲授。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挂“真善忍好”这样一条表达法轮功核心信念的横幅而被判处12年徒刑。⁹ 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还有更多信仰者因为和平表达信仰或异见被判处重刑，包括散发传单、在公开场合祈祷、反对强拆敬拜场所、留胡子等。

信仰犯构成了中国良心犯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数量大概成千上万。自由之家研究人员得以确认从2012年11月至今至少1,400例中国公民因行使宗教自由权、或与信仰有关的言论及结社自由权利而被囚禁的案例。这个数字中包括一名中国佛教和尚、几十名新教基督徒、至少75名藏人、400多名被取缔的类基督教门派教徒，以及9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个数字来自于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记录、以及中国法院判决书，但是考虑到法外监禁以及强迫失踪的规模，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另外，由于官方统计数字缺乏透明，要从2012年以来因安全和社会滋扰罪行被判刑的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中区分出非暴力宗教控罪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数字至少有数百之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关注，这使得他们尤其面临酷刑和死亡危险。

信仰犯构成了中国良心犯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数量大概成千上万。

的确，中国安全部队系统性并且肆无忌惮地对囚禁中的信仰者使用暴力，公开暴力镇压抗议者，有时导致死亡。藏人喇嘛、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是最有可能面临这种对待的人，近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例狱中死亡的案例。

本报告所访谈的出狱囚犯提供了殴打、长期戴镣铐、电击、注射不明药物等细节。这些证词显示不同人口与不同地区之间在使用镇压手段上惊人的相似，包括将受害者带到秘密法外酷刑中心，或者把他们“交由”刑事罪犯进行凌辱。

除囚禁外，成百上千的基督徒在过去几年遭到防暴警察的殴打，特别是当他们试图阻止教堂被拆或十字架被拆除的时候。一名牧师的妻子被推土机活埋。在西藏和新疆，警察和其他安全人员在与居民的争执中向后者开枪。这些居民自发地反对官方限制外村敬拜、离家朝圣、或穿戴宗教服饰的做法。这些事件导致伤亡，包括儿童和老年妇女。

4. 经济惩罚，商品化，以及盘剥

鉴于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经济发展在官员提拔中起的作用，我们也许不应该感到奇怪，我们的研究发现，宗教与赚钱挂钩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时这些赚钱项目是政府和宗教进行合作的催化剂，但更经常地他们是冲突、惩罚、严重违反信仰者权利的缘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酷压制结束后不久，地方官员就开始视宗教场所为收入来源，“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标语无疑也是一种促进。¹⁰ 随着人口收入提高，同时大众对精神生活的兴趣提高，国内旅游者与外国游客一道，成为著名宗教景点希望吸引的经济资产，不管是古庙、大教堂、还是穆斯林陵墓。其结果就是翻新工程，新的建筑，门票收入，景区公园，纪念品摊位以及导览成为好几十亿收入的产业。这些活动常常侵入本来属于和尚和当地宗教信仰者的专门空间。

在极度商业化的例子中，一些佛教和道教寺庙，或者一个文化公园里新修的清真寺，彻底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根本没有神职人员，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场所既是旅游景点，也是宗教活动场所。

在一些情况下，宗教领导人成功地与当地政府官员谈判达成于己有利的条件，分享收入，或开放场所，保留他们的自治，减少矛盾。这样的例子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比如在云南省一个正式命名为“香格里拉”的藏族区域 - 香格里拉是虚构中的人间天堂。

但是，地方官员把商业机制强加于宗教场所的努力，如把一个寺庙圈在一个新修的风景公园收高额门票的做法，常常导致紧张关系，有时还导致抗议。而中国佛教和道教寺庙人员在政治上本来是十分服从的。为了赚旅游钱而对寺庙进行改造的做法也带来了资深和尚、穆斯林圣地访客、藏人朝觐者、以及其他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做法给普通人造成了妨碍，侵害宗教场所的自治，破坏神圣的宗教仪式。

赚钱动机也直接起到了限制宗教活动的作用。当局向公民提供数额丰厚的报偿（多至\$30,000美元），举报任何被当局认为有问题的宗教活动，从穆斯林妇女带面纱，到为达赖喇嘛上香，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在党国体系内，那些有效镇压某些特定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官员会受到提拔和奖励。

惩罚方面，试图躲避或反对宗教限制的信仰者被课以数字可达一个月平均收入的罚款、被威胁失去工作或教育机会、取消社会福利、或者被禁止获得收入，如在藏区禁止他们从挖冬虫夏草获得收入。地方警察知道他们迫害信仰者不会遭到惩罚，因此常常对地下教会进行查抄，或者抓捕法轮功学员以便从他们家人那里索钱，或者掠夺私人财产。其他受害者则经受了非直接的代价，比如近年几十座教堂遭到拆毁，而这些教堂是当地教徒捐钱修建，有些教堂的造价高达数百万美元。

中国当局还把创造收入与惩罚相结合，系统性地盘剥宗教囚犯，谋取经济利益。在中国各地，过去十年无以数计的宗教囚犯（基督徒、藏传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学员）是监狱强迫劳工的主要来源，他们在苛刻和不卫生的恶劣条件下为中国国内消费以及向外国出口制造大量产品。即使中国在2013年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劳改”以来，仍然有大量宗教囚犯通过司法系统被送到正式监狱，在那里，强迫劳动是经常性的，有时其规模比劳改营还要庞大。

最后，有证据显示，宗教囚犯被法外杀害，为中国欣欣向荣的器官移植业提供器官。许多相关事实、专家分析、和目击证人的叙述都特别指向法轮功学员。¹¹ 尽管中国的死刑数字在减少，

中国当局还把创造收入与惩罚相结合，系统性地盘剥宗教囚犯，谋取经济利益。

图3: 中国各信仰团体遭遇宗教迫害情况一览表

宗教团体 迫害变动趋势 (2012年11月-2016年11月)	趋势说明
基督教新教徒 增加 	<p>自2014年年初, 伴随官方有关“西方”价值观威胁和宗教需要“中国化”的论调, 地方政府一直在加强措施围堵基督教的传播。作为在中国两个主要基督教当中较大的支派, 新教尤其受到移除十字架和拆除教堂运动的影响, 其中还包括国家认可的教会领袖受到惩处, 受理基督徒案件的维权律师遭到抓捕。</p>
维吾尔穆斯林 增加 	<p>维吾尔人占人口多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控持续深化和扩大。先前新疆地区的一些非正式或地方性限令, 如有关宗教服饰, 已经在自治区和全国层面成为成文法律。当局还开展了新的运动来更加严密监控智能手机的使用, 强迫商店卖酒, 而安全部队射击维吾尔平民的现象也变得更加普遍。</p>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p>随着官方和公众日益担忧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受伊斯兰教鼓舞的暴力行为的威胁, 回族穆斯林自2012年11月以来面临一些更加严格的限制和伊斯兰恐惧症。在若干省份, 对儿童宗教学习的禁令执行的更加严格, 展示清真食品的标志受到限制, 萨拉菲派回族穆斯林受到镇压。</p>
藏传佛教徒 略有增加 	<p>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续了他的前任胡锦涛的打压政策和运动, 并深化和扩大了某些管控措施。新的手段包括惩罚那些协助自焚的人, 取消先前允许的节日活动, 增加对私人宗教活动的干预性限制, 并且更加积极地篡改藏传佛教教理教义和操纵宗教领袖的遴选。</p>
汉传佛教徒 保持不变 	<p>习近平延续了胡锦涛时代的政策, 为汉传佛教创造一个相对较少迫害的环境。他的行为和言谈把汉传佛教描述为在国内外实现党的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愈发重要的管道。在一起罕见的案件中, 一名汉传佛教僧人在2016年因政治罪名被判入狱。</p>
道教徒 保持不变 	<p>中国领导人一直把中国本土的道教看成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 用来在传统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打造政权合法性以及与台湾的道教信徒改善关系。</p>
天主教徒 略有降低 	<p>尽管有些天主教教堂十字架遭到强制拆除, 但是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自2013年以来有所回暖。目前有超过40名主教空缺, 双方似乎即将就管理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一项突破性的协议。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对地下天主教徒的打压, 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依然持怀疑态度。</p>
法轮功修炼者 略有降低 	<p>中国各地的法轮功信众继续遭受广泛和严重的人权侵害。不过, 这种打压在有些地方似乎有所下降。习近平主席没有明确表示将有计划改变中共对法轮功的政策。但是作为习近平反腐努力的一部分, 前安全部门头子周永康和其他涉及反法轮功运动的官员遭到监禁, 再加上法轮功追随者努力感化和劝阻警察对他们的迫害, 这些因素已经产生了正面影响。</p>

志愿捐献器官人数相当小，但是却有大量的器官供应，移植等待期较短。考虑到这种情况，大量维吾尔年轻男性失踪、维吾尔政治犯羁押后抽血的事实、以及藏人与维人在羁押期间神秘失踪的报告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注意，这些人口也有可能是非自愿器官收获的受害者。¹²

注解

1. “中国焦点：习近平要求改善宗教工作，” 新华社，2016年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4/23/c_135306131.htm。
2. 老子《道德经》Stephen Mitchell 编辑 (纽约: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4年)。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1982年3月31日。<http://www.sara.gov.cn/zcfg/zc/497.htm>。英语翻译可以在这里找到：Donald MacInnis, 今日中国宗教：政策与实践 (纽约：奥比斯出版社，1989年)，8-26页，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Document_no_19_1982.pdf。
4. “中国焦点：习近平要求改善宗教工作，” 新华社。
5. 本报告不包括对儒家的考察。儒家在近年升温，但是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套社会与伦理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另外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也不包括比较小的信仰群体，如犹太人、巴哈伊信仰，后者在中国不时遇到限制。
6. 本文以及接下来的部分中有关变化中的宗教管控机制的研究结果是根据本报告五章中对七个宗教群体的详细研究而得出的。脚注包括注释、引语、或在报告的其它部分没有讨论到的要点。本报告的全文以及支持性来源可在自由之家网站找到：www.freedomhouse.org。
7. André Laliberté,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政治化：有选择性的回索，” 《亚洲研究》69, no. 1 (2015): 185-211页，<https://www.degruyter.com/abstract/j/asia.2015.69.issue-1/asia-2015-0010/asia-2015-0010.xml>。
8. Eset Sulaiman, “警察在新疆加强对维吾尔人智能手机用户的检查，” 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月8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police-increase-checks-of-smartphone-users-in-xinjiang-01082016133532.html>。
9. 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李长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实施法律实施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国裁判文书网，2015年11月23日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a0fe2131-e19f-4d13-914f-629771e8686d>。
10. 华春雨，“国家宗教局：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宗教界权益的关系”，新华社，2012年10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24/c_113484955.htm。
11. 欲了解现有证据，请阅读本报告法轮功一章：www.freedomhouse.org。
12. 比如说，一名2011年从乌鲁木齐一家监狱获释的维吾尔穆斯林向自由之家详细讲述了对监狱里维吾尔政治犯和宗教犯每月抽血的情况，汉人犯人则不需要抽血。他和两名藏人受访者都讲到宗教犯在狱中神秘死亡的事例。这是2016年10月对一名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的采访。他希望匿名。

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012年11月 – 2016年11月)

#	控制	汉传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新教 + 天主教) ^a	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 (维吾尔人) ^b	法轮功 ^c
总数		8/24 (33%)	18/24 (75%)	22/24 (92%)	21/22 (95%)	18/18 (100%)
1	“爱国协会”的管理	●	●	●	●	n/a
2	对宗教领导人招募/训练的控制	●	●	●	●	n/a
3	封衔/培训的数量	●	●	●	●	n/a
4	敬拜场所的关闭/摧毁	●	●	●	●	n/a
5	国家认可的宗教领导人/僧侣被判监	●	●	●	●	n/a
6	未被国家认可的宗教领导人/僧侣被判监		●			n/a
7	对教义进行干预/操纵		●	●	●	●
8	禁止核心宗教教义		●	●	●	●
9	学习宗教文献会遭受惩罚		●	●	●	●
10	宗教庆典受到限制或惩罚		●	●	●	●
11	普通信仰者被监禁	●	●	●	●	●
12	50名以上的信仰者被监禁		●	●	n/a	●
13	500名以上的信仰者被监禁				n/a	●
14	因网上宗教活动而被监禁		●	●	●	●
15	限制儿童的参与	●	●	●	●	●
16	政治“再教育”运动		●	●	●	●
17	普遍存在的酷刑			●	●	●
18	法外杀害		●	●	●	●
19	10个以上法外杀害的案例			●	●	●
20	新的限制性的法律变动			●	●	●
21	对行动/护照发放的限制			●	●	●
22	在国家媒体抹黑		●	●	●	●
23	经济剥削	●	●	●	●	●
24	网上审查宗教交流			●	●	●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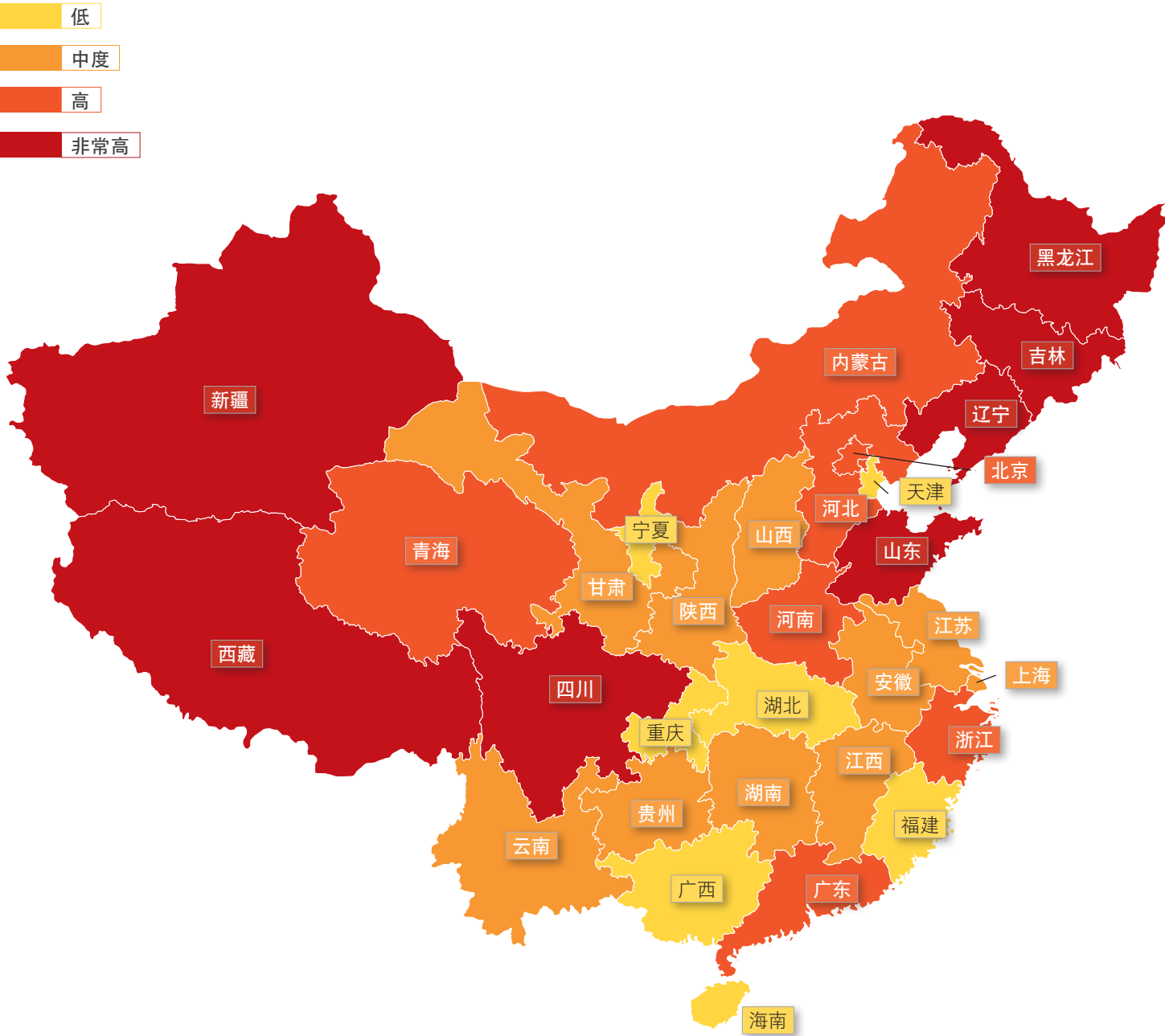
a. 基督教徒被监禁的人数也包括属于被取缔的类基督教派别的个人。

b. 由于缺乏足够清楚的数据，对回族穆斯林的待遇未包括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去评估是否有50或500以上的维吾尔人被监禁。

c. 好几种形式的控制措施都不适用于法轮功，因为它既不是一个正式有组织的宗教，也不是官方认可的宗教，缺乏任命的神职人员、敬拜场所、以及获得国家认同的领导人。

地图：各省份宗教迫害情况 (2012年11月 – 2016年11月)

中国的许多宗教控制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2012年11月以来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以及省级直辖市均有有记载的迫害案例，但是迫害的程度以及针对的主要群体因地区而不同。



注：对各省份宗教迫害情况的评估是根据几个来源做出的，包括从中国法院判决书中获得的迫害和拘押案例数据、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以及人权观察和对话援助协会的报告。

I: 汉传佛教与道教

迫害严重程度:

汉传佛教

低

道教

非常低

迫害变动趋势:

汉传佛教



保持不变

道教



保持不变

主要研究结果

- 1 复苏:** 汉传佛教和道教过去三十年从几近灭绝经历了长足复苏，但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前相比，仍显失色。汉传佛教以约一亿八千五百万到两亿五千万的信众人数，为中国最大的已制度化的宗教。
- 2 干涉控制:** 大量规章和官僚控制确保两宗教在政治上的驯服，然而，政府不当限制在其他国家视为例行性的宗教活动。其中不切实际的寺庙登记条件、不经常性批准传戒、以及官方干预寺庙行政等控制手段，严格限制了一般民间出家人和信众的宗教信仰。
- 3 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在宗教政策修辞上做了些许调整，但基本上仍继续前任胡锦涛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汉传佛教和道教逐渐被视为实现党在国内与国际上政治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渠道。2006年一位汉传佛教僧人罕见地遭到政治指控而被判刑。
- 4 商品化:** 开发寺庙以获取数十亿观光产业商机，已成为政府、僧人、和信众之间主要矛盾点。
- 5 宗教界应对:** 宗教界领导和僧众愈发果断地采取免费或低廉的寺庙门票，在阻挡商业化侵袭上，时常有所进展。



在浙江省一个景区，游客们穿梭于观音像下。这些环寺庙而建、收门票的景区日渐成为地方佛教领袖与政府紧张关系的来源。

图片来源：Kuei-min Chang

“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会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方立天，佛教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03 ¹

“很多地方政府把寺庙看作是地方收入来源。市政府开发周遭地区要把寺院圈起来收门票。但是师父绝不会同意。他说那天我们得靠收门票生存时候就是我们把寺院关起来的时候。”

—江苏省寺庙僧人 ²

文革后的复苏与扩展

汉传佛教、道教以及各式民间宗教，数千年以来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³ 虽然中共视其为封建残留，但是在其执政前十七年内，还是容许部分程度的宗教活动。在政府管控下，设立社团主义式的宗教协会来管理信仰。然而，政府部门接管寺庙管理，僧道被迫参与劳动，举行宗教仪式的危险性逐年增加。

国家对宗教有限度的容忍在文革期间（1966-76）消失。积极消灭宗教政策成为主流，寺庙受到破坏，经书遭到焚毁，僧尼被迫还俗、拘禁、和殴打。广大信众在严峻压迫的氛围和政治动乱下，纷纷停止公开及私底下表达其信仰。

毛泽东逝世后以及1978年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后，中共大致重拾其于文革以前的宗教立场，开始较大程度容忍汉传佛教和道教，甚至支持寺庙重建。随着幸存宗教领袖恢复其活动，中共消灭宗教信仰的尝试已明显失败。

严格的法规架构、广泛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继续防止未加控制的宗教增长。即便如此，汉传佛教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已制度化的宗教，而道教也逐步地经历较小规模的复苏。

时至今日，中国登记有案的各式大小佛寺道观超过38,000所，⁴ 僧尼道士至少120,000人。⁵ 基于种种因素，像许多中国人信仰实践混合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并且不参与任何正式的宗教组织，确切信众人数无法确定。然而，一般认为数亿中国人自认为佛教徒与道教徒。2007年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估计中国有一亿八千五百万佛教徒，一千二百万成人明确表态认同道教，有更多人（一亿七千三百万）表示他们参与部分道教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可能与民间宗教有所重叠。近年皮尤研究中心估计直至2010年，中国有两亿四千四百一十一万佛教徒，相当于总人口的18.2%。⁷

日常宗教活动多元，信仰实践内容受到宗门、地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的汉传佛教和道教仪式以寺庙为中心，寺庙历来是僧道提供信徒服务及指引的场所。大型寺庙为中国人和外国人所熟知，但更为常见的通常是只有一到五位僧尼的小寺庙。这些出家人平日专注于个人修行、禅修、维护寺庙、以及为周遭信众提供服务，他们通常仅面临地方政府当局的有限度干预。⁸

佛教和道教信徒修行大多以功德为中心，除了给寺庙贡品之外，个人可以通过做好事以及遵循道法来积累功德。他们相信个人的功德能够为此生、身后、及未来转世带来好处。人类学研究指出，此教义逐渐在城市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市民从功德或因果的概念中，寻找日常生活指引，即便他们本身不见得会定期参与寺庙的服务或仪式。⁹

种种迹象强烈显示，若不加以阻挠，上述的复苏和扩张会持续下去。首先，目前僧道和信众人数与文革前比较相形失色，意味这两个信仰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能。¹⁰ 第二，寺庙也在信徒的积极协助下，透过举办法会、宗教知识讨论会、宗教庆典、慈善工作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第三，从已登记的寺庙数量来看，对宗教服务和指引的需求仍胜于供给，若前述统计数字正确的话，每6,400名信众才有一间政府批准的寺庙，表示寺庙极度短缺。¹¹ 因此，两个宗教即使在和党国最具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仍有很大程度不受法律支配的宗教活动。例如，2014年，福建省有超过两万间未登记的道教场所，几乎是已登记的1,263所的15倍。¹²

提倡汉传佛教和道教以服务党的目标

自文革结束后，中共的宗教政策演变从加速宗教消失，到辨识部分宗教界和其领导如何能推进中共一连串政治和经济目标。这个态度虽适用所有官方认可的宗教，但汉传佛教以及较小程度上道教，尤其如此。

宗教有各种方式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推进中共政策目标。在国内方面，马克思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大众吸引力，中共领导人于是借由宗教来支撑党的统治正当性和民族主义。佛教慈善组织或寺庙在官方的鼓励下，也逐渐参与社会公益，提供服务给弱势群体像孤儿、老人、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据闻党领导人认为佛教慈善组织或寺庙，比其一般世俗化的非政府组织或基督教慈善团体，较不具有政治威胁，甚至可以取代这些团体的社会角色。¹³ 同时，国际和国内旅客游览具有历史、艺术、和信仰重要性的宗教景点的兴趣日益增长，形成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数十亿观光产业。

在国际上，中共试图借由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来建立“软实力”以及改善与台湾社会的关系。中共投射软实力的企图在胡锦涛时期、当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取得重要性，该政策的中心面向是呈现中国政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旗手和倡导者。传统中华文化几乎是儒家思想、佛教、与道教遗产和影响的同义词。

这番企图在宗教政策中，表现在政府对国际会议的支持。举例来说，从2006年至2015年，中国组织和主办四场先前并不存在的世界佛教论坛，邀请来自30多个国家多达1000名宗教领袖、僧尼、和信徒参与。¹⁴ 除了会议本身内容，僧人们因中国赞助而齐聚一堂、令人瞩目的影像，透过中国国家媒体放送全球，展示中国政府表面上的宗教宽容。¹⁵ 2011年，中共也为一主要国际道教会议提供支持。¹⁶

反之，就此中共视汉传佛教为较有用及较不具政治威胁性的象征例子来看，¹⁷ 中共并未替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举办类似的国际会议，官方并且不欢迎藏传佛教领袖像达赖喇嘛参与。海外非政府组织首先获得中国政府首肯于2010年在中国建立分支的是一来自台湾的佛教慈善组织，这再次显示比起世俗化和其他信仰的慈善组织活动，中共对佛教团体有较大的信任。¹⁸

中共试图借由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力来建立“软实力”。

中共利用佛教和道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或许来自胡锦涛时代所推动的「和谐社会」运动与佛教和道教教义的关联性。2006年四月在中共网站官方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明确地指出此关联，该文章表示，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释出讯息说“佛教的教义是被无神论政府正式认可为有助於创建和谐社会。”¹⁹ 2010年，时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贾庆林对中国道教协会也表达类似的诉求。根据新华社报导，贾庆林要求“协会提倡道教经典中的和谐理想，使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²⁰

在中共试图引导中国信仰朝向其认为政治安全的方向，对于汉传佛教成为对该政权特别有吸引力的执政工具，学者们提出几个解释因素：

- 汉传佛教领袖和出家人有支持政权和政治服从的历史。相较其他信仰，汉传佛教较少有使其难以对皇帝或执政党效忠的教义。此外，作为佛教信仰活动中心的寺庙本身，无法被移动，也无法被取代，这意味若宗教领袖进行公开政治反抗，将冒着为其信仰招致严重损伤的风险。²¹
- 中国领导人相信传播佛教有助推行礼仪、鼓励人民较具有同情心、以及为社会紧张提供安全阀，同时又不会引来政治改革的要求。²²
- 佛教领袖对与党国合作的接纳度高。他们呼应政府对慈善工作的需求，²³ 采用官方论述来推动对佛教友善的政策，²⁴ 并主动地展现他们的政治忠诚，譬如协助政府对其他信仰团体的打压。²⁵

- 佛教广泛在邻国存在代表佛教可以作为共同文化遗产的来源，也可以作为统一台湾社会的要素。²⁶
- 中国领导人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态度之所以谨慎，起于两个信仰与外国文化、圣地、和权威之间的链接，以及它们长久来反抗政治压迫的历史。相比之下，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千年来，已经逐渐中国化。

以上几点也适用于道教（例如其为本土宗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紧密、在台湾为重要的群众信仰），对中共而言，道教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助手。

习近平以来的汉传佛教和道教

自从2012年11月接任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主要延续胡锦涛时代的佛教和道教政策。2013年，他会见台湾一佛教组织的领袖，²⁷ 2015年十月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江苏省举办。²⁸ 2014年中国首次主办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大会，此国际佛教组织具有长远的历史，于1950年在斯里兰卡成立，主办该活动展现为中国展现软实力的重大胜利。²⁹

2014年夏天北京四处可见标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此时期的宗教政策还是有些微的调整，尤其在针对宗教的论述和方法上。中共应对宗教的手段显得更加明确和尖锐。

1. 官方论述从“和谐社会”转变成“中国梦”：如上所述，过去十年常见的官方说法提到佛教如何能协助达成胡锦涛领导时期的中心宣传“和谐社会”。自从习近平创建“中国梦”一词来描绘中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佛教和道教被高举为能达成此目标的资源。本章开头引用的文字摘自一篇2013年文章“佛教与中国梦”，即为一例。
2. 加强利用中国宗教来支撑中共正当性：习近平本身和中共的宣传机器整体上渐增引述传统文化—佛教和道教为主要组成要素—为共产党价值和政治领导背书。2014年夏天北京四处可见标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三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其中一段认可佛教对中华文化的正面影响和中国自身对佛教发展的影响。各类佛教刊物作者诠释该演讲内容为官方确认佛教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梦”之外，并乐观预测其开启佛教在中国的新纪元。³⁰
3. 更加明确表达对“外国”宗教势力的担忧：中共一直以来试图把国内信众与国外信仰权威区隔开来，自治和独立於外国势力是其一贯的宗教政策。然而，习近平在2016年四月对党干部一重要演说中强调：“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中国，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³¹ 应是指基督教的增长、藏人持续崇敬流亡的达赖喇嘛、以及顾虑维吾尔穆斯林中极端分子的暴力。该发言也符合习近平任内中共领导人对“西方”价值的普遍敌意，当局对本土的汉传佛教和道教持偏好观点。

尽管有这些论述上的调整，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在政策或其执行上有具体的变化，汉传佛教和道教受惠於这些论述，主要是在于未被当局提及：它们没有像其他宗教团体和世俗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在习近平任内明显遭受更严苛的对待。

政治控制的主要方法

虽然汉传佛教和道教与党国保持较为合作的关系，但是该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压迫面向，中共政权试图透过控制宗教领导和宗教发展，来确保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以及维护他们为党目标所带来的好处。在此过程中，当局限制中国公民从事他们的自身的信仰、违反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

许多限制手段在习近平主政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过去四年，以四个主要方式呈现：

- 1. 官僚监管与国家干预：**佛教与道教领袖和信徒遭受三重监管：首先是透过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它们表面上是非政府单位，但与国家单位密切合作，指导宗教的发展和动员宗教界来支持官方政策；国家宗教局；以及中共的统一战线部门，负责管理非党群体与党之间的关系，如宗教团体。这三个党政机构的分支和代表有网络直达村、区、和寺庙。

举例来说，许多寺庙由出家人和与地方宗教局有关系的寺庙管理委员会所共管。³² 许多商业化的寺庙由其他负责保护和推动文化或历史遗产的政府单位来管理。自2010年起，中国佛协领导层的国家派出人员明显增加，这些高层职位过去一般由宗教领袖和信徒担任。2015年的换届更加深此一趋势，中国佛协秘书长和国宗局一司司长—刘威和王健一基本上互换职位。类似的转变近几年也发生在中国道教协会的的领导阶层。³³

- 2. 不切实际的登记条件：**根据2004年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宗教场所若要进行官方登记，必须证明有稳定的合法收入、必须是由合格宗教教职人员所领导的固定祈祷聚会点、申请登记必须由爱国宗教组织所提出。然而，许多小寺庙因为没有官方出具的产权证明或是没有爱国宗教团体所认证的宗教教职人员，并无法符合这些标准。该登记条件导致有大批的宗教活动场所，无法注册。

鉴于登记所有宗教活动场所所带来的挑战，近年来当局也采取手段欲将未注册登记的寺庙道观访客引导到已注册的场所。2012年10月，国宗局和九个其他政府单位下达指示，禁止非注册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地点从事宗教活动和收取捐款。³⁴ 同时，国宗局也在各地推进宗教活动场所挂牌，³⁵ 区分宗教与非宗教活动场所，其也设立网页列出所有其已核准的场所。³⁶

- 3. 限制宗教教职人员认证：**中国佛教协会于1994年已经集中发放戒牒，但其也将传戒仪式限制在一年最多十次，一次最多350名受戒人员，因此每年最多有3,500人得以受戒，虽说多年以来实际传戒人数更少。³⁷ 受戒人员除了要所驻寺院同意之外，还要当地佛协和宗教局同意，此规定等于将个人的政治可靠度纳入传戒过程。自2000年起，只有通过官方正式登记、具有五名以上佛协认证僧尼的寺院才能招收弟子。

目前道教正一派仅举行过三次授 仪式（始于1949年），最近一次于2011年。

道教方面，中国道协也垄断印制发放道教教职人员证，举办过更少的传戒、授箓仪式。目前道教正一派仅举行过三次授箓仪式，最近一次于2011年。反之，海外正一派道士（尤其来自台湾）的授箓仪式自1991年以来每年在龙虎山举办，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进“祖国统一”³⁸ 此限制使中国境内的道教弟子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道教的信仰体系里，个人出家修行没有透过传戒或授箓仪式，就无法正式被纳入师父的世系，以名箓天曹、取得道位。

- 4. 个别暴力压迫事件：**近几年来不时有中国政府因为寺庙没有注册或者因为广泛经济考量，强拆部分或者全部庙产。一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2014年二月一百名城管部署至福建省厦门市，拆毁一座据称是违建的佛寺，导致政府与当地居民的暴力冲撞。³⁹

在个人层次方面，出家人若批评政治或者表达支持人权会面临到监控、行动管制、甚至牢狱之灾。2016年四月，武汉一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宣判佛教僧人圣观（俗名徐志强）四年徒刑，⁴⁰ 该罪名通常只用在政治异议份子。⁴¹ 圣观法师於2015年五月

在讲经说法时，被当局逮捕拘留，时届天安门屠杀25周年、政府广泛取缔疑似参与纪念活动的中国公民。囚禁佛教僧人极为少见，圣观的刑罚被人权律师及其弟子视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该案也向其他出家人明确传达政府讯息，亦即，若其社会良心和个人的宗教诠释违背对中共的政治忠诚，将可能承担负面后果。

经济上利用寺庙财产

文革后寺庙一重新开放，地方官员就开始将庙产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内与国际旅客增加，庙产的商品化日趋势益加深。

商品化有几种形式，在部分案例中，寺庙没有教职人员而完全为观光景点，一位学者称其过程为寺庙的“博物馆化”，⁴² 例子有北京白塔寺或扬州天宁寺，这些寺庙由政府单位管理，其功能以旅游和维持文化遗产为主。⁴³ 在寺庙有出家人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将寺庙圈在景区内，收取高额景区门票，或强迫僧人收取及分享寺院收入，寺院领导对门票少有控制权。⁴⁴

也有部分寺庙僧人自愿收取门票，但这是由于在文革刚结束后，寺庙尚未建立信众和宗教捐款来支持其生存，这些寺院的门票通常非常低廉。

反之，一旦寺院被圈到景区里面，参访寺院的成本大幅增加，举例来说，162座全国重点寺庙在2013年对外开放，寺院平均门票为6元（0.9美元），但是61座寺庙在景区内，因为有额外景区门票，进入寺庙的成本总平均变为59元（8.8美元），几乎增加十倍。在著名的场所，景区门票收入可以很快累积为重要地方收益，譬如，佛教圣地普陀山2015年接待旅客664万人次，成人门票为160元（23美元），总门票收入超过10亿元（几近一亿五千万美元），⁴⁵ 旅客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还来自于他们交通、住宿、用餐、及购买纪念品的花费。

如中国其他剥削发展的作法，像非法土地征收或是强制拆迁，寺庙商品化很大一部份是因为地方官员正式升迁评比中，纳入经济发展数字。⁴⁶ 此外，地方干部时常被重新指派到其他地区，许多官员因而寻求短期能增加政府收入和提高经济发展数据的方式，而不考虑到该方式对当地民众的长远影响。

经济剥削是共产党与基层佛教和道教神职人员紧张官方关系的主要根源。

圈寺院收门票即是此具有吸引力方式，尤其圈庙不像其他开发作法可能会毁坏环境。因此，根据近年来在该题目上进行田野调查的张贵闵说，“将进入寺庙和取得宗教服务管道挂上价格标签的压力不断存在。”⁴⁷ 有趣的是，至少在理论上，中央政府试图阻止地方这类做法，然而，由于其并未采取行动改变升迁制度的诱因或者惩处追求此升迁策略的地方官员，仅口头非难对遏止该现象，效果非常有限。

一份在2012年六月到2015年五月针对23座著名寺庙的研究发现，若给予选择，一般宗教领袖偏好寺院免费开放。⁴⁸ 就他们而言，收取高额或是任何门票有几点可议之处。首先，门票使得低收入民众难以取得宗教服务，包括在佛教道教认为能为信众带来功德的重要仪式，而对能够负担门票的民众来说，高额门票可能降低他们到寺庙来祈福、烧香、或者寻求精神依归的频率。第二，门票并非自愿奉献，强迫奉献违反欲达佛教觉悟中最根本所需的自由意志和道教无为的原则。第三，信仰权威传统上来自信众的积极信服，高额的费用、景区当局雇用假僧假道提供不当（但高收益）的宗教服务，都有损寺院内出家人的权威。

上述事态变化表明，地方官员实行的经济剥削和试图将寺院商品化的行为已成为党国体制与基层佛教、道教神职人员紧张关系的根源。

宗教界回应及反抗

如上所述，佛教高层领导对中共及其治理目标，展示高层度的政治顺服，然而，即使像佛教这个政治上相对服从的宗教，与党国机构也非没有关系紧绷之时，尤其在地方层级。地方汉传佛教和道教领袖对政治控制的反抗，大多有以下两种主要方式：

- 1. 利用政策执行的落差来扩张宗教活动的空间：**这个趋势可见於广泛宗教活动发生于未登记的寺庙和宗教慈善活动。学者苏珊·麦卡锡（Susan McCarthy）就她研究的佛教慈善团体指出，这些团体有效创建平台让信众实践佛教教义、经历信仰上的觉知、以及在政府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之外，对一般大众介绍佛教概念，例如慈悲。⁴⁹
- 2. 阻挡商业化：**由于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复苏，出家人的社会影响和财政资源比起文革后初期有大幅长进，出家人与地方官员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显然让出家人更能决断保护庙产免于被侵犯、甚至逆转已发生的商业化现象。⁵⁰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层级都可见汉传佛教和道教界反对商业化，其表现有几种形式，从法律实践到温和的抗争。

- 1. 提倡立法改革赋予寺庙法人地位：**宗教团体不适用中国法律下的四种法人形式：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没有法人身分，寺庙本身在法律上无法独立进入诉讼过程，而必须依赖相关宗教协会在法庭上代表他们，或是为他们与政府机构协商。这导致普遍的商业剥削现象，宗教领袖於是倡议在法律上增加第五种“宗教法人”。

除了个别宗教领袖像是少林住持释永信在2007年与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该议题之外。⁵¹ 官方宗教团体和其代表也开始从事推动该议题。时任中国佛协会长的释传印在2013年及2014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提议解决寺庙缺乏法人地位的问题。⁵² 国宗局研究中心也著手进行调查该议题，并於2013年在出版期刊《中国宗教》中，发表其结果。⁵³ 官方支持预期可使该改革推动更易成功。

- 2. 利用法院保护宗教商标：**2014年，中国道教协会针对一珠宝公司注册城隍（道教神祇）为商标，代表上海城隍庙的官司获得关键胜诉。一般广泛认为法院判决认定以道教神祇名称作商业用途会“伤害道教信众的宗教感情”，是对抗商业化的胜利。⁵⁴ 受到该官司的鼓舞，中国道协，在受到国宗局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道教代表支持下，表明他们会继续诉请取消其他类似商标。⁵⁵
- 3. 口头上协商、民众压力、以及请愿地方官员：**地方寺庙领袖近年来成功使用各种论述、施压点、以及民众压力与地方政府协商开放寺庙、降低门票、防止拆迁、甚或争取寺庙管理上更大程度的自主性。这些手段包括列举圈寺庙后会丧失地方总收入及引发民众不满；⁵⁶ 如果增加或不改变门票金额，旅客会转向其他门票金额较低的竞争寺庙；⁵⁷ 让宗教领袖按照其方式管理寺产有助认证该宗教场属于特定重要宗教嫡系，而能进一步推动地方观光和经济发展。⁵⁸

随着中国公民运动的大体趋势，僧人也利用社群媒体公开地方官员对庙产的威胁，而迫使其放弃该计划。相关例子有2013年地方政府公布将拆迁兴教寺僧人的宿舍、并且计画建设景区。兴教寺以保存玄奘遗骨而闻名，玄奘远至印度追寻佛法，启发中国经典文学著作《西游记》。由于玄奘对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该计划透过社群媒体揭露之后，招致强烈民众反对，以及中国佛协和国宗局的批评，各方反对使地方政府最终取消拆迁和圈庙的计划。⁵⁹

- 4. 非合作式的抗议：**近年来在协商努力失败后，部分寺庙诉诸更加果断的策略，其中特别常

僧人也利用社群媒体公开地方官员对庙产的威胁，而迫使其放弃该计画。

见的是对外暂时关闭寺庙。这个寺院王牌策略可见於河北省、陕西省、和云南省等，⁶⁰ 这策略显示，若僧人不同意让旅客进入寺庙，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赚取任何收益，这样细致的反抗行动若被放上网，也会伤害地方官员在当地居民和广泛宗教界当中的声誉。

该类行动迫使地方官员重新计算圈庙收高额门票的得失，在这些自由之家所取得的案例中，官员们在僧人关门抗议的几周、几天、甚至几小时之内，皆改采更为怀柔的姿态。另一个以无声抗议策略来提醒官员寺庙合作的重要性，则为著名宗教领袖缺席官方典礼。⁶¹

未来展望

作为中国最大的制度性宗教，汉传佛教在中国社会扮演尤其重要的角色，而道教则为真正的本土信仰。两者皆被中共视为潜在的治理伙伴。鉴于习近平口头强调传统中华文化以及政府对两个宗教国际会议及慈善工作的支持，中国领导者对这两个宗教的偏好可能会在往后以更加具体及财务的方式表现出来。

即便享有官方偏好，汉传佛教和道教还是受到一连串政府控制、违反其自主性，尤其在商品化方面，造成一般宗教领袖的反感。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减缓，宗教商品化可能有两个演变方向。一方面当其他收益减少，如果地方官员仍视商品化寺庙能带来丰厚的消费者驱动经济收入，寺庙商品化的压力可能会升高。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迟缓影响到中国中产阶级，使他们到宗教场所旅游的资源减少，因而降低开发宗教场所的动力。

在新经济情况下，不论哪一个路径最终变成主流，可以确定的是至少部分商业化动力会持续下去。鉴于寺庙的社会资本会进一步随着和传佛教和道教的持续复苏而增长，而僧众会注意到其他寺庙的成功策略，果断反对地方政府商品化寺庙的新案例可能会持续浮现，但这同时也可能引发官方更加强悍的回应。

注解

1. 方立天，「佛教与中国梦」，《中国宗教》2013年第12期，第28-31页。
2. Kuei-m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Academic Commons, 2016, <http://dx.doi.org/10.7916/D8SN097K>
3. 本报告称「汉传佛教」以区分藏传佛教（不论是由藏人或汉人信仰），其组成大多为大乘佛教，但也包括禅宗和上座部佛教。
4. 这些数据排除藏传佛教。根据官方数据，直至2014年，中国有27,700大乘佛教活动场所、1,700上座部佛教活动场所、以及9,000所道教活动场所。见国家宗教局，“我国宗教的基本概况”，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5. 这个数据是根据国家宗教局资料，直至2014年，有登记72,000汉传佛教教职人员、上座部佛教2,000名、道士48,000人，国家宗教局，“我国宗教的基本概况”，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6. Katharina Wenzel-Teuber, "2015 Statistical Update on Religions and Church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in Today's China* 6, no. 2 (2016): 20-43.
7. 该研究中心不另列道教，但是指出约两亿九千四百三十万人信仰民间宗教（佔总人口百分之21.9），因为许多中国人混合信仰，这些人口可能与部分佛教徒重叠。Pew Research Center's Religion & Public Life Project,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China," (2016年6月10日浏览)，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countries/china#/?affiliations_religion_id=0&affiliations_year=2010%C2%AEion_name=All%20Countries&restrictions_year=2013®ion_name=All%20Countries
8. 与不愿具名的中国研究学者访谈，2016年6月。
9. Gareth Fisher, *From Comrades to Buddhists: Moral Dimensions of Lay Buddhist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
10. Zhe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5, no. 2 (2012): 8-26.

11. 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6月。
12. 梅江区政府, “中国道教的地域性差异”, 2014年10月6日, <http://www.meijiang.gov.cn/sonweb/slj/content.php?IndexID=175927>
13. André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9, no. 1 (2015): 185–211, <https://www.degruyter.com/abstract/j/asia.2015.69.issue-1/asia-2015-0010/asia-2015-0010.xml>
14. 同上。
15. Shaohui Tian, “4th World Buddhist Forum held in E China,” *Xinhua*, 2015年10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photo/2015-10/24/c_134746459.htm
16.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17. Laliberté, “The 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 by the CCP: A Selective Retrieval.”
18. “Taiwanese charity group opens branch on Chinese mainland,” *Xinhua*, 2010年8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8/21/c_13455075.htm
19. 在同一篇文章, 时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进一步暗示佛教原理可能影响胡锦涛时代的标语, 他说“佛教哲学为…中国和谐社会概念的重要关联。”见“China Highlights Role of Buddhism i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N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06年5月10日, <http://english.cpc.people.com.cn/65547/65571/4480957.html>
20. Guanqun Wang, “China’s top political advisor urges Taoists to contribute to social harmony,” *Xinhua*, 2010年6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china/2010-06/23/c_13365541.htm
21.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22. André Laliberté, “Buddhist Charities and China’s Social Policy. An Opportunity for Alternate Civility?” *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158 (2012): 95–117.
23. 同上。
24.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 Koen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upublisert manuskript*, mottatt 31 (2015): 15.
25. 一个在学术文献中被反覆提及的例子是中国佛协领导人对1999年反法轮功运动明确的支持, 甚至2001年和2002年, 佛教僧人代表团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增援中国外交官对法轮功的诋毁论述。2015年七月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浙江省当局找来佛教僧人作为平衡或挑拨一个针对强拆十字架的基督徒抗议现场。见 Ji, “Chinese Buddhism as a social force: Reality and potential of thirty years of revival” ;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 Yang Fan, Wen Yuqing and Luisetta Mudie, “‘Chanting Monks’ Deployed in Standoff Over Cross Demolition in China’s Zhejiang,” *Radio Free Asia*, 2015年6月27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churches-07272015103543.html>
26.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27. Cindy Sui, “Meeting Taiwan’s new-age Buddhists,”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anuary 29,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25772194>.
28. Tian, “4th World Buddhist Forum held in E China.”
29. Han Bin, “Conference of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opens in China Thursda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2014年10月15日, <http://english.cntv.cn/2014/10/15/VIDE1413351242533693.shtml>. 亦见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网站, <http://wfbhq.org/>
30. 部分官员可能试图利用佛教加强党自身正当性的一极端例子为2016年六月一张在中国社群媒体流传的不具名照片, 该照片内佛殿挂着一横幅写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 见 Jiang Wu, Twitter, 2016年7月1日, <https://twitter.com/gisphilia/status/748907792207978498>. 亦见 Wellens, “Failed secularisation, new nationalism and governmentality: The rise of Buddhism in post - Mao China” ; 李湖江, “佛教梦与中国梦”, 《法音》2014年第7期, 第41-43页。
31. Huaxia, “Xi calls for improved religious work,” *Xinhua*, 2016年4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4/23/c_135306092.htm
32. Brian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Charting Multiples Paths in The Revival of Monasteries,” 即将出版书之章节。
33. 王哲一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长直到2015年中, 其先前为国宗局一司副司长。 “Corrupt Official Gets Chinese Bloggers Excited,” *Real China (blog)*, *China Uncensored*, <http://www.chinauncensored.com/index.php/real-china/846-corrupt-official-gets-chinese-bloggers-excited>
34. 美国国会中国执委会, 2013年度报告, 2013年10月10日,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AR13DJ.PDF>; 国家宗教事务局, “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2012年10月22日, <http://www.sara.gov.cn/xwzx/xwj/17145.htm>; ‘ ‘China Bans Profiteering From Religious Activity,’ ’ *Xinhua*, reprinted in *China Daily*, 2012年10月23日,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2-10/23/content_15837978.htm
35. 余杭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门, “区民宗局对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夜间突袭检查”, 2015年3月25日, http://www.yuhang.gov.cn/index/oatest/201503/t20150325_985284.html; 重庆市民宗委, “重庆市全面启动道教活动场所标示牌挂牌工作”, 2015年3月16日, <http://www.sara.gov.cn/dfgz/204170.htm>

36.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 “宗教场所基本信息”, <http://www.sara.gov.cn/csjbxx/>, 2016年11月16日浏览; 重庆市民宗委, “重庆市全面启动道教活动场所标示牌挂牌工作”, 2015年3月16日, <http://www.sara.gov.cn/dfgz/204170.htm>
37. 见国家宗教事务局, “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 2010年, 12月20日。
38. 1994年至2011年間, 一年傳戒寺廟控制在五到八所; 每次儀式接受300受戒人員。“中國佛教協會1994年傳戒試點在江西永修縣雲居山真如寺舉行”, 《法音》1994年第12期, 第21頁; “抓好傳戒工作, 促進僧團建設”, 《法音》1999年第2期, 第9-13頁。
39. 对华援助新闻网, 「福建: 城管强拆村中新建寺庙与村民爆发冲突」2014年2月27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4/02/blog-post_3393.html
40.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 “Xu Zhiqiang,” 2016年8月2日, <https://www.nchrd.org/2016/08/xu-zhiqiang/>
41. 此非圣观第一次和中国当局的冲突, 他在2001年出家前, 曾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被迫囚禁一年, 此后他便面临不同程度的官方打压, 包括在2006年被强制驱逐出江西省一座寺院管理人, 因为他为1989年亡魂超度以及试图保护寺产被地方官员征收。Human Rights in China, “Top Buddhist Officials Join in Persecution of Activist Monk,” 2006年8月25日, <http://www.phayul.com/news/tools/print.aspx?id=13662&t=1>
42. Gareth Fisher,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Tourists: Buddhist Revival at Museum/Temple Sites in Beijing,” *Social Compass* 58, no. 4 (December 2011).
43.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44.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45. 控制寺庙和其收入一直是僧众、寺庙组织、和佛协之间的冲突点。普陀山官网, “2015年12月普陀山旅游主要指标统计数据”, 2016年1月6日, <http://www.putuoshan.gov.cn/Detail/322/114392.html>. David L. Wank, “Institutionalizing Modern ‘Religion’ in China’s Buddhism: Political Phases of a Local Revival,” in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ed.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Stanford, 2009)
46. Sarah Cook, *The Politburo’s Predicament: Confronting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sion* (Freedom House, January 2015),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politburo-predicament>
47.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48.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49. Susan McCarthy, “Serving Society, Repurposing the State: Religious Charity and Resistance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70 (July 2013).
50. 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51.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52.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3. 同上。
54. 同上。
55. 同上。
56. 见Temple West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7. 见Temple Buddha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8. 见Temple South example in Chang, “Spiritual State, Material Temp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us Revival in China.”
59. 张世辉, “谁来保护兴教寺”, 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3年4月16日,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92721-1.htm>
60. 最近类似案例于2014年八月发生在昆明磐龙寺, 该寺对外关闭来抗议地方政府单位迫使其「商业化与企业化」, 当时市长反应迅速, 坚称此事件仅是误会, 住持中午前重新开启寺庙。Nichols, “Tourist Temples and Places of Practice: Charting Multiple Paths in The Revival of Monasteries”; Patrick Scally, “Fearing ‘commercialization,’ monks briefly close Jinning temple,” *GoKunming*, 2014年8月18日, http://www.gokunming.com/en/blog/item/3298/fearing_commercialization_monks_briefly_close_jinning_temple
61. 与张贵闵电子邮件通讯, 2016年六月。

II: 基督教

迫害严重程度:

天主教

中度

基督教新教

高

迫害变动趋势:

天主教



略有降低

基督教新教



增加

主要调查结果

- 1 信仰复兴:** 自1980年以来,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迅速扩张, 到2014年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据估计分别达到5800万和1200万, 其中注册和非注册信众的人数基本各占一半。城市中受教育专业人士和富裕企业家的信仰人数显著增长。
- 2 主要政治管控措施:** 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对基督徒进行管控——鼓励有时甚至是强制他们加入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隶属于各种“爱国教会”, 并受“政审合格”的神职人员领导。那些因神学或其他实际原因而拒绝在国家认可的教会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 将遭遇礼拜活动场所被查封的风险, 并会面临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 3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自2014年初以来, 在官方有关“西方”价值观和宗教“中国化”的一片声浪中, 地方当局采取了更多手段来遏制基督教的传播。他们使用了一些以前甚为罕见的打压措施, 包括把矛头指向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导人、抓捕受理涉及基督教案件的人权律师、阻挠圣诞节庆祝活动等等。在最近对一些被政府认定为“异端”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打压行动中, 有超过400名宗教领袖和信众被捕入狱。
- 4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似乎即将取得积极突破。据报导, 双方正在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 事关对于中国一下子出现的超过40个主教职位空缺, 如何任命教皇和共产党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
- 5 回应与抗争:** 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引发了来自教会领袖和信众的强烈反应, 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官方“爱国教会”的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基督徒们发表联名信、抵制官方庆典仪式、举行室外礼拜、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 甚至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官方拆除十字架。很多基督徒也采取了更为细致的战术来削减政府管控的影响, 比如将传教活动与慈善活动相结合、参加私人组织的山区讲习班 (mountainside trainings)、培养与当地官员的合作关系从而减少遭受迫害的可能性。



浙江省三江教堂是一个受政府认可教会的财产。这是三江教堂2015年4月被拆毁前和被拆毁后的情景。

图片来源: Shanghaiist/China—in His image (英文博客)



“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讲话 ¹

“我会强烈要求[省民宗委]…立刻停止此类撕裂党群关系的拆除十字架的谬行。”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表于2015年7月的一封公开信 ²

历史演变

基督教据信最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来到中国，但到了唐王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它已经被打压殆尽。在元朝统治下的13世纪，基督教重新在中国出现并且经历了周期性的起伏消长——取决于基督徒与帝国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³ 在民国时期（1911-1949），像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样的首脑人物都是基督徒。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当政之后，中国政府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在1950年代，中国成立了几个“爱国教会”，从而在切断与外国教会之间关系的同时，建立起党和政府与中国数百万基督徒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Protestant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⁴ 成立于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隶属于政府的宗教团体也遭到解散，所有的公开宗教活动都被禁绝。不过，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主导了一段相对的宗教开放时期。那些爱国教会得以恢复，政府还提供资金修复教堂和一些重要的宗教圣地。

“他们（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是共产党，而我们的领导是耶稣基督。”

但即便在这一段更为宽容的环境中，周期性的镇压也是中国基督徒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征，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政府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和宗教领袖。由于中国政府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国家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和西方价值观与民主理念向中国进行渗透的管道，因而经常由于某些有国际关联的事件而引发中国对基督教团体的打压。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所发生情况就是如此。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某些团体，其影响力一旦超越了他们的省份，便会因“邪教”⁶的名义被查禁。⁷

镇压运动的典型特征通常包括突袭未经登记的查经聚会或宗教仪式、抓捕数百名宗教领袖和信徒。在胡锦涛当政期间，绝大多数被捕的人在短期行政拘留之后都被释放，但每年都有数十人被判处“劳教”或入狱。⁸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规章条例日益繁多。随着2005年实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海内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曾经乐观地估计这些新的条例或许能让家庭教会获得登记注册，并且无需隶属于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然而，那些教会领袖和试图帮助他们的律师们很快发现登记注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都是危险的。结果，到了2010年，只有为数不多的信众团体获得注册，在北京一地据估计有2000间家庭教会，而相比之下只有5所“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及8个下属的聚会地点。⁹

那些一直拒绝加入官方认可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和会众，就他们的犹疑给出了神学的和实际的理由：

- **神学理由：**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争论的焦点是他们对梵蒂冈权威的信仰。正如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一封信中写道的，“如果一个教会旨在‘独立’于罗马教廷，就宗教层面而言，这是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的。”¹⁰ 有些新教教徒也表达了类似的关切，他们认为“他们（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是共产党，而我们的领导是耶稣基督。”¹¹ 还有一些基督徒则发现“爱国教会”为了迎合中共优先关注的问题而更改教义，而这些更改是与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大相径庭的。
- **历史理由：**有些非官方教会的宗教领袖和信众则因为厌恶那些“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袖们在毛泽东时期迫害基督徒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拒绝与之伍。¹²

- **官僚制度：**对于很多非官方教会而言，与申请注册相关的种种行政要求令人不堪重负而且不切实际。¹³ 而一个教会一旦登记注册，政府则时常会干涉教会活动的管理，甚至布道的话题。有时，在一个地理辖区之内，获得许可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数量是受到限制的，这意味着一个非官方教会必须与一个更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合并而不能自己单独注册。¹⁴ 数量有限的官方教会又导致教堂人满为患，这从而又刺激了非官方会众团体的形成。¹⁵
- **安全原因：**登记注册的要求之一是申请人须向宗教事务官员提供成员名单。鉴于以往的宗教迫害运动，很多家庭教会领袖们不愿意这么做，主要是担心这些信息可能被当局用来骚扰他们的会众成员。¹⁶

基督教在当今中国

尽管时不时地遭遇打压，有时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残酷的迫害，自198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总体上的发展轨迹还是呈现出显著的增长，其中包括胡锦涛当政的十年。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官员和教会（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之间形成了合作的或者至少是容忍的关系。

各种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算悬殊很大，部分是由于未注册教会礼拜的信众不大可能在人口普查或舆论调查中坦言他们真实的信仰。201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的报告说，中国有在政府注册登记的2900万新教徒和570万天主教徒。¹⁷ 而可资利用的调查和学术研究结果则显示，至少另有同等数量的信众在非官方注册场所进行礼拜活动，由此得出的估算是有5800万新教徒和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¹⁸

这些时常为观察人士所引用的信众人数，使得中国基督徒的总人口达到7000万，也使得基督教在中国成为继汉传佛教之后第二大有组织的宗教。有些学者和福音派机构相信中国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可能高达一个亿，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非官方教会。¹⁹ 由于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对基督徒人数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有些地方这两种教会的领袖们达成默契，信众个人可以在多个场所进行礼拜。²⁰

中国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包括诸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查经小组、祈祷会、圣餐礼和洗礼等常规活动。中国的天主教徒会为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节日举行特殊的仪式（大弥撒）。²¹ 中国的新教徒也纪念圣诞节和复活节。有些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会进行一些糅合了基督教和中国民俗传统——诸如祭祖和看风水等等——的“复合型”活动。²²

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

即便是从官方资料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数据只包括了年龄在18岁以上并在注册教会进行礼拜的信众。这些数据显示，新教徒人数从1982年的300万增长到了2014年的2900万，增长近10倍。²³ 或许在过去十年，基督教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城市地区。这一增长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老板基督徒”的出现——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²⁴ 虽然如此，基督教在农村地区也依旧盛行。²⁵

基督教的增长可以部分的归功于在毛泽东死后，由于管制的放松而带来的广泛的精神追求的复兴、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以及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很多中国人失去吸引力之后而产生的道德真空感。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因素推动了基督教的扩张，而代价或许是汉传佛教和道教等更加“本土”宗教的式微。²⁶ 有些专家认为，在“文革”期间对所有宗教的严厉打压重新配置了“宗教市场”，而其他中国（本土）宗教影响力的衰落则为基督教在中国赢得立足之地创造了契机。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并致力于一个庞大的经济发展规划，很多大学生

和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最近，由于中国敌视宗教的政治环境，新教“家庭教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和新信众的加入。²⁷这与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状况形成了对比，这些宗教的活动与实体性的庙宇建筑紧密相连，而这些建筑通常都是固定的、时常甚至是一些古迹，特别容易受到政治管控和限制。

在社会经济和结构性的因素之外，尽管劝说他人改变信仰从严格法律的意义上是受到禁止的，但是巧妙的传教手段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呈指数级增长。比如，中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发起和参与慈善工作。一些大型基金和机构的运作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能够募集数百万美元的救济资金。还有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活动，诸如通过当地教会赞助医疗诊所、文化演出或社会项目。这些活动项目给中国基督徒提供了个人精神满足和“做善事”的管道。它们也间接地向那些非信众展示了宗教对个人和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并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分享了他们信仰的原则与益处。²⁸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掌中共，基督教此前在中国业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增长，但国际人权倡导团体也注意到，在过去若干年有一股逐渐抬头的迫害宗教的势头。²⁹由于官方对几位主教的任命没有得到教宗的认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而“家庭教会”则面临注册登记、与“三自”教会合并甚至遭查封等日益沉重的压力。³⁰

这位新领导人上台伊始，似乎形势并无明显变化。不过，人们还是注意到2013年在全国各地发生了数十起打压事件，尤其在北京、河南和山东。³¹到2014年底，针对基督徒，尤其是对新教徒和几个不同的“类基督教”团体的迫害事件出现了激增。³²中国的一些过去给基督教提供相对宽松环境的地区成为新的引人注目的镇压区域，直接遭受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人数比过去多出数千人。这种高强度镇压行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和2016年初。³³

在迫害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当政后，出现了若干新现象：

到2014年底，针对基督徒的迫害事件出现了激增。

1. 拆除十字架运动：自2013年3月开始，浙江省各地当局开展了一场为期三年的所谓“三改一拆”运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教堂建筑。到2016年中期，至少1500座教堂的屋顶或墙面上的十字架被拆除，超过20座教堂被拆毁。³⁴运动最初是在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然后很快波及全省，甚至蔓延到农村乡镇。成为打击目标的主要是新教教堂，不过也有数十处天主教礼拜场所的十字架遭到拆除。这场运动到2016年初依然在迅猛开展，据报仅在2016年3月3日一天就有49处十字架被拆除。³⁵

当局试图用“违章建筑”、“违反规划”等借口为其之前的强拆行为辩护。在某些案例中，有的教堂确乎超过了政府批准的范围，³⁶但是政府的内部档案则显示出，这场选择性的以教堂为目标，集中拆除十字架的“三改一拆”运动还有其他动因。³⁷虽然不如浙江省这样系统性地进行的，但是在福建、河南和安徽等基督徒相对较多的省份据报也出现了强拆教堂的情况。³⁸

这场运动的规模以及与之前对基督教的宽容所形成的反差，已经在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2014年以前，浙江省是一个对基督教相对开放的省份。当局对基督教采取了宽松的政策，甚至未经注册的基督教团体也能获准建造自己的礼拜场所。有报导的迫害事件寥寥无几。³⁹而在过去两年，由于信众们试图抵制官方的打压运动，紧张关系日趋

升级，静坐抗议、大规模拘禁和部署防暴警察等状况日益频繁。⁴⁰ 有些抵制行动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在2016年4月，河南省一名牧师的妻子遇害，当时她和她的丈夫因试图阻止政府拆除他们的教堂而遭推土机掩埋。⁴¹

- 2. 对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袖的打压：**浙江省此次“反十字架”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大量“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下属的教堂成为打击目标。由于来自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甚至那些政府下属的各种“爱国”宗教协会的领袖们，一直力图规避政府的干预，他们也要面对拘留和监禁等惩罚——如此待遇在过去只属于他们的那些“家庭教会”同仁们。

其中最为突出的案件当属包国华案和顾约瑟案。包国华是政府下属的中国基督教协会成员和一座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他在2016年2月被判入狱14年。⁴² 顾约瑟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一座政府许可的大型教会的牧师。这座教会曾经被政府树立为中国宗教自由的典范，顾约瑟牧师被开除出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并于2016年1月至3月遭到拘押。⁴³

来自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他们也要面对拘留和监禁等惩罚——如此待遇在过去只属于他们的那些“家庭教会”同仁们。

中国政府声称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财务问题，但是这二人公开反对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立场，以及他们遭遇惩罚的时间点都让很多观察人士相信政府对他们的指控是捏造的和报复性的。严惩“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的案件在浙江省之外也有所报导，其中包括2014年河南省判处张少杰牧师入狱12年。⁴⁴ 在2013年之前，“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人受到如此惩处的案例非常罕见。⁴⁵

- 3. 大规模拘禁“邪教”组织成员：**自2014年初开始，中国各地当局强化镇压，甚至铲除各种“类基督教”派别团体，这些派别与主流的新教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些团体的数百名神职人员和信众遭到拘禁或被判入狱。这次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2014年5月的一起事件而引发。据称这次事件中，一名妇女由于拒绝向那些劝说她入教的人提供电话号码，在山东省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被数名“全能神教”（亦称“东方闪电”）信徒殴打致死。⁴⁶

然而，对中国法院若干判决的一份分析结果显示，此次运动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与麦当劳餐厅事件无关的其他8个“类基督教”团体。⁴⁷ 在这些法院判决中，大多数人被判入狱似乎是因为他们和平地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非由于涉及对他人实施暴力。这次运动中被清除的人士都是根据《刑法》第300条遭到起诉。这一条款用来惩治“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最高可以判处（被告）无期徒刑。此法条创制于1999年底，用于开展镇压法轮功团体的运动（详见法轮功章节）。法庭档案显示，至少有439名来自各“类基督教”团体的人士，在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之间根据这一条款被判处最高10年刑期，各起案件涉及28个省和直辖市。⁴⁸ 有关起诉在2014至2015年达到高峰，2016年初开始放缓，大约80%的起诉与备受争议的“全能神教”有关。⁴⁹

这些调查结果有助于解释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所公布的数据，这些数据注意到在2014年基督徒被判入狱的人数急剧增加。⁵⁰ 但是无论主流新教领袖还是来自地下“家庭教会”的会众都有人因《刑法》第300条的规定而遭到指控和判罪，这一现象显示一个旨在迫害某一个宗教团体的压制性法律工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加其他团体身上。事实上，据说有几位政府代表对一位人权律师解释说，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任何非官方宗教团体都可能被当作“邪教”并因此受到惩处，无论这个团体是否在政府查禁的名单上。⁵¹

4. **打压协助教会的律师：**多年以来，那些代表受迫害信众的律师一直面临官方的打击报复，手段包括剥夺律师资格、监控和人身伤害。在2012年之前，有少数维权律师遭到拘留和监禁，比如高智晟和王永航律师，但这似乎是由于他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引发并非是由于基督徒。在习近平治下，维权律师被捕入狱的人数总体上有所上升。作为2015年7月开展的镇压运动的一部分，若干曾经协助受迫害基督徒的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被捕，遭遇数月的拘禁、虐待和强迫在各种媒体上认罪并诋毁自己维护人权的工作。突出案例包括张凯律师案和法律助手赵威案。⁵² 其他一些律师，比如李和平，直至2016年9月还依然被拘押，并将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⁵³ 据报导这三位当事人自己都是基督徒。
5. **加强阻挠圣诞节庆祝活动：**圣诞节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商业性节日，⁵⁴ 但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全国不同地方采取措施防止基督徒在一起进行礼拜或庆祝圣诞节。⁵⁵ 非官方的教会报导说，他们在组织大型的祈祷会或聚会时遇到了更大的障碍。西安市和温州市的政府当局则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参与圣诞节，还在2014年禁止大学生庆祝圣诞节。⁵⁶

总而言之，种种这些趋势反映了有关新教团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潜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学者特蕾莎·怀特（Teresa Wright）和建瑞珍（Teresa Zimmerman-Liu）在2013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教关系的各种不同模式，其中包括对注册教会更加宽容、在浙江和广东这样省份赋予非官方基督教团体更大的自治权以及在城市地区较少使用暴力镇压手段等等。⁵⁷ 从上述的分析很容易看出，自2013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重点地区此类政教关系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激发了中国当局与官方和非官方新教团体之间更大的冲突。

镇压运动的加强及其所采取方式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日益普及或许激发了某些中共领导人采取反制行动。基督徒人数的可靠估算为7千万至1亿，这使得基督教恰好达到了法轮功在1999年的同样规模，当时中共对法轮功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镇压。这个人数也使得基督教信众几乎和中共党员人数一样庞大——2015年，中共拥有差不多8800万党员。⁵⁸ 与法轮功相比，尽管中国的基督徒在领导方式、教义和宗教活动等方面都更加松散，但是其信众庞大的人数和公众可见度或许已经惹得中国领导人寝食难安。

西安市和温州市的政府当局则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参与圣诞节。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当中进行传播的各种管道遍及从贫困农民到富有企业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并且建立了跨省份和跨国（包括通过互联网和维权律师）的联系网络。所有这些特质都符合一些专家认为的导致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理由。⁵⁹ 一份在一些媒体报导中被引用的政府内部文件明确表示，浙江省的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目的就是管制“过分普及”的宗教活动。⁶⁰

导致加强镇压的第二个因素是，官方越来越强调“中国化”基督教并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应措施早在2012年11月之前业已存在，但是这种论调在之后已经蔚然成势并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在2015年5月的一次讲话以及后来在2016年4月的几次谈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中共宗教工作的“四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化”，包括宗教教义的中国化。⁶¹ 虽然在实践层面人们对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化”依然有些不知所云，不过已经看到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涉及到教堂建筑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降低教堂的公众可见度。这是2014年底在浙江开展的一场运动试点的重要内容，这场运动就是在浙江省内的基督教小区实施“五进五化”。⁶² 对教堂建筑的重点关注有助于解释拆除十字架和其他对教堂外观的改动。到2016年中，其他方面明显的“中国化”包括，从一些带有民族主义的措施，像要求在教堂建筑上挂国旗，⁶³ 到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倡议，像在基督教会众当中推广中国茶文化。⁶⁴

当前打压趋势背后的第三个因素有关反西方的政治环境以及习近平领导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整顿，包括官方针对外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海外“敌对势力”对宗教领域的渗透所发出的警告。此类言论，再加上尤其针对新教教徒的各种强化限制措施，似乎反映了中共对这样一个去中心化宗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焦虑——这个宗教的领袖们与像美国 and 南韩这样的民主国家的教友们有着私人联系，即便基督教实际上已经相当“中国化”了。

至于具体说到浙江省逐步升级的紧张形势，省委领导人的主动发起以及该省主办一个国际性政治峰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年12月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直与拆除十字架运动有着密切关联，据传闻他在2013年10月的一次温州之行中说，大量明显的教堂建筑和十字架似乎与风景不“协调”。⁶⁵ 中国于2016年9月在省会杭州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议则引发了当局另一轮措施，加快遏制基督教在这个城市的公众可见度。⁶⁶

在习近平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夏曾经是习的副手。⁶⁷ 这种密切的关系也使得人们推测习近平自己或许也插手了镇压运动的发起。⁶⁸ 由于没有渠道获得中共的内部数据，因此无法得知实情。但是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两年，引起了国内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习近平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尽管中国的天主教也受到了上述事态的影响，尤其是浙江的拆除十字架运动，⁶⁹ 但是政府对待天主教政策的总体轨迹不同于新教所面临的局势，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出现积极的变化。在经历了2010年至2012年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的明显恶化之后，到2016年年中围绕双边关系出现了一种乐观情绪，并且有希望获得某种突破，尤其在有关主教任命问题上。

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3月就职，仅比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早三天。几乎上任伊始，这位新教宗便开始对中国和习近平本人频频示好。他在当月就给习发去贺信，还任命了某位有中国经验的人物担任梵蒂冈的高级外交官，并试图在2013年9月同时访问美国期间与习近平会面。教宗试图获得北京方面青睐的努力在他的言辞中也显而易见。在2016年1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他表示敬佩中国伟大的文化和古老智慧，还向习和中国民众发出了农历新年问候，一位教宗向一位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姿态还是前所未闻。⁷⁰

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教宗的这些努力。在2014年7月至2016年1月之间，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代表举行了三轮非正式会谈，⁷¹ 同时中国国家媒体对教宗方济各的报导也一直相当正面。⁷² 北京方面避免单方面任命主教，2015年8月一位得到双方认可的主教在河南省就职，这是三年中第一例此类任命。⁷³ 2014年8月，中国允许教宗在访问南韩返程时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出这样的许可。

由于主教职位在中国累积了大量空缺，双边关系出现明显解冻的时间点就尤为意味深长。职位空缺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源于在1949年以前任命的老一代主教或是退休或是去世。如果北京不经过梵蒂冈的认可而在这些职位上哪怕是部分地任命自己的主教，那么非法主教的人数就将从不到10人上升到超过30人。这将会加深天主教领袖们之间的裂痕，他们中有些是只被梵蒂冈承认的，有些是得到双边认可的，而有些则仅仅是中共机构任命的。教宗方济各或许是有意想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他最近的努力同梵蒂冈与全世界共产党政府达成和解的政策是一致的。

从北京的立场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济各成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对话者。首先，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而非西方欧洲国家的国民，人们会觉得教宗方济各

不太会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而中共一直担心有人利用宗教权威来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

其次，作为第一位耶稣会教宗，方济各表示自己与中国有着特殊而强烈的联系。耶稣会士们在向中国引入天主教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一些奉命（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代表们，如16世纪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中国的帝国朝廷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⁷⁴

第三，教宗方济各所表达的对中国伟大历史与文化的敬佩与习近平自己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吻合。教宗示好的举动看上去已经产生了一些良好效果，一些政府下属的天主教机构的领导人敦促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并允许教宗访问中国。⁷⁵

最后，由于在全国各地只有1200万信徒，尽管存在与境外宗教权威的联系，但无论是人数规模还是地理分布范围，天主教或许是中国最没有政治威胁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利用当前时机缓和与教宗的紧张关系，尤其是一位大家认为不太可能利用权力去刺激反共情绪的教宗，将会改善习近平的国内国际形象。

随着幕后谈判的推进，观察人士相信桌面上可能会有三种神职任命的安排方案：

- 梵蒂冈向北京提供一份可以接受的候选名单，北京方面来做最终选择。在越南就是采取类似的模式。
- 梵蒂冈做出具体选择，但之后必须通过中国官方管道获得确认。
- 北京方面采取主动，但给予候选人足够的时间以赢得梵蒂冈的认可。在过去10年里，若干神职任命采取了这种方式。⁷⁶

从北京的立场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济各成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对话者。

尽管在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徒中存在一种期望和乐观情绪，但是在香港和大陆都另有一部分人对双边恢复邦交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北京会迫使梵蒂冈做出让步从而加强政府控制，但又未必会减少（对信徒的）暴力迫害和监禁。不过，对于那些既想效忠梵蒂冈又想免遭政府迫害的天主教徒们而言，双方关系的改变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道德窘境，而且能够使得教会内部被教宗认可的和未被认可的各方更加团结。

2013年3月以来实际的事态发展增加了怀疑论者们的担忧。即便是在中梵关系改善的背景之下，对地下主教和神父的拘押一直时有发生。⁷⁷ 上海的马达钦主教2012年在他的神职任命仪式上与“天主教爱国会”（CPA）分道扬镳，之后他一直被软禁在一所神学院内的家中。2016年6月，一篇以马达钦的名义发表的博客文章公开承认当时的决定是一个“不明智的举动”，解释说“受到外界的蛊惑”，还赞扬了“天主教爱国会”。⁷⁸ 有些观察人士质疑这篇贴文的真实性。他们注意到（马受到）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如果这篇文章确是出自马的手笔，⁷⁹ 同时还对梵蒂冈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表示震惊。⁸⁰

另外，2013年4月，政府实施了一套更具限制性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新条例，以取代1993年开始实施的旧条例。⁸¹ 新条例明确要求（主教任命）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并且将主教任命的最终决定权赋予了中央有关当局——尤其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从而使得主教教区更加难以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良好关系而获得商讨的余地。

重要的是应当注意这并非第一次出现希望。当前正在探讨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提议在2007年也曾

讨论过，但仅仅三年之后双方关系又趋恶化。⁸²

政治管控的关键手段

中国当局采用了若干主要策略来影响政府认可的教会的发展，同时遏制非官方教会的盛行和成长。

- 1. 官僚机构的监管和登记注册的压力：**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基督教实施控制的基础是政府在各地的宗教事务局系统和各种“爱国”协会，包括“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新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些机构的章程传达了他们明确的政治优先级。学者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注意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强调服从党的领导，拥护政府的权威和社会主义祖国。”⁸³

与这些协会密切合作的教会和宗教领袖们会得到政府资金以及获准去官方神学院受训，但是必须保证做到“三个固定”——固定集会地点、固定领导和固定覆盖范围，还要拒绝接纳18岁以下的会众。⁸⁴很多教会领袖和会众宁可在政府管控之外运作，从而保持更大的自治，尽管这样会带来风险。

同时，中共自己官僚主义的限制使得官方教会实际上不可能满足国内所有基督徒的需要，规则又不允许没有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或“天主教爱国会”的教会获得政府注册。⁸⁵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法律管辖之外的信仰空间，而地方官员则一直采取各种不同手段迫使那些未注册的团体或是解散或是与附近的官方教会合并。

- 2. 对礼拜场所的限制：**很多被报导的迫害事例都涉及到地方当局为了限制基督徒在特定的地点进行礼拜、集会和培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用周期性的突袭驱散未注册教会的《圣经》培训课程，向业主施加压力取消租房协议从而阻止未注册教会在他们选择的地点集会。⁸⁶在更加极端的案例中，安全人员会切断教会场所的水电，阻止信众进入或是拆除教堂建筑。

直到最近，这些手段都主要是针对未注册教会，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城市会众团体比如北京守望教会，试图迫使信众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或是拆分成更小和不那么有影响的团体。⁸⁷然而在过去三年里，越来越多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也遭遇了对他们礼拜场所的限制、强拆或是与地方当局的物业纠纷。⁸⁸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遭遇骚扰和强拆的趋势则根绝了非官方教会申请注册的所有想法。

- 3. 对神职人员的管控：**各种“爱国”协会的一项关键功能就是培训、任命、指派和管理神职人员。中共希望培养能够教导信众们“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爱国”宗教领袖。⁸⁹24所国家和省区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神学院和13所“天主教爱国会”的神学院承担了这些培训工作。⁹⁰

心怀抱负的学员们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神学院）偏向于招收年轻申请者（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文化考试和由当地宗教事务局通过背景审查进行的政治审核。过多的申请人和有限的名额使得神学院在招生条件上非常苛刻。毕业生还必须完成另外一整套步骤才能成为“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包括在教堂见习和神职任命，所有这些都要受到宗教事务局的严密监督并且要得到“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各级领导们的批准。

对于天主教而言，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遴选和任命主教的机构，包括那些未获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近年来，（政府的）一种做法在政府认可的神职人员中引起不满，政府官员们

有时会强迫那些经梵蒂冈认可而获得神职任命的主教，去参加那些未获教宗同意的主教的任命仪式。而这些“不合法”主教出席其他各种不同宗教仪式或神学院毕业典礼同样加剧了紧张关系。⁹¹

政府培养和任命政治忠诚的神职人员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步伐，这也破坏了中共的既定目标。事实上，学者卡尔森·维拉（Carsten Vala）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共自己的一些管控措施——包括僵化的培训课程、对神学院申请人的政治审查，以及政府对教会任命和神学理论的干预——已经导致了“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奇缺。反之，那些未注册教会在领导人培养方面则更加多元、灵活、简单和自主。这给信众，甚至“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培养的牧师提供了更多机会成为教会领导人，尽管会面临更多被骚扰的风险。⁹²

4. 篡改基督教义和进行政治教育：中共认为神学理论是左右信众政治取向的核心，并一直试图淡化基督教信仰的某些方面而倡导另外一些方面。1998年，“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丁光训主教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他提倡“淡化”“因信称义”的传统教义，而强调做“守法好公民”，本质上是要鼓励中国的新教徒在宗教权威之上更要服从党的权威。丁光训还支持那些符合党的优先利益的教义解释，比如维护国家统一和提供社会福利等等。⁹³

这种神学手段已经成为很多神学院培训课程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布道内容的基础。⁹⁴

在神职人员进行定期的“政治教育”是神学院培训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2015年7月，上海当局强令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参加“再教育”学习班，主题是当时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⁹⁵与此同时，还投入大量资源以管制宗教书刊的出版，惩治那些印发非官方书刊的个人，并以从事“非法出版”的罪名对他们进行监禁。

5. 拘押和暴力镇压：那些在非注册教会坚持领导工作和礼拜活动的人，以及反对或规避政府管控的人，都面临拘押、监禁甚至是酷刑的风险。绝大多数遭拘押的基督徒都受到了相对比较短期的拘留，从数小时的审问到15天的行政拘留不等。对于占遭拘留基督徒大部分的普通信众尤其如此。然而，每年总有一批主流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遭到长期居留，“被失踪”或被判入狱。

很多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抓捕和监禁案例涉及到教会领袖或神职人员，自2014年以来，他们在遭拘捕的基督徒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⁹⁶这或许显示了官员们正在采取一个更加一致的举措通过惩治神职人员来管控信众，但这也有可能是针对教会领袖们在与政府当局的互动中越发地敢言而做出的反应。

遭监禁的基督徒通过律师和家属定期传递他们遭遇酷刑的报告，⁹⁷ 尽管受到这样的虐待基督徒并不比其他一些少数宗教团体更加普遍。反而是在近些年，基督徒似乎更容易遭遇拘禁之外的暴行，尤其是当他们对防暴警察和拆迁队的时候。

经济奖惩措施

与佛教寺院相反，地方官员通常不会将基督教堂和神学院看作潜在的带来收入的管道。但是，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一些党政官员正在鼓励或迫使基督教机构的领导人将他们掌握的资源转向一些能够吸引游客和建设地方经济的项目上。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卡尔森·维拉

政府培养和任命政治忠诚的神职人员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步伐。

(Carsten Vala) 引述了一名河南省宗教事务局干部的事例，此人说服了河南省新教神学院的领导人改变了校园的设计方案。修改后的校园设计方案包括一条有各种小吃摊位的步行街，一组描述《圣经》场景的真人大小的雕塑，和一座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大教堂。⁹⁸

由于针对基督教日趋敌对的政治环境，地方官员类似的鼓励已经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在近年来一起最为人知的强拆案件中，浙江省温州市的三江教堂在经历了会众与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僵持之后于2014年4月被拆毁。有些官员辩称这座宏大教堂建筑的建造超出了许可范围，并以此为强拆行动辩护。然而，据一位熟悉案件细节的牧师说，“原本的计划并非要建这么大一座教堂，但是政府鼓励建造一个更大些的，因为……政府希望它变成一个旅游景点。”⁹⁹

事实上，当地官员还曾经称之为“样板建筑”。¹⁰⁰ 但是当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3年底巡视该地区之后，地方官员们的计划出了岔子。夏宝龙对教堂建筑在周围风景中过分突出表示了忧虑，有些消息来源称是他亲自下达了强拆指令。¹⁰¹ 在另外的一些案件中，地方官员自己下令拆除了一些位于市区的教堂，因为他们把这些地块用在更加有利可图的项目上。¹⁰²

近年来有数十座官方认可的教堂遭到强拆，这些教堂都是靠当地会众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除了实体物业的破坏，中国官员还时常给基督徒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有数十座官方认可的教堂遭到强拆，包括三江教堂，这些教堂都是靠当地会众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这种方式造就了信众与他们的礼拜场所之间一种特别紧密的私人联系。当看到教堂建筑在他们眼前被粗暴拆毁时，这种私人联系更强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失望之情。

政府还采取一种更为直接的处罚方式——向会众收缴罚款以阻止他们参加非官方教会。隶属“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督徒也同样被处罚款，从而防范其他政府任命的宗教领袖的公开反抗。例如，“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张少杰在2014年被判处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合1.6万美元）。这一判决促使有关当局向张少杰的家属施压，让他们搬出自己的家从而可以将房屋拍卖。¹⁰³ 抢夺和没收房产——包括个人贵重物品——是镇压非官方教会、牧师和成员的惯常做法。¹⁰⁴ 而政府工作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参与地下宗教活动，则会遭受无薪停职到开除公职等等经济报复。¹⁰⁵ 自2014年以来，四川和贵州的一些家庭由于参加地下教会的活动而被暂停了社会福利待遇，¹⁰⁶ 或是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的孩子随同父母参加活动，那么将来的教育机会将会受到限制。¹⁰⁷

社会反响和抵制

中国的基督徒们对严格的规章制度、社团管控和周期性的迫害运动用各种不同方式作出了反应。这些反应跨越了注册和未注册教会，进一步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年官方敌对态度的加强，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在政府认可的教会领导人和信众中间也相应地增加了，并导致他们采取更多的应对手段。

不过，中国基督徒最普遍的抵制方式或许只是去政府指定地点之外去寻求更多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有时这是得到官方默许的，他们并不直接挑战政府的宗教政策或是试图改变政治制度。这些努力包括：

- 1. 无声地回避限制：**很多基督教领袖和世俗信众各自每天都会设法扩展自主宗教活动的空间，同时避免来自有关当局的打击报复。非官方教会的会众和查经小组会在私人房屋、办公场所，或是饭店会议室等处聚会，而拒绝去官方指定的场所进行礼拜。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学者苏珊·麦凯西 (Susan McCarthy) 描述了在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天主教进德公益基金会 (Jinde Charities)，那些神父、修女和志愿者们是如何把宗教象征和精神意涵

巧妙地融入到他们的慈善项目当中。¹⁰⁸ 世俗社会活动——像参加马拉松、举办圣诞慈善晚会或是提供地震救援——对于宗教组织的工作人员个人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同时也是展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一个手段。

另外一个例子是，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注册和非注册会众团体的基督徒，在特定的时间参加了由设在香港的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主办的培训节目。这套获得“三自爱国教会”许可的广播节目，在复杂的、政治化的官方神学院之外，提供一个替代性的、低风险的培训管道。¹⁰⁹ 其他自主学习的机会包括中国境外提供的在线神学院课程、由海外牧师和学者在访华期间举办的非官方研讨会，以及通过像微信这样的应用程序分享的宗教媒体内容。¹¹⁰

这一系列抵制行动的另一个极端是，很多基督徒从事被政府禁止的活动，并想方设法保持隐密。他们参加在农村山区举办的培训讲习班，他们在屋子里装备隔音暗室来举行地下宗教聚会，印制和散发非官方的宗教出版物，或是通过陆路逃往东南亚国家。¹¹¹

一些警察在突击检查和镇压行动开始前向非官方教会的领导人发出警告。

2. 发展与地方官员的合作关系：很多非官方教会一直寻求与当地干部、警察和宗教事务局的人士培养积极的关系。他们努力对指派来监视他们的警官以礼相待，坦率地告知他们聚会时间，或者力争展示他们是好人——没有兴趣激起社会纷争。¹¹² 相应的，一些官员会在他们的辖区内默许“家庭教会”的存在，而警察在突击检查和镇压行动开始前向非官方教会的领导人发出警告。¹¹³ 这种态势大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并且使得非注册会众可以建造正规的教堂建筑。近些年随着针对基督教的总体政治环境的恶化，尚不清楚这种类型关系的空间有了多大程度的缩减。

3. 法律行动和教育：当遭遇抓捕或财产纠纷时，无论是注册或未注册教会的领导人和成员都会与维权律师合作，来提起行政诉讼或是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清白和宗教自由进行辩护。尽管有遭遇打击报复的风险（包括针对律师自己），尽管成功的希望渺茫，这些努力依然在继续。¹¹⁶ 在过去十年里，一位基督教维权人士为全国各地的基督徒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尤其是为那些来自未注册教会的信众，教育他们有关在中国的法律之下他们自身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辨别官方的那些行动是违法的。据报导，这些课程以及中国基督徒法律意识的广泛提高，已经为那些草根信众提供了谈判策略和论据，从而可以在与当地警方的交流中得以运用，并且在一些案件中阻止了粗暴的迫害行动。¹¹⁷

尽管上述方式在某些时候证明是有效的，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打击或者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有些基督教领袖和信众已经转而采取更加公开和对抗性的战术来抵制政府侵权或要求更加自由的注册登记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自2013年以来，更多来自政府认可教会的基督徒和甚至那些“爱国”协会自己也已采取这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吁求。在很多事例中，这种更加果断的态度已经招致当局的打压，包括拘留、监禁和殴打。公开抵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对政府行为发表书面抗议信：**无论是一些知名人士还是教会领袖集体或教友团体，都曾向政府有关部门递交过公开信或请愿书；这些文件然后被发布在网络上，或是通过社交媒体流传。2014年之后，写作和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信件，向省和国家当局呼吁在浙江省停止移除十字架和强拆教堂的运动。引人注目的是，有很多公开信来自政府认可的教会下属的个人或机构，包括省属的“爱国”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和由政府批准的朱维方主教领导的温州天主教神职人员。¹¹⁶
- 2. 抵制被认为“不合法”神职人员参加的宗教仪式：**一些天主教徒一直拒绝参加或参与有未获教宗认可的8名主教出席的庆祝仪式。在2012年的神职任命仪式上，上海主教马达钦灵

巧地拥抱了3位“不合法”主教，没有让他们在他身上履行“覆手礼”仪式。¹¹⁷ 2014年7月，北京的一所官方神学院宣布一位被梵蒂冈逐出教会的主教将会主持毕业弥撒，这个班级的毕业生拒绝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¹¹⁸

3. **进行户外礼拜：**当未注册教会因政府向房东施压或是政府其他形式的阻挠而被逐出他们的聚会场所，有些人会代之以在公共场所进行礼拜。近年来最突出的案例是北京的守望教会。它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非官方会众群体，2009年被迫搬离他们的聚会地点，教会领导人开始在公共广场或公园进行祈祷活动。然而在经历几轮抓捕之后，政府的镇压措施似乎在2015年获得成效，教会信众分散成规模更小的“家庭教会”团体或其他形式的会众团体。¹¹⁹
4. **用身体阻挡强拆教堂和移除十字架：**在过去数年的很多场合里，大批信众——有时一次有数百人——聚集在受到威胁的礼拜场所，手挽手组成“人墙”，进行静坐并且歌唱赞美诗，或是堆起石块阻断进入场地的通道。¹²⁰ 在有些案例中，镇暴警察和拆迁队强制驱散聚集的人群，不过尤其在一些比较小的村庄或是比较低调的教堂，信众们成功了阻止了拆毁。

据浙江的一位牧师说，这些方式只是阻止了“相当少”的拆除十字架行动。在另外一些案件中，他说，会众们“在十字架被移除之后，马上又竖起了新的。”还有一种更加间接一些的响应方式，有些基督徒制作了大量尺寸较小的十字架，可以放在车上，房屋上，或是路边，以此来挫败政府此次运动的关键目标——降低这一地区基督教存在的可见度。维权人士则通过照片或影片记录他们的努力，并将这些数据在国内外流传，以期达到最大的影响力。

未来展望

2012年11月以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压基督徒尤其新教徒的行动似乎达到了某些目的。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明显不如四年以前那么显而易见了，传播他们信仰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减少了很多，一些维权律师和政府认可的教堂领袖们在藐视政府命令之前要三思而行了。

不过从中共的观点看，政府的行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尽管注册教会和非注册教会之间界限的模糊已有一段时间，但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两大社群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团结。拆除十字架尤其成为了中国基督徒之间凝聚力的关键纽带。这一原因，再加上与一些官员个人有关的因素，或许导致了拆除十字架的行动没有从浙江扩散到其他省份。

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几年里，其他加强管控的因素和强制性的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出现。如果当前袭扰和监禁“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及其领袖的轨迹延续下去，非官方教会将会更没有理由去注册，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袖和成员们甚至可能会选择“叛变”，转而大批投向非注册教会。

对于天主教而言，就在本文写作时，在梵蒂冈和北京之间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一个协议似乎呼之欲出。如果这一突破最终实现，那么双边最重要的问题将是这个协议能否减少中国的草根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如果不能，那么梵蒂冈将进退两难——如何做出不失原则操守的响应，同时还要避免新协议不至于破裂。对于像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 Ze-kun）这样怀疑这笔交易的人，这将是让人忧心忡忡的场景。

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两大社群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团结。

注解

1.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警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美联社，2016年4月24日，<http://bigstory.ap.org/article/0181dc9eb62b4c91ae76818b97c17eb0/chinas-xi-warns-against-religious-infiltration-abroad>.
2. China Change, “Christian Sentiment in Zhejiang against Cross Removal: Three Statements,” August 7, 2015, <https://chinachange.org/2015/08/07/christian-sentiment-in-zhejiang-against-cross-removal-three-statements/>.
3. 《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by Daniel H. Bays, United Kingdom: Wiley-Blackwell, 2012。
4. “中国基督教协会”，Acade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http://contemporary_chinese_culture.academic.ru/126/China_Christian_Council.
5.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 World Affairs），<https://berkeleycenter.georgetown.edu/organizations/china-patriotic-catholic-association>.
6. 中国当局用“邪教”一词来指称那些非正统宗教团体。中国政府机构和国家媒体时常用一个有些误导的英文翻译，即evil cult（邪恶的狂热信徒或教派）来妖魔化那些被贴上“邪教”标签的团体。而英语中“Heterodox religion”一词更加贴切表达“非正统宗教”的原意，因而为本报告英文版所采用。
7. 一个例子是2011年对湖北省“华南教会”的镇压。
8.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07年度报告》，2007年5月，http://www.uscifr.gov/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AR_2007/annualreport2007.pdf.
9. 这个总数在之后几年有所扩大，在2016年达到了16座主要教堂和49处下属聚会地点。见《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网站（<http://www.bjcctspm.org>），本报告获取资料日期为2016年11月29日；《中国2005版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下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解决实际操作中的僵局》，作者：Lauren Homer，原载：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52, no. 1 (2010): 50–73.
10. 《圣父牧函》——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2007年5月27日，http://w2.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letters/2007/documents/hf_ben-xvi_let_20070527_china.html.
11. 极权中国的基督新教和公民社会：官方教会和未注册“城市教会”对200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影响》，作者：Carsten Vala，原载：《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no. 2012/3 (October 1, 2012): 43–52.
12. 同上。
13. 《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见注9），作者：Lauren Homer。
14. 同注11。
15. 与Carsten Vala的电子邮件交流，2016年11月。
16. 《与党国打太极：中国改革年代的非官方新教团体》，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原载：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no. 1 (April 25, 2013): 1–20.
17. 《我国宗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2014年4月1日，<http://www.sara.gov.cn/llyj/63734.htm>.
18. 《全球基督教：关于世界基督教人口规模与分布的报告》，附录C：对中国的研究方法，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12月19日，<http://www.pewforum.org/2011/12/19/global-christianity-exec/>.
19. 见亚洲丰收会（Asia Harvest）的例子，《基督教人口》，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29日，<http://asiaharvest.org/wp-content/uploads/christians-in-china/China.htm>。有关亚洲丰收会的研究方法，见Paul Hattaway所著《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对全文的简要总结》（How Many Christians Are in China? A Brief Summary of Our Full Article），亚洲丰收会（Asia Harvest），<http://asiaharvest.org/how-many-christians-are-in-china-summary/>.
20. 亦见于《天主教在当今中国》（Catholicism in China Today），作者：Tom McGregor，Crisis Magazine, 2013年8月15日，<http://www.crisismagazine.com/2013/catholicism-in-china-today>.
21. 《中国天主教的悲剧与新兴公民社会中的希望》（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前言：中国天主教的来龙去脉”，作者：Richard Mads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2. 《神在地上：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天主教会、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跨国流程》，作者：Eriberto Lozada, J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我国宗教的基本情况》，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24. 《建造中国的耶路撒冷》，作者：曹南来，（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信仰之盾：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作者：Francis Khek Gee Lim（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 同上。亦见《中国宗教的红黑灰市场》，作者：杨凤岗，《社会学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47: 93–122.
27. 《中国家庭教会的兴起：组织化的武器》，作者：Karrie Koesel，The China Quarterly 215 (June 2013).
28. 《无网之渔：中国的非官方新教教会吸纳新人》，作者：Carsten Vala、Kevin J. O’ Brien，Mobilization 12, no. 1 (March 2007): 79–94.
29. 《2012年有关中国大陆迫害基督徒和教会的年度报告》，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2013年2月2日，<http://www.chinaaid.org/2013/02/chinaaid-releases-2012-annual-report-on.html>.
30. 对华援助协会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一份中共的内部文件，文件显示这是一项更为系统性的“铲除”家庭教会的运动的一部分。见《对华援助协会报告：中国政府开展新运动铲除家庭教会》，2012年4月22日，<http://www.chinaaid.org>.

org/2012/04/chinaaid-special-report-chinese.html.

31. 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的迫害报告显示迫害案件呈上升趋势》,2014年2月13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4/02/china-aid-association-2013-persecution.html>.
32. 对华援助协会,《2013年的迫害报告显示迫害案件呈上升趋势》,2015年4月21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04/china-aid-2014-annual-report-indicates.html>. 亦见《活动人士说,中国强拆“非法”教堂的运动还在继续》,作者: Tom Phillips, Telegraph, 2015年4月15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537435/Chinas-evil-church-demolition-campaign-continues-say-activists.html>.
33. 对华援助协会,《2015年度中国政府迫害报告》,2016年5月1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5/china-aid-releases-2015-annual-report.html>.
34. 《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作者: 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6年5月23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523/c23chinacross/>;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6年度报告》,2016年10月6日,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2016%20Annual%20Report.pdf>.
35. 《十七座十字架被毁,当局威胁强拆》,作者: Qiao Nong, Carolyn Song, 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3月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3/17-crosses-destroyed-authorities.html>.
36.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 中国政府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作者: 曹雅学, China Change, 2015年7月26日, <https://chinachange.org/2015/07/29/interview-with-a-wenzhou-pastor-the-chinese-governments-large-scale-destruction-of-crosses-in-zhejiang-province/>.
37. 《坍塌的尖顶汇聚中国政教冲突》,作者: 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4年5月29日, <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
38. 《牧师妻子遇害的河南省教堂赢得土地使用权》,作者: Ava Collins,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4月27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4/henan-church-wins-rights-to-land-where.html>; 《政府打压,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毁》,作者: Qiao Nong, Carolyn Song 和 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1月8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1/crosses-removed-churches-demolished-in.html>; 《安徽省政府在批准教堂建筑用地后发布拆迁通告》,作者: Rachel Ritchie,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3月31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03/anhui-government-issues-demolition.html>.
39. 《与党国打太极: 中国改革年代的非官方新教团体》,作者: 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另据对华援助协会的资料,2013年浙江全省的迫害事件不到10起。这个数字在2014年跃升至数十起,被拘押人数超过1万。
40.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 中国政府在浙江省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作者: 曹雅学, China Change, 2015年7月26日, <https://chinachange.org/tag/xia-baolong/>.
41. 在最初的抗议之后,当局逮捕了两人有关负责人并在后来承认这块地皮是属于教堂的宗教场所用地。见《教会领袖妻子因抗议强拆教堂遭中国当局活埋》,作者: Stoyan Zaimov, Christian Post, 2016年4月19日,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hina-church-leaders-wife-buried-alive-killed-for-protesting-church-demolition-162067>; 《河南牧师妻子之死反映了一个全国性问题》,作者: Brent Fulton, China Source (blog), June 1, 2016, <http://www.chinasource.org/blog/posts/death-of-henan-pastors-wife-points-to-nationwide-problem>; 《牧师妻子遇害的河南省教堂赢得土地使用权》,作者: Ava Collins。
42. 他的妻子被判入狱12年。见《抵制拆除十字架的中国牧师因贪污罪被捕入狱》,BBC, 2016年2月26日,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673952>.
43. 他在三月底被释放,改为“监视居住”,即软禁。见《中国: 顾约瑟牧师获释后被“监视居住”》,稿件来源: 对华援助协会, Church in Chains, 2016年4月6日, <http://www.churchinchains.ie/node/873>; 《中国牧师顾约瑟因贪污罪名遭调查》,BBC, February 1,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457150>; 《中国打压基督教会》,作者: Brendon Hong, Daily Beast (blog), May 8, 2016, <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6/05/08/china-s-crackdown-on-christian-churches.html>.
44. 《对张少杰牧师的重判凸显中国对基督教越发不宽容》,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4年11月3日,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pastor-zhang-shaojie%E2%80%99s-harsh-sentence-highlights-china%E2%80%99s-increasing>.
45.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 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46. 《麦当劳残忍杀人案背后的邪教组织相信耶稣已经作为一个女人复临》,作者: Terrence McCoy, 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2014年10月14日, <http://www.smh.com.au/world/the-chinese-cult-behind-a-brutal-mcdonalds-murder-believes-jesus-has-retuned-as-a-woman-20141013-115kr6.html>.
47. 在判决样本中另外8个信徒遭到惩罚的团体分别是: 门徒会、血水圣灵 (亦称圣灵重建教会)、呼喊派、灵灵派 (亦称属灵教、灵灵教)、三班仆人派、主神教、心灵派和约瑟夫之家。档案于2016年6月从最高人民法院网上数据库收集和下载,并进行分类和分析。自2014年1月1日开始,中国各个法庭按照要求必须在网上公布判决结果,这使得可以获得的判词数量显著增加,其中包括一些涉及宗教迫害的敏感判决。尽管如此,这个数据库依然不够全面,有些判决个案时常被移除。见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29日, <http://wenshu.court.gov.cn>.
48. 仅有的三个出现的省级行政单位是天津、重庆和西藏。
49. 全能神教,也称东方闪电,1990年代早期开始于河南省,有些国际专家也认为它是一种邪教。除了像“麦当劳事件”这样见诸报端的暴力事件之外,它饱受争议的地方还有它的核心信仰——认为耶稣通过一个中国女人的身体复临人间以及信徒必须切断与他们家庭的关系等等。《东方闪电从何而来?》,作者: William Bennett, China Source, 2014年4月4日,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where-did-eastern-lightning-come-from>; 《探究中国最激进邪教团体》,作者: Malcolm Moore, Telegraph, 2015年2月2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046155/Inside-Chinas-most-radical-cult.html>.
50. 《2014年度报告: 中共的宗教与人权迫害》,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4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24UfutRtHodGVzbWhyLUtCdJg/view>; 国家媒体报导称,从2014年5月至8月,有超过1000名全能神教成员被捕。《探究中国最激进邪教团体》,作者: Malcolm Moore。

51.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52. 《中国媒体公告栏 第113期》，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2016年3月，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MB113_English-FINAL.pdf；《赵薇失踪的那一天：中国全面限制人权，年轻法学研究生被捕》，作者：Tom Phillips, Guardian, 2016年1月24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an/25/zhao-wei-mothers-search-for-daughter-caught-china-human-rights>；《赵薇获释，很多律师依然身陷囹圄》，China Digital Times, 2016年7月7日，<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7/zhao-wei-released-year-detention>。
53. 《至少18名人权捍卫者在被拘押两个月后依然下落不明》，Front Line Defenders, 2015年9月14日，<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case-history-li-heping>；《李和平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正式逮捕令》，Human Rights In China, 2016年1月8日，<http://www.hrichina.org/en/official-notice-arrest-lawyer-li-heping-suspicion-subversion-state-power>。
54. 《圣诞节为何在中国广受欢迎》Robert Foyle Hunwick, “Why Christmas Is Huge in China,” Atlantic, 2014年12月24日，<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12/why-christmas-is-huge-in-china/384040>。
55. 对付希秋 (Bob Fu, 对华援助协会执行董事) 的采访, 2016年9月。
56. 《圣诞节在中国大学因“低俗”被禁止》，Telegraph (London), 2014年12月25日，<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1313212/Christmas-banned-by-Chinese-university-because-its-kitsch.html>。
57.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58. 《中共党员人数超过德国人口》，Agence France-Presse, 2015年6月30日，<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1829407/chinas-communist-party-enlists-million-new-members>。
59. 有关哪些因素引发中共发动打击宗教团体的详细分析，见本报告法轮功部分。
60. 《坍塌的尖顶汇聚中国政教冲突》，作者：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时报, 2014年5月29日，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_r=0。
61. 《全国宗教会议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作者：邢福增, Stand News, 2016年4月30日，<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5%85%A8%E5%9C%B8%E5%AE%97%E6%95%99%E5%B7%A5%E4%BD%9C%E6%9C%83%E8%AD%B0%E8%A9%95-%E4%B8%AD%E5%9C%B8%E7%89%B9%E8%89%B2%E7%A4%BE%E6%9C%83%E4%B8%B8%E7%BE%A9%E5%AE%97%E6%95%99%E7%90%86%E8%AB%96/>。
62. 对一位希望匿名的中国牧师的访谈, 2016年6月。亦见于《“五进五化”旨在彻底改造和控制基督教》，作者：郭宝胜,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9月3日，http://www.chinaaid.net/2015/09/blog-post_89.html。
63. 例如，浙江省的一个官方网站上有关兰溪市的报导称，该市的69处宗教场所都已悬挂国旗，包括教堂。见浙江省民族宗教委员会网站的报导《兰溪落实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率先实现宗教场所国旗悬挂全覆盖》，<http://www.zjzsmzw.gov.cn/Public/NewsInfo.aspx?type=1&id=ef5d4c32-65ff-4274-8d4b-f0d1b1249edd>。
64. 2016年6月，“三自爱国运动”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宣布启动一项新的方案，推广基督教和“茶文化”。他们要求牧师和教会领导人在这个城市推广这项运动并征集以“基督教与茶”、“茶与基督徒灵修”、“茶与福音事工”为主题的文章。http://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6/718/16718405.html；(原文注释无网页连结，为译者添加)。
65. 《中国政府正在改变基督教政策？》，作者：Peter Berger, American Interest, 2014年6月11日，<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06/11/is-the-chinese-regime-changing-its-policy-toward-christianity/>。
66. 同上。
67. 《习近平传记》，中国名人录网站 (China Vitae)，http://www.chinavitae.com/biography/xi_jinping/full。
68.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69. 截至2014年7月31日，据信在这场运动中，有至少229座基督教堂被强拆或是十字架被移除。其中包括公开或地下的25座天主教堂。《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0. 《教宗方济各敦促世界无需惧怕中国崛起》，作者：Francesco Sisci, Asia Times, 2016年2月2日，<http://www.atimes.com/at-exclusive-pope-francis-urges-world-not-to-fear-chinas-rise/>。
71. 首次会谈于2014年6月举行，随后在中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谈分别于2015年10月和2016年1月举行。
72. 梵蒂冈电台报导, 2013年12月24日，中国的50家主要媒体将教宗方济各列为2013年度最重要的10位外国人中的第三位。2014年3月，《梵蒂冈内部通讯》的一篇文章报导说，自教宗方济各就职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站发表他的消息、言论和训诫。《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3. 《中国新主教显示与梵蒂冈关系有望改善》，作者：Michael Forsythe, 纽约时报, 2015年8月5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8/06/world/asia/china-ordains-bishop-joseph-zhang-yinlin.html?_r=0。
74. 《教宗与政治局》，作者：Victor Gaetan, Foreign Affairs, 2016年3月24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6-03-24/pope-and-politburo>。
75. 同上。《中国教会新闻2014》，圣神研究中心, Tripod 35, no. 176 (2015春季)，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76_06.html。
76. 同上。
77. 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6年发表的一份著名政治犯名单中，有11名天主教徒，其中五人在2013至2015年间被拘押在河北和黑龙江。《中国政治犯名单》，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2016年10月11日，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CECC%20Pris%20List_20161011_1433.pdf。
78. 《中国主教改变对官方教会立场震惊信众》，作者：David Barrett, Catholic Herald, 2016年6月17日<http://www.catholicherald.co.uk/news/2016/06/17/chinese-bishop-shocks-faithful-by-recanting-position-on-state-run-church/>。

79. 《中国教会谜题：马主教为何改变立场？》，作者：Brian Fraga,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2016年6月30日, <http://www.ncregister.com/daily-news/chinese-church-conundrum-why-did-bishop-ma-recant-criticism>.
80. 《梵蒂冈对上海马达钦主教事件保持沉默引起困惑和争议》，作者：Bernardo Cervellera, Asia Times, 2016年6月21日, <http://www.asianews.it/news-en/Vatican-silence-over-Shanghai%E2%80%99s-Mgr-Ma-Daqin-causing-confusion-and-controversy-37831.html>.
81. 《中国加强管制天主教会主教任命》，作者：Gerard O' Connell, 《梵蒂冈内部通讯》Vatican Insider, 2015年5月23日, <http://www.lastampa.it/2013/05/23/vaticaninsider/eng/world-news/china-tightens-rules-for-appointment-of-bishops-in-catholic-church-rJGAltEa2n6BYLT7cGnMXJ/pagina.html>.
82. 《教宗与政治局》，作者：Victor Gaetan.
83. 《管制的信心：中国的宗教管制》，作者：Pitman B. Potter, China Quarterly, no. 174 (2003): 317-37.
84.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85. 《中国新教家庭教会的注册》，作者：Homer.
86. 《官方终止教会租赁，命令所有家庭教会注册》，作者：Qiao Nong,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12月30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5/12/officials-terminate-churchs-lease-order.html>.
87. 到2015年，经过数年禁止守望教会租赁室内场所以及暴力镇压教会尝试在室外公共场所举行礼拜活动，官方的努力似乎获得成效。守望教会的信众分散成了更小的团体或者加入了其他教会团体。
88. 南乐教堂和三江教堂是两个尤其突出的例子。
89. 《通往讲坛之路：中国基督教“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的领导人培养》，作者：Carsten Vala, 收录于《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编辑：Yoshiko Ashiwa、David L. W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90. 《通往讲坛之路》，作者：Vala; 《重新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神学院》，Sunday Examiner, 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19日, <http://sundayex.catholic.org.hk/node/1914>.
91. 《中国政府持续强迫已登记的天主教主教》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2016年6月2日,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hinese-government-continues-to-coerce-registered-catholic-bishops>.
92. 《通往讲坛之路》，作者：Vala.
93. 同上。
94. 中国基督教协会（CCC）创建于1980年，是另一个政府下属机构，与“三自爱国教会”密切合作，致力于提供信众的培训、神学指导和《圣经》印发，并探索如何实现基督教神学中国化。其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扎根中国文化，结合中国教会的特殊经验，在现代中国环境下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可靠解释。”见 Global Ministries,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19日, http://www.globalministries.org/eap_partners_china_christian_council.
95. 《上海牧师、修女被迫参加再教育学习班》，UCA News, 2015年7月9日, <http://www.ucanews.com/news/shanghai-priests-nuns-forced-to-undergo-reeducation-classes/73901>.
96. 由美国对华援助协会汇总的数据显示，在2011至2013年期间，宗教领袖占被迫害和拘押的基督徒总数的3.5%。这个比例在2014年跃升至15%，2015年保持了同样水平。
97. 《遭酷刑牧师妻子受到威胁，律师提起诉讼》，作者：Brynne Lawrence,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6月13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6/tortured-pastors-life-threatened.html>.
98. 《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作者：Carsten Vala, 收录于《The Chinese Corporatist State: Adapti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编辑：Jennifer Y.J. Hsu、Reza Hasma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9.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100. 《温州强拆教堂，基督徒忧心忡忡》，作者：Julie Makinen, Los Angeles Times, 2014年5月5日, <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church-20140506-story.html>.
101. 同上。
102. 采访洛约拉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Carsten Vala, 2016年9月。对房产物业的各种不同形式没收与强拆在中国非常普遍，这经常成为国家与教会紧张关系的催化剂。见《社会抗议与饱受争议的集权主义》（Social Protest and Contentious Authoritarianism），作者：Chen Xi, (Cambridge, 2012)。
103. 《对张少杰牧师的重判》，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104.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05.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06. 《政府终止基督徒的社会福利》，作者：Qiao Nong, 对华援助协会, 2016年8月9日, <http://www.chinaaid.org/2016/08/government-terminates-welfare-for.html>.
107. 《中国：基督徒被威胁取消社会福利，除非停止去教堂》，作者：Carey Lodge, Christian Today, 2016年8月10日, <http://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china.christians.threatened.with.having.welfare.payments.cut.unless.they.stop.going.to.church/92814.htm>.
108. 服务社会，重塑国家：中国的宗教慈善活动与抗争》，作者：Susan McCarthy, China Journal 70 (July 2013): 48-72.
109.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10. 与希望匿名的中国基督教研究者的电子邮件交流，2016年11月。

111.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被关押中国牧师的女儿在美国强调父亲教会的困境》，作者：Qiao Long and Shi Shan，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7月21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daughter-07212014180702.html>。
112. 《家庭教会如何看待政府当局》，作者：Kay Danielson，China Source，2013年12月9日，<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articles/house-church-attitudes-towards-government-authorities>。
113. 《与党国打太极》，作者：Teresa Wright 和 Teresa Zimmerman-Liu。
114. 《温州家庭教会领袖遭当局殴打》，对华援助协会，2016年5月16日，<http://www.chinaaid.org/2016/05/wenzhou-house-church-leader-beaten-by.html>；《中国基督徒采取法律手段反对非法迫害》，对华援助协会，2016年2月19日，<http://www.chinaaid.org/2016/02/christians-take-legal-action-against.html>。
115. 有关在2014年活动人士博爱（音译）举办的讲习班及其影响的趣闻轶事见《中国各地举办法律与宗教培训讲习班》，对华援助协会，2014年3月13日，<http://www.chinaaid.org/2014/03/law-and-religious-training-seminars.html>。若干讲习班于2015年和2016年在重庆、云南、河南、辽宁和北京举办。有关草根信众如何利用法律知识要求当局出示搜查证的事例见《中国的法治雏鹰》，作者：Tony Carnes，Christianity Today，2006年9月18日，<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6/september/china-civil-rights-movement.html>。
116. 浙江基督教协会公开信的英文翻译和其他事例，见《浙江基督徒如何看待拆除十字架：三份声明》，China Change，2015年8月7日，<https://chinachange.org/2015/08/07/christian-sentiment-in-zhejiang-against-cross-removal-three-statements/>。朱主教据报导发表了两封信，一封在2014年年中敦促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另一封措辞更加强烈的与其他神职人员联署的信件发表于2015年年中。主教本人在2016年9月因病逝世。见《号召为反对拆除十字架大声疾呼》，纽约时报，2015年8月7日，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5/08/07/a-call-to-cry-out-against-cross-removals-in-china/?_r=0。
117. 《特别报导：勇敢面对北京的主教》，作者Sui-Lee Wee，路透社，2014年3月3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atholics-special-report-idUSBREA3001820140401>。
118. 《北京神学院毕业生拒绝参加毕业典礼：我们不参加非法主教主持的弥撒》，Asia News，2014年7月18日，<http://www.asianews.it/news-en/Beijing.-seminarians-desert-graduation-ceremony:-We-will-not-celebrate-Mass-with-illegitimate-bishops-31658.html>。
119. 《遭到驱逐的“非法教会”力图反抗北京》，作者：Andrew Jacobs，纽约时报，2011年4月17日，<http://www.nytimes.com/2011/04/18/world/asia/18beijing.html>。
120. 《与一位温州牧师的访谈》，作者：曹雅学。

III: 伊斯兰教

迫害严重程度:

回族穆斯林

低

维吾尔穆斯林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维吾尔穆斯林



增加

主要调查结果

- 1 复兴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2100万信徒，在过去10年有了明显的发展。回族穆斯林新建了数以千计清真寺，而很多维吾尔人通过宗教活动来表明自己不同于占人口多数汉人的独立身份认同。伊斯兰教中极端保守的萨拉非派的影响力也有所扩大，甚至吸引了少数汉人皈依。
- 2 分而治之:** 中国对穆斯林的待遇，随着不同民族和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差异。回族穆斯林在实践伊斯兰信仰的核心内容上，比维吾尔人要享有更大的余地，比如一日五祷、斋戒月斋戒、去麦加朝圣或是佩戴头巾等等。从事这些活动的维吾尔人则很可能丢掉工作，遭到罚款，甚至被捕入狱。
- 3 习近平治下:** 自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回族和维吾尔人都面对越发严格的限制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府管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其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过去一些在新疆的非正式和地方性的限制措施——比如在宗教服饰和儿童教育问题上一已经变成了整个地区和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当局还开展新的运动来更加严格地监控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强制商家卖酒。
- 4 日益增加的暴力活动:** 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和粗暴的执行措施，与日益增多的暴力冲突和维吾尔人预谋发动的袭击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袭击行动目标针对警察、亲北京的宗教领袖和平民。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把“维稳”放在首要位置，并开展了一场“严打”运动，给更多警察配备了武装，对即便是和平的宗教活动也采取严厉惩罚。安全部队向维吾尔平民开枪的事件变得更加普遍。
- 5 经济奖惩:**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优先利益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但同时也鼓励了部分政府部门在一些项目上，投入资金推广伊斯兰教或有关货物的出口。新疆的政府当局大量利用经济奖惩手段以强化宗教管控。



甘肃省临夏一座回穆斯林清真寺。临夏有“小麦加”之称，那里对伊斯兰的限制比新疆要宽松得多。

照片来源：维基媒体

6 调适与抗争：回族穆斯林有调整他们的宗教活动以适应汉人思想，并通过现存的政治体制来影响政策制定的传统。面对更加限制性的环境，很多维吾尔人选择暗自躲避官方管控，获取未经认可的宗教出版物，私下坚守他们的信仰，或是拒绝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还有些人采取更具反抗性的举动，比如蓄胡子、在禁止佩戴头巾的场所佩戴头巾，或是当警察试图执行这些粗暴的规定时，与之对抗。

“2009年以后，一切都变了。现在的规矩是，如果我去你家一起读《古兰经》，一起祈祷，政府发现了，你就得进监狱。”

—巴娜，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妇女，现居美国，2015年⁵

“这一（回族小女孩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一片哗然……甘肃省教育厅强烈谴责这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径，要求各级教育部门……严禁各种宗教活动进校园。”

—甘肃省教育厅，2016年5月⁶

伊斯兰教在中国：过去与现在

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不久后，伊斯兰教便于唐代（618-907）随着穆斯林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最初传入中国。在元代（1271-1368），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和穆斯林人数在中国得以扩大，部分元朝领导人本身也信奉伊斯兰教，尤其在维吾尔人居住的地区。³ 中共在1949年执政之后，中国的穆斯林被纳入于1953年成立的“爱国”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管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清真寺遭到毁坏，任何人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都会受到残酷镇压和惩罚。⁴

毛泽东死后，宗教活动重新得到许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得以恢复，清真寺和穆斯林圣地的重建得到批准。根据1982年指导宗教政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第19号文件，当时中国有1000万穆斯林。⁵ 到目前，这个数字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现有的2100至2300万穆斯林人口，超过了很多中东国家的人口，而且呈现很强的民族多样性。⁶ 大约有一半的中国穆斯林（1050至1100万）是回族，⁷ 他们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与文化。他们的相貌特征非常接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在宁夏、甘肃和云南等省区的部分地区都集中了大量回族人口，还有很多回族已经在中国其他地区定居。第二大穆斯林群体是维吾尔人，一支突厥语系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1000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欧亚人种的外貌，主要集中在位于西北部地区的新疆。⁸

中国其他的穆斯林人口属于若干不同的中亚民族—包括乌兹别克人、哈萨克斯坦人和塔吉克人—或是居住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移民。⁹

中国有3.5万座清真寺，其中半数字于新疆，有4.5万名伊玛目（阿訇）分散于多个省份。¹⁰ 有若干重要的朝圣地分布在喀什、吐鲁番，以及甘肃省临夏市等地。临夏是一个回族穆斯林高度集中的城市，经常被称作“小麦加”。¹¹

民族和地理分布的多样性也反映在伊斯兰教宗教活动上。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属于逊尼派（Sunni），有一些维吾尔人属于苏菲派（Sufi）。有些宗教活动是为中国所有穆斯林普遍接受的，例如禁食猪肉和庆祝斋戒月（Ramadan），但是一日五祷、定期去清真寺参加主麻日（星期五）礼拜，则因信徒个人而异。另外，有些作为维吾尔人文化传统一部分与婚丧仪式相关的宗教活动，在维吾尔地区很普遍，但在其他穆斯林社群则没有。同时，回族穆斯林宗教活动中一个独特之处是女性伊玛目（阿訇）领导的妇女专用清真寺。¹² 尽管有些清真寺提供女性专用礼拜场所，维吾尔妇女一般不会和男人一起参加清真寺礼拜活动，而代之以聚集在彼此家中祈祷、读《古兰经》和进行社交活动。¹³ 中国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多元性非常丰富，甚至在同一个族群和省份中，其表达伊斯兰身份认同的方式也存在明显差异。¹⁴

和中国其他宗教一样，在过去十年里伊斯兰教也经历了一场复兴。对于很多维吾尔人而言，提高宗教虔诚度、佩戴宗教标志和服饰，都是他们声张自己独立身份认同的方式，以区别于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在回族，人们时常在一个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寻求精神和道德引领，近年来致富的穆斯林企业家拥有更多资源可以贡献于宗教机构。这场复兴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越来越多新建清真寺和苏菲派殿堂，尤其是在甘肃省部分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甚至在一些小村庄也举目可见，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作“《古兰经》带”。¹⁵

有一小部分汉族人或是出于宗教原因，或则是为了与一名回族配偶成婚，皈依伊斯兰教。但是绝大多数变得更为虔诚的人是由于他们重新认知自身的伊斯兰传统。政府统计不见得提供中国穆斯林信徒的准确数量，因为这些数据主要是按照少数民族人口进行计算，其中暗含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回族或维吾尔族人都是穆斯林，以及所有穆斯林皆非汉族。¹⁶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比如越来越多的宗教书籍从阿拉伯文翻译为中

文，分享宗教内容的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南亚地区达瓦伊斯兰传教人员。¹⁷

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实施

各个群体穆斯林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特性有着很大差异。相比维吾尔族穆斯林，非维吾尔族的信众在宗教活动、服饰和媒体使用方面遇到的政府限制要明显少得多。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斯林宗教活动在回族人当中相当常见，但是在维吾尔人当中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甚至遭到非法化，其中包括清真寺使用扩音喇叭召唤穆斯林参加主麻日礼拜，信徒在斋戒月封斋，青少年在伊斯兰学校学习，儿童跟随父母参加祈祷，个人观看有关伊斯兰教义的教学影片，或者是男人蓄胡子和女人戴头巾等等。

另外，政府中的回族雇员—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公开表达他们的信仰和佩戴头巾，而在维吾尔族公务员当中，这些活动则遭到严厉禁止。前往麦加朝圣是一项核心的伊斯兰教徒义务，非维吾尔穆斯林较易申请到护照并获准前往，而维吾尔人完成这项义务的机会则日益艰难。

类似地，新疆南疆地区人口中维吾尔人占绝大多数，政府对南疆地区（如阿克苏、和田和喀什）的限制更趋严格、打压更加暴力，使南疆比北疆（乌鲁木齐可能是个例外）存在更多的暴力冲突和袭击事件。

1980年代新疆经历了一段相对开放期和宗教复苏，然而，新的限制宗教活动的法规在1990年代出台，而维吾尔居民与中国当局之间也出现暴力冲突。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当局加速收紧宗教管理以及非法化和和平宗教活动。中共很快从聚焦于分裂主义的维吾尔国安威胁论，扩展为一场反对“三股势力”的运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¹⁸迄今，“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依然含混不清，大量有完整记录的案件证明一些维吾尔人看上去只是在从事一些无害的宗教或教育活动，却被政府武断地贴上“极端分子”的标签，并受到严厉惩处。

全世界通行的日常穆斯林宗教活动在回族人当中相当常见，但是在维吾尔人当中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甚至遭到非法化。

中国政府 and 维吾尔穆斯林关系的第二个分水岭出现在2009年7月。7月5日，警察强力镇压了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举行的一次和平示威。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几名维吾尔工人在与汉族员工的斗殴中丧生。¹⁹这导致维吾尔人示威以表达对政府未进行彻底调查的失望。警方行动—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报导，使用包括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对付和平抗议者，导致维吾尔和汉族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²⁰

中国国家媒体报导有197人在事件中丧生，但是由于政府控制信息和恐吓目击者，当天事件的具体细节无法得到充分证实。“7.5”冲突之后的严厉镇压还包括大批维吾尔人被“失踪”、监禁和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被处决，这个地区的因特网通讯几乎被彻底切断了10个月。²¹时过七年，依然有数百名被拘押的维吾尔青年下落不明。²²

习近平治下的伊斯兰教

习近平2012年执掌中共时，维吾尔人和平进行宗教活动和其他表明维吾尔穆斯林身份认同的自由空间自2009年以来已经大为收缩。然而，回族穆斯林在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方面，仍明显享有较大的余地。尽管回族和维吾尔人受到的待遇依然相去甚远，但是在习近平治下，这两个穆斯林民族所受到的限制，都在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这一段时期的特征是由维吾尔人发起的针对警察（政府权威的象征）、那些被认为与政府勾结的维吾尔人（包括一些宗教领袖）和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有所增加。多起事件发生

在新疆地区之外，最受关注的是2014年3月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人丧生。²³

在新疆地区制定法规、强化控制

国家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管控自2009年以来大幅度增加，这个趋势在习近平治下只是变得更加深化和扩大。有大量原本许可的例常、和平的宗教仪式，现在也被武断地贴上了“非法宗教活动”或“宗教极端主义”的标签。

这种模式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向法规化的转变。2012年11月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新的法律和法规，从而将一些限制和惩处宗教行为的地方性措施正规化。这一转变与习近平推行“依法治国”的努力一致。新措施包括2016年一月生效的《国家反恐法》²⁴、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²⁵和2015年2月实施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²⁶

从理论上讲，用成文的法律替代不正规的指令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趋势问题重重。这些法规含混的措辞基本上不能约束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语汇的滥用和扩大化解读。它们在自治区和全国范围的实施扩大了原来一些相当地方化的规定。同时，更加严厉的法律环境和2014年5月开展的一场“严打”运动，也迫使地方官员落实那些他们原本会宽松执行的压制性规则条例。²⁷

这些新的立法和额外的非正式指令已经影响到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方方面面：

在斋戒月期间，政府还举办各种节目，要求人们去参加跳舞或是其他一些耗费体力的活动从而阻止人们封斋。

1. 宗教服饰和外貌的限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阻止维吾尔妇女遮住面孔甚至头部、男人（尤其年轻男子）蓄长胡子的运动更加强化和扩大化，而且变得更加正式化。过去，有关宗教服饰的禁令没有法律基础，是通过地方性指令因地制宜实施。²⁸而今，公共场所如医院、图书馆、银行张贴通告，明确拒绝为戴面罩的妇女和蓄胡子的男人提供服务。2014年8月，克拉玛依市政府宣布，在为期14天的一场运动会期间，此类人士禁止乘坐公交。²⁹2015年1月，乌鲁木齐市政府颁布了一项针对“穿戴蒙面罩袍”的禁令。³⁰无视禁令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面临被解雇或开除的风险。

警察越来越多地要求妇女遵守禁令，他们根据线人举报搜查房屋并对违反禁令者处以罚款。在至少一个案例中，一名喀什男子因拒绝修面被判入狱6年，而他妻子因继续配戴面纱被判2年。³¹就各种限制（即便有成文法规）的含混不清来说，学者詹姆斯·莱堡德（James Liebold）和提摩西·格罗斯（Timothy Grose）表示，尽管法规似乎涵盖了从一般的头巾到更加保守的罩袍（burqa），但到底什么样的服饰是被禁止的依然不明确。³²在2009到2013年间，戴头巾和蓄胡较为常见，但是随着法规的执行，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宗教认同的维吾尔人似乎少了很多。

2. 斋戒月（拉玛丹）：对维吾尔人在斋戒月期间封斋的限制并非新现象，但是自2012年以来，这种限制变得更加系统化。³³餐馆必须开门，警察会监控那些在黎明前开着灯的房屋，学生被要求当着老师的面进食，而且参加礼拜的机会也受到限制。有些政府公务员和教师据报遭强制签署保证书誓言不会封斋，有些人还被安全部门“请去喝茶”以确认他们是否封斋。³⁴政府还举办各种节目，要求人们去参加跳舞或是其他一些耗费体力的活动从而阻止人们封斋。³⁵这些超越法律禁止范围强迫人们去从事某些活动的措施，说明政府极端粗暴的宗教管控。

- 3. 非正式祷告：**和其他穆斯林一起在清真寺外进行祷告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危险的。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宣称，宗教活动只能在已经注册登记的场所进行，而在政府办公场所、公立学校、商业场所和“其他场所”，这些活动都是被禁止的。³⁶ 2015年9月，阿克苏地区一个村子的一个伊玛目（阿訇）和八个农民因为在户外祷告被判处7到9年徒刑。其中一位农民的妻子在庭审时说，“我从未听说这八个人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政府在指定的清真寺外祷告。全村对他们被捕都感到很震惊。”³⁷

针对非正式祷告的限制对于维吾尔妇女影响尤其严重，她们通常不会在清真寺祷告而是传统上聚集在各自的家中进行祷告和阅读《古兰经》。此类聚会现在则会导致拘捕。³⁸ 一般信徒进行的非正式布道和其他各种维吾尔宗教传统活动，例如圣殿节日或是与婚丧嫁娶相关的宗教仪式，也受到比过去更加严格的禁止。³⁹

- 4. 儿童参加宗教活动：**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就不允许年少维吾尔人接受宗教教育，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样，穆斯林也要遵从政府试图限制18岁以下中国公民接触宗教的规定。尽管如此，2015年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包含了迄今最为明确和广泛的措辞。按照《条例》的第37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参与宗教活动”，违反规定者会受到严惩。2015年3月，在和田地区的一个城镇对25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些人或是给当地儿童讲授宗教课程，或是参加了有关课程。除了四名教师之外，在1.5万名群众面前受到审判的人包括了年仅6岁的学生和一位送她的孙辈参加宗教课程的60岁妇女。⁴⁰ 而那一对在家主办课程的夫妇的住宅也已遭到强拆。⁴¹

在和田地区的一个城镇对25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些人或是给当地儿童讲授宗教课程，或是参加了有关课程。

上述种种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早已有目共睹，只是在近些年来有所加强。还有四种在过去相当罕见的打压形式，自2012年以来屡屡发生。

- 1. 推广烟酒销售：**2015年，在和田地区一个村子出现公告，要求餐厅和超市出售“五种不同品牌的烟酒”，并且要“摆放在醒目位置”来推销这些产品⁴² 一名当地的中共干部说，这是淡化当地宗教色彩的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对那些自2012年以来已经停止销售烟酒的商家的一种响应——当地很多居民由于他们的穆斯林信仰而戒烟戒酒。2015年6月，在南疆的一个村子举行啤酒节和喝酒比赛，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导，其旨在“挤压非法宗教传播空间”。⁴³
- 2. 因使用媒体而遭到监禁：**维吾尔人长久以来就因为发布或流传有关宗教事务或侵犯人权的信息而饱受牢狱之灾。然而，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包括青少年——仅仅因为浏览被禁止的宗教内容而受到严惩，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是违禁内容。⁴⁴ 有一起案例反映了对维吾尔人和回族人迥然不同的待遇，一些维吾尔人因为观看一些由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制作的有关伊斯兰教的视频而被拘留。随着智能手机数量激增，官方对于网络内容更广泛的敏感度在此类事件中可见一斑。对民众的手机进行安全检查已经越发普遍，⁴⁵ 对于像和田这样的敏感地区的社交媒体进行全面干扰也有见于报导，⁴⁶ 而新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已经包含了有关数码媒体的内容。⁴⁷
- 3. 警方过度使用致命性武力：**2012年11月以来的若干起事件，警方在与抗议者的冲突中和进行入户搜查时对维吾尔平民开枪，其使用真枪实弹已经导致了旁观群众的死伤，包括儿童。⁴⁸ 警方在冲突初起时，或是在一些如果发生在汉族地区不会如此重手响应，但是针对维吾尔人，警方却使用致命性武力。⁴⁹ 此类事件所造成的当地紧张形势和更进一步的镇压时常持续数年。

- 4. 象征性的羞辱：**很多清真寺被要求在他们的房屋建筑上悬挂中国国旗，这一政府行动让维吾尔穆斯林深感羞辱。在至少一起事件中，政府官员将国旗放置在麦加方向，造成信众们看上去是在向着国旗礼拜。⁵⁰ 类似的还有，维吾尔男人被禁止在祷告之后进行传统形式的集体宗教舞蹈，而伊玛目（阿訇）却被强迫参加由政府主办的世俗舞蹈表演。⁵¹ 在政府支持的剧院演出中，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员时常穿着宗教服饰、并蓄长胡。⁵²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管控措施及其实施代表了国家对新疆各地维吾尔人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粗暴干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等级。对宗教服饰的禁令、入户搜查、商业干预和严密监控等手段的实施范围越发扩大，几乎无人可以置身其外。

其结果是在维吾尔人中产生了对中国政府越来越强烈的怨恨与愤怒，有时还导致了针对政府代表和甚至平民的暴力行为。随着政府在2014年5月开展新一轮“严打”运动，此类暴力事件在2014年下半年有所增加。⁵³ 有些暴力事件似乎是由于民众的懊恼失望或是试图保护其他维吾尔同胞免遭抓捕或侮辱而爆发的自发行动。2014年7月在喀什附近的莎车县发生的致命冲突似乎就属于此类。据报导，由于政府对斋月斋戒的限制，以及安全部队在筛查妇女头巾的一次挨户搜查引发的争吵中，杀害一家五口人，引发了维吾尔人的愤怒，继而导致了暴乱和随后的镇压行动。⁵⁴ 其他还有一些明显有预谋的刑事犯罪。一位政府认可的伊玛目在表达了支持政府在莎车暴力事件中的镇压行为之后不久被暗杀，他所领导的位于喀什的清真寺是全国最大的清真寺之一。⁵⁵

中国当局认为，他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政策是反对“三股邪恶势力”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新疆暴力事件的增加说明其对安全方面的担心是正当的。除此之外，一些民主国家早已或打算采用其中部分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蒙面。但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远远超出了实现安全目的所需要的水平，而且未能区别对待暴力袭击和和平宗教活动。

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还有其他一些考虑似乎也推动和强化了对明显非暴力宗教活动的限制：

- **中央政府强调稳定胜于发展：**虽然有些新规章似乎是地方官员的实验性措施，而其他一些则明显是由中央或自治区当局主动提出的。中央还发出了明显的信号从而间接影响了地方当局的作为。在习近平治下，“维稳”显然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头等要务，意味着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只能屈居第二。这代表了从胡锦涛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2010年和2014年5月的两次新疆工作会议论调的对比，以及习近平自己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⁵⁶ 此外，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疆地区的公共安全预算从2011年的75.7亿元人民币（合11.6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07.2亿人民币（合16亿美元），四年内增长了41%。⁵⁷
- **官僚体系诱因和人事变动：**地方官员有强烈诱因使得他们宁可错罚那些和平的信徒，也不愿意冒险让一个潜在的暴力分子成为漏网之鱼。尤其在类似2014年5月开展的“严打”运动期间，地方官员都通常会被分配指标，规定他们必须抓捕的“分裂分子”、“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的人数。⁵⁸ 另外两个变化也造成了近年来治安状况恶化和警方使用致命武力的趋势。2009年的暴乱和镇压之后，据报导有很多维吾尔族警察出于道德考虑而辞职。而据说一些人品不端的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其中包括一些曾经因暴力犯罪被判过刑的人。⁵⁹ 另外，随着针对警察的暴力袭击事件在2013年有所上升，有更多警察配备枪支，但他们并没有全部受过充分的训练。⁶⁰
- **尽力削弱维吾尔人的团结和公共生活：**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之外，像斋月、圣殿节这样的节日以及非正式的女性祷告聚会都是维吾尔人进行社交活动和强化共同身份认同的机会。⁶¹ 然

而，政府将这种团结看做是对国家统一的威胁。斋月期间，很多穆斯林习惯上会去帮助他们社群中有生活困难的家庭，这些往往是家中有孩子或丈夫被捕入狱的家庭。但中国当局则将对这些人的访视与帮助视作他们表达反政府情绪。⁶² 斋月由于其时间点而在政治上变得敏感——近些年的斋月大体上恰逢2009年7月抗议和镇压的周年纪念。类似地，宗教服饰和外貌作为维吾尔人团结与抗争的标记，也获得了新的涵义。当维吾尔人看到他人戴面纱或是蓄胡，其团结意识会因而增强。⁶³ 而地方当局则希望通过降低宗教信仰可见度，来向上级展示他们反对“三股势力”的运动已经取得了成效。

- **削弱未来世代“宗教意识”的运动：**中国当局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宗教活动和接受宗教教育，并且严格限制在校大学生参与宗教活动。这些限令是一个旨在降低年轻人宗教虔诚度和维吾尔身份认同的系统性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针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⁶⁴ 政府这一尝试的其他方面还包括在学校教科书中积极推广无神论，管控那些可能对年轻人产生影响的虔诚成年信徒，比如学校教师或大学教授。⁶⁵ 随着限制措施的加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无法获得教职，这也让维吾尔年轻人失去了同时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和受尊重的守法国家雇员的人生榜样。⁶⁶

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维吾尔穆斯林没有受到他们在新疆的同胞同样的打压，但是他们经常受到的歧视、监视或管控（尤其在大学里）则是其他穆斯林民族所未曾遭遇的。那些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中国对维吾尔人在宗教或其他方面进行限制的人，面临潜在的严厉惩罚。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住在北京的学者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他和他的几名学生因为运作一个旨在推进维汉民族理解的网站而被捕入狱，并于2014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⁶⁷

笼罩在阴影下的回族穆斯林的相对自由

在新疆地区日益强化的限制和像伊力哈木·吐赫提这样的个案，扩大了回族和维吾尔穆斯林之间的不同体验。但与此同时，由于习近平上台以后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控，或是官方和大众因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受伊斯兰启发的暴力威胁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焦虑，使得回族穆斯林也没能完全置身事外。

2014年昆明持刀袭击事件之后，有关当局在昆明附近个旧市沙甸镇对萨拉菲派回族穆斯林进行了镇压，包括拘捕了一位著名的伊玛目。⁶⁸ 2015年斋月期间，北京各个清真寺都明显地部署了警察。⁶⁹ 2016年5月，青海当局开展了一项旨在遏制穆斯林、清真食品以及宗教标志扩散的运动，⁷⁰ 而甘肃政府则一再重申禁止在学校讲授宗教内容。⁷¹

2016年9月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当中，针对包括回族穆斯林宗教教育的管控措施明显有很大的扩展。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宗教院校”被加进了各类宗教场所的名单，而要接受《草案》共74条中16项有关条款的管控。⁷² 同时，习近平在2016年7月视察宁夏期间，在当地清真寺会见了穆斯林领袖，号召“坚决抵制非法宗教渗透”。一些观察人士将习近平的视察解读为一种信号，象征中共领导人愈加关注宗教极端主义在回族和维吾尔人当中的传播。⁷³

有若干因素似乎促进了中央对回族穆斯林态度的转变，并可能导致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

- **萨拉菲派的传播：**这个极端保守主义派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一个变体，不论其真实本质为何，萨拉菲派经常被同暴力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派别近年来在中国迅速的传播，加强了中国政府的焦虑感，同时也引起一些回族穆斯林领袖们的关切。据学者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说，萨拉菲派在过去五年甚至吸引了一些汉族人皈依。⁷⁴ 萨拉菲派信徒在中国的人数依然不确切，估计人数在数千至数万不等，只占穆斯林人口很小的一部

分。但是，他们在一些特定的社区获得了影响力，比如云南个旧的沙甸乡，甚至在甘肃临夏州的一些穆斯林聚居的乡镇中，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这些事态发展已经提高了中国穆斯林与国外相同教派的个人和组织之间互动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与沙特阿拉伯。

- **中共内部有关民族政策的权力斗争：**中共有关民族政策的幕后争论由来已久，但据学者詹姆斯·莱堡德（James Liebold）表示，最近那些主张推行更多民族同化措施的官员占据了优势。来自宁夏的回族官员王正伟在2016年5月突然被解除职务，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建造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其他各方面的复兴争取政治空间。⁷⁵ 王正伟还曾经积极推动通过有关清真食品管理的国家立法，若该法案通过，将会有助于发展中的清真食品出口产业，以及减少人们对误贴标签的担心，但这项立法于2016年4月被束之高阁。⁷⁶

新疆地区暴力事件的增加、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发起的袭击以及国家媒体煽动性的报导，都推动了近年来汉族民众当中反伊斯兰情绪的增长。

- **汉族民众当中日益增长的反伊斯兰情绪：**新疆地区暴力事件的增加、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发起的袭击以及国家媒体煽动性的报导，都推动了近年来汉族民众当中反伊斯兰情绪的增长，而那些相关的民众往往对不同的穆斯林民族不分青红皂白。这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中尤其明显。在2016年的4月和5月，大量有关中国“穆斯林化”和“阿拉伯化”的谣言和阴谋论在网上广为流传，而并未遭遇新闻审查。而前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一些言论更是推波助澜，他断言“伊斯兰泛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威胁”。⁷⁷ 2014年的一段有关一个小女孩身着传统伊斯兰服装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在2016年5月在网上重新出现，该影片引发了汉族网民对回族博主的谴责和网络霸凌，并导致甘肃省恢复对学校宗教活动的禁令。⁷⁸

政治管控的主要手段

中国当局采用了若干主要策略来影响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减少在政府监控范围之外进行宗教活动的机会：

1. **控制宗教领袖：**和对待中国其他宗教一样，中共试图控制伊斯兰教活动的一个核心手段就是伊玛目的录用、培养和任命。想成为伊玛目的穆斯林必须在10座国家认可的伊斯兰学院之一学习。⁷⁹ 据报导，学院课程除了伊斯兰教课本，还包括很多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便是在学习《古兰经》上，通常重点也是在背诵和记忆，而不是内容阐释。⁸⁰ 对于回族穆斯林，政府允许有些清真寺举办一些非官方的更加注重综合性宗教学习的研习班，但是那些想要对公众讲道的学生通常还要完成在官方讲习的培训。⁸¹ 学生毕业、通过了伊斯兰教协会和宗教局的政审以后，受分派到各个清真寺，但依然需要定期参加政治学习。⁸²

尤其在新疆，伊玛目们都在安全人员和便衣线人的密切监控之下。那些被认为违反了官方规章条例和指示的人——无论是带领非正式宗教集会、提供私下宗教教导、允许其他乡镇的穆斯林来自己管辖的清真寺礼拜，或者是未能在公共舆论中对政府政策表达充分支持——都会面临被解职、罚款和遭到监禁的风险。

2. **诠释伊斯兰教经典：**中国政府下了大功夫去影响穆斯林信徒们可能接触到的宗教信息和经典。讲经布道的内容取决于政府定期发布的小册子，宣讲过程也受到严密监控。伊斯兰教协会和国家宗教局解析伊斯兰教法（Sharia），试图找寻支持中共统治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并且更改《古兰经》维文译本中的某些段落，使之更加符合中国官方论述。⁸³ 据报导在2013年，官员们向新疆的各个清真寺散发了政府规定的伊斯兰教义汇编。去年，伊斯兰教协会向全国各个伊斯兰教团体散发了一系列讲座材料。⁸⁴

- 3. 严格管理麦加朝觐：**在过去20年，中国政府每年批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去沙特阿拉伯参加麦加朝觐，根据官方数字，2015年有1.45万人前往。⁸⁵ 然而，有关当局一直严格控制批准程序。只允许穆斯林参加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团队前往朝觐，这些朝觐团往往耗资不菲，甚至有时还要收取贿赂。2006年以来，根据与中国政府的一项协议，沙特当局只向参加官方朝觐团的穆斯林颁发签证，进一步减少了信徒们独自朝觐的可能性。

参加朝觐的条件是需要得到当地宗教局的批准，并完成“爱国主义教育”学习。⁸⁶ 各省有年度名额分配，名额强烈优先提供给50岁以上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协会的朝觐名额主要提供给回族穆斯林，不过他们一直抱怨需要等上很多年才能拿到护照或是在官方的朝觐团获得一个空缺。维吾尔人获得和持有护照则极为困难，极少有人能满足参加伊斯兰教协会朝觐团苛刻的政治条件。结果是，有些维吾尔人试图使用假护照经过土耳其前往沙特阿拉伯。2016年，一群98名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堡机场被截留，并可能已经被遣返回中国。⁸⁷

- 4. 无处不在的监控：**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对普通穆斯林信众实施了严密监控。2009年以来，安全部队在新疆各地部署显著增加，持枪警察甚至在一些小村庄也已成为寻常风景，装甲车辆定期在街上巡逻。⁸⁸ 2016年在两个月内，光是乌鲁木齐就建造了949个“便民警务站”，据称是为了创造一个“严密的安全网”。⁸⁹

种种粗暴干预措施—诸如挨户搜查以及要求村民签署保证书揭发邻里中的“宗教极端主义”事例等等—成为普遍现象。政府似乎还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计划，构建一个所谓的“宗教家庭”数据库，以追踪那些蓄胡、戴面纱或是经常祷告的新疆居民。⁹⁰ 对个人的监视还辅以电子监控的手段，包括安装在清真寺里的闭路电视系统、乌鲁木齐火车站的人脸部识别扫描，⁹¹ 以及装有摄像头的流动派出所等等。其结果是维吾尔人越来越难以在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进行宗教活动，甚至包括在他们私人住宅里。对回族穆斯林或是在北京那样穆斯林社群更加分散的大城市，监控则明显宽松很多。⁹²

- 5. 司法诉讼、“被失踪”和暴力镇压：**在新疆施行宗教管控的过程中，中国当局大量采取拘押、诉讼和监禁等措施——甚至只是为了惩治一些似乎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2012年11月以来，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人包括了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中年伊玛目和年迈的妇女。由于法庭判案缺少透明度，新疆地区涉及宗教犯罪的准确人数尚不清楚。但是，大批维吾尔人因违反安全规定或刑事法规而遭到拘押或起诉，当中有些可能只是参与了和平的宗教活动。

2012年11月以来，遭到拘押和被判刑的人包括了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中年伊玛目和年迈的妇女。

根据“对话基金会”（Duihua Foundation）所引述的官方资料，2013-2014年，有592名维吾尔人因危害安全罪名受到审判。⁹³ 此外，在这两年期间新疆有大约1.2万起审判是针对那些被指控危害社会秩序的人，这一指控经常被用来惩处那些散布禁闻、参与和平抗议或是挑战政府有关宗教活动禁令的人。据报导在有些小区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亲属被拘禁。⁹⁴

不管涉嫌什么罪名（包括违反宗教禁令）的维吾尔人，一旦被拘禁就极有可能遭遇酷刑和死亡的严重危险。一名被拘禁14年并于2011年获释的前政治犯，描述了他所在的乌鲁木齐监狱里，例行殴打和长期佩戴镣铐。据称，他还目睹了多人被殴打致死，以及因狱中恶劣的卫生条件而产生的高患病风险和其他健康问题。⁹⁵ 当监狱当局对他们进行“考验”时，暴力和恶劣待遇有时会特别施加在那些坚持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的维吾尔囚犯身上。⁹⁶

很多家庭—或许有数百个—有亲属在2009年7月冲突和随后的镇压中被安全部队带走，这些

人在数年之后依然下落不明。甚至轻微的违法行为也逐渐可能遭致极端严厉的惩罚，维吾尔人对此人心惶惶，也同时让他们怀恨在心。反之，如此严苛的待遇在回族穆斯林当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一位萨拉菲派伊玛目于2015年在云南被拘留，其在被拘押27天后也被无罪释放。⁹⁷

投资与经济奖惩

中国政府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在有些状况下，导致对伊斯兰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但有时也使有关政府部门在一些宣传伊斯兰教的项目上投入资金。在新疆，经济发展方案涉及价值40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其旨在与其他欧亚大陆地区构建交通和基础设施纽带，加上新疆地区宝贵的自然资源，提高了在这个地区包括宗教活动方面“维稳”的重要性。

新疆当局已经采取措施把这个地区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阿巴和加麻扎（Apakh Khoja Mazar Mausoleum）和其他规模较小的圣地作为旅游点进行推广。一些学者和维吾尔观察人士已经对此表示关切，他们担心这些方案加上那些对传统圣地节日的禁令，冒着伊斯兰教商品化的风险并且会给民族紧张关系火上浇油。⁹⁸ 在若干事例中，一些圣地的管理权已经交给了汉族人开办的旅游公司。据学者亚历山大·帕帕斯（Alexandre Papas）说，“（新疆的）很多圣地现在都收取大多数当地人付不起的门票费用。”⁹⁹

新疆的政府当局广泛使用经济的奖惩手段来加强对宗教的管控。那些向政府当局提供维吾尔同胞宗教活动信息的人通常都会得到金钱奖励。2014年4月，阿克苏地区的政府网站上贴出了一

则通告，说明向政府举报当地居民从事违禁行为的告发人能获得最高5万元（8千美元）的奖励。这些违禁行为共有53种，其中有18项行为涉及宗教活动，比如地下传道、公共场所祷告、举行伊斯兰传统婚礼、或是某些特定类别的公民（包括学生和公务员）在斋月封斋等等。¹⁰⁰

经济惩罚措施包括可能失去社会福利、丢掉工作、被大学开除和罚款等等。有些案例中，支付社会福利的附加条件是接受者要签字保证不带面纱。¹⁰¹ 若干最近施行的有关禁止穿着宗教服饰和蓄胡的管理规则规定，对违反或是那些被认为拒不改变外貌的人，处以上至5000元（800美元）的罚款。¹⁰² 而2015年，新疆地区的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300元（530美元），绝大多数维吾尔人的收入，尤其在农村地区，比该数字要更低。¹⁰³

回族地区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当地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让该城市对外国穆斯林游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东地区的游客。他们在路牌上添加了阿拉伯文，2016年5月阿联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首次由迪拜直飞银川。¹⁰⁴ 当地建造了一座奢华“中华回乡文化园”，以及一条“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包括一座在2005年落成、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金色穹顶清真寺，不过这座清真寺更像一个少有人光顾的旅游景点，而非敬拜场所。¹⁰⁵ 在像临夏这样的城市，当地官员们还创立了专门生产“穆斯林产品”的产业园区，给回族企业家们提供廉价土地和税收优惠。有不少回族企业从这些政策中获利而成为部分出口产品的全球领导者，如廉价的伊斯兰头饰。¹⁰⁶

社会反响与抗争

面对同化的压力，回族穆斯林向来会调整他们的宗教形式以适应汉人思想，甚至已有些人身居要职。近来，回族代表们也通过政治管道推动了对其有利的立法，譬如清真食品议题。很多回族宗教领袖也采取防御型措施来避免招致官方打压，包括同萨拉菲派伊玛目们保持距离，以及不接受国外捐赠，而在自己社群内部集资兴建清真寺。与此同时，他们也采取积极措施来规避官方限制。例如，很多回族人无视针对儿童宗教教育的限令，开办了大量的伊斯兰学校，甚至

据学者亚历山大·帕帕斯（Alexandre Papas）说，“（新疆的）很多圣地现在都收取大多数当地人付不起的门票费用。”

教幼童背诵《古兰经》。

于维吾尔人而言，由于新疆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政治化的司法环境，他们无法积极透过法律渠道达成行动目标。公开的抗争，比如街头抗议或是向国际社会曝光其所遭受的虐待，都会遭遇严厉打压。地下宗教学校和其他更加私人的活动也会引来暴力镇压。有些维吾尔人继续公开无视官方禁令，例如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宁愿支付罚款。其他很多人则转而采取更加委婉的抗争形式：

- **私下违抗官方禁令：**尽管一旦被抓获将会受到惩处，很多公务员、教师和学生采取不同方式试图去清真寺礼拜、在斋月期间封斋或是进行一日五祷。¹⁰⁷ 人们白天回到家中私下进行祈祷，或是把食物藏在包里以便在日落后食用，或是挡住他们屋子的窗户从而可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在日出前进餐。那些被要求在斋月期间开门营业的餐厅，会提前把食物做好，而且只保留最少量的员工。父母们私下里教他们的孩子阅读《古兰经》。¹⁰⁸
- **以戒绝规避作抗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戒烟或者戒酒，并且尽可能避免参加官方举办的各种庆祝活动。¹⁰⁹ 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解释说，有些家庭已经选择在像婚礼这样的私人活动中也不再跳舞，解释是“发生了这些让人痛心的事情，我们心情很悲伤。人们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庆祝。”¹¹⁰ 有些维吾尔人决定将某些官方文件看做是“违反伊斯兰教法的”（haram），以致2014年阿克苏地区的政府通告中列举的法律禁止行为包括拒绝使用人民币、拒绝或毁坏其他政府文件、不向政府申领结婚证等等。¹¹¹
- **获取被查禁的信息：**很多维吾尔穆斯林积极通过非官方管道寻求有关伊斯兰教和当地新闻事件的信息。这可能包括：一名寄宿学校的学生会搜索一个未经删节的维文版《古兰经》，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观看一部讲述先知穆哈默德从麦加去往麦地那关键之旅的电影，¹¹² 或是据称有越来越多的人绕过网络封锁在手机上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¹¹³

这些事例强调，中国当局在试图扑灭新疆穆斯林和平与日常的宗教活动，以及消除维吾尔人的个人和共同信仰中，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维吾尔人的这些反应中暗藏政治反对意见，他们于是采取了更加匪夷所思的限制措施，比如抓捕那些不去参加葬礼的人，¹¹⁴ 或是在那些有很多人戒酒的地方强迫商店卖酒。

针对无害宗教活动日趋频繁的严厉惩处，也使得那些维族村干部、警察和其他为政府工作的人深陷窘境。在2012年以来的一些海外媒体采访中，这些官员一再表示，他们对于政府公然过度处罚也感到震惊和不解。2016年6月，阿克苏地区的一名农民因与家人一起观看一部有关穆斯林迁徙的影片而被判7年徒刑，村治保主任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很难向村里人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根本说不通，非常不公平。”¹¹⁵

未来展望

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和中共有任何意愿改变目前对待中国穆斯林的政策走向。反之，2016年下半年的一些事态发展一包括前西藏书记调任新疆，以及据说计划在乌鲁木齐以外建造更多监狱一都预示着政府会更加扩展强硬手段。然而，只要中国当局继续将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与和平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个地区的紧张形势和暴力循环就将更加恶化。在这些条件下，官方以及广大群众的反穆斯林情绪也有可能增长。这将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回族穆斯林，并将逐渐侵蚀他们与维吾尔穆斯林之间的差别待遇。

很多回族人无视针对儿童宗教教育的限令，开办了大量的伊斯兰学校，甚至教幼童背诵《古兰经》。

只要中国当局继续将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动与和平宗教活动混为一谈，这个地区的紧张形势和暴力循环就将更加恶化。

- 64

26. 《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Timothy Grose、James Leibold，中参馆（ChinaFile），Asia Society，2015年2月4日，<http://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features/city-urumqi-prohibition-wearing-items-mask-face-or-robe-body>；《新疆加强控制宗教极端主义》，作者：崔佳（音译），中国日报（China Daily），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11/29/content_18996900.htm。
27.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采访 Julia Famularo（2049计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16年9月。
28. 《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制：对突厥穆斯林的隐藏威胁？》，作者：Julia Famularo，2049计划项目，2015年4月8日，http://www.project2049.net/documents/Famularo_PRC_Religious_Regulations_Xinjiang.pdf。
29. 《中国西北城市：留胡子戴面纱不得上车》，作者：Te-Ping Chen、Kersten Zhang，China Real Time Report (blog)，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6, 2014年8月6日，<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4/08/06/beards-veils-banned-on-buses-in-northwest-chinese-city/>。
30. 《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Timothy Grose、James Leibold
31. 《中国一名穆斯林因为拒绝刮胡子被判刑六年》，作者：Simon Denyer、Xu Yangjingji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15年3月3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3/30/china-jails-a-muslim-for-six-years-for-refusing-to-shave-his-beard/>。
32. 《中国为何禁止伊斯兰面纱又为何无法奏效》，作者：Timothy Grose、James Leibold，中参馆（ChinaFile），Asia Society，2015年2月4日，<https://www.chinafile.com/reporting-opinion/viewpoint/why-china-banning-islamic-veils>。
33. 采访一位2008年以后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
34. 《中国禁止新疆官员斋月封斋》，BBC，2014年7月2日，<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8123267>；《中国限制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斋月封斋》，作者：Eset Sulaiman、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2016年6月9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stricts-06092016162515.html>。
35. 《中国当局要求在斋月期间“盯紧”维吾尔穆斯林》，作者：Dolkun Kamberi，Mamatjan Juma和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2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amadan-06242015084626.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36. 同上。亦见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的第31-32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2014年12月4日，http://news.ts.cn/content/2014-12/04/content_10789678_all.htm#content_1。
37. 非同寻常的严厉惩罚在当地官员有关这起案件的言辞中也看的很明显。见《中国新疆伊玛目和农民因非法宗教活动被判刑》，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3月16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imam-farmers-sentenced-for-illegally-practicing-religion-in-chinas-xinjiang-03162016112010.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mamut>。
38.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39. 采访维吾尔人权项目研究人员，2016年4月。
40.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一位当地警官承认那些被判刑的人没有参加任何暴力活动，而只是“送他们的孩子参加地下宗教学习……在政府打击他们的时候。”见《当局对25名和田地区维吾尔人以“威胁国家安全”罪进行公审》，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3月27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otan-uyghurs-put-on-trial-0327201517015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1. 《因在家中学习古兰经，维吾尔人房屋被中国当局强拆》，作者：Shohret Hoshur，Qiao Long和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4月1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demolition-04012015151727.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2. 《中国当局命令维吾尔穆斯林店主购进酒和香烟》，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order-05042015133944.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alcohol+and+cigarettes>。
43. 《中国在穆斯林县城举办啤酒节，引发流亡维吾尔人的愤怒》，作者：Ben Blanchard and Paul Tait，路透社（Reuters），2015年6月22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ramadan-china-idUSKBN0P20L620150622>。
44. 《被判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少年的父亲说，他是中国严打运动受害者》，作者：Shohret Hoshur，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1月6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yghur-teenager-serving-life-sentence-is-victim-of-chinas-strike-hard-campaign-11162015141753.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5. 《新疆警方加强检查智能型手机用户》，作者：Eset Sulaiman，Roseanne Gerin，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月8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police-increase-checks-of-smartphone-users-in-xinjiang-01082016133532.html>。
46. 同上。
47. 《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48. 例如，2013年8月阿克苏地区的一个村庄发生了致命暴力事件，警察向一群维吾尔人开枪。当时，地方政府阻止来自附近一个村子的民众参加开斋节会礼（Eid al-Fitr）的祈祷，这个活动标志斋月的结束。群众向阻止他们的人投掷石块。至少有3名维吾尔人在冲突中被射杀，超过50人受伤，据报道在随后几个星期有数百人被拘押。在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位年近4岁的小女孩，她被安全部队击伤激起了维吾尔居民的怒火。另一个在本章后文中将写到的例子是，在2014年的一次挨户搜查带面纱妇女的行动中，有一家五口人被杀害。见《当局在新疆乡镇“维稳”，维吾尔人被迫参加强制劳动》，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1月3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hashar-11032015181544.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开斋节前夜维吾尔女孩被枪击引发冲突》，作者：Shohret Hoshur，Mamatjan Juma和Parameswaran Ponnudurai，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8月12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shooting-08122013193025.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49. 尽管是响应一些暴力行为，但警方似乎过度使用了致命武力。2013年8月，一名男子因被警方要求刮胡子而持刀捅一

- 名警官，他被当场击毙。见《维吾尔男子在因胡子而引发的冲突中被射杀》，作者：Shohret Hoshur, Mamatjan Juma and Rachel Vandenbrink, 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8月5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uchturpan-08052013173737.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turpan>。
50. 《新疆维吾尔人祈祷时须面对中国国旗》，作者：Massoud Hayoun, 维吾尔人权项目，2013年9月19日，<http://uhrp.org/news/uyghurs-xinjiang-mosque-have-face-china-flag-when-praying>。
51. 《打压宗教自由：新疆伊玛目被迫参加跳舞》，Express Tribune, 2015年4月18日，<http://tribune.com.pk/story/871879/suppressing-religious-freedoms-chinese-imams-forced-to-dance-in-xinjiang-region/>。
52.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53. 自由之家的一位专家对新疆地区2012年11月至2014年11月间发生的与宗教相关的暴力事件进行了分析归类。分析结果发现，自“严打”开始以后，月平均数增加了三倍，由每月0.5起增加到1.5起（2012年11月至2014年4月的18个月为9起，而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10月底的6个月为9起）。见《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54. 《新疆莎车县暴乱，数十名维吾尔人被枪杀》，作者：Shohret Hoshur 等，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7月29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ports-0729201410285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Ramadan>。
55. 《新疆暴力事件激增，喀什清真寺大伊玛目被刺杀》，作者：Tania Branigan, 英国卫报 (Guardian) 2014年7月31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31/china-jume-tahir-imam-kashgar-xinjiang-mosque-stabbed-death-violence>。
56.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火在线的中国回族穆斯林》，作者：James Leibold。
57.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12年1月10日，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2012czysbgjd/bfssysbg/201202/t20120229_631686.html；《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16年1月11日，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xinjiangcaizhengxinxilianbo/201602/t20160216_1707825.html。
58.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59. 同上。
60. 采访 Julia Famularo。
61. 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记者，2016年9月。
62. 同上。
63. 同上。
64. 这项措施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近年来实施的“双语教学”转型，如此一来学校里除了维吾尔语文课用维语授课外，几乎所有课目都是用汉语授课，哪怕师生都是维吾尔人。
65. 《被玷污的神圣权利》，维吾尔人权项目。
66.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67. 《中国判处维吾尔学者无期徒刑》，作者：Edward Wong, 纽约时报，2014年9月23日，<http://www.nytimes.com/2014/09/24/world/asia/china-court-sentences-uyghur-scholar-to-life-in-separatism-case.html>；《中国以分裂罪名关押维吾尔学者的7名学生》，作者：Michael Martina, 路透社，2014年12月9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xinjiang-idUSKBN0JN0AO20141209>。
68.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调和与殉道》，作者：Alice Su, 纽约客 (New Yorker)，2016年6月6日，<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harmony-and-martyrdom-among-chinas-hui-muslims>；《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 洛杉矶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saudi-arabia-20160201-story.html>。
69. 《中国：做一个穆斯林女人最好和最糟的地方》，作者：Bethany Allen-Ebrahimian。
70.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James Leibold。
71. 《中国是否在限制回族的宗教自由？》，作者：Wai Ling Yeung, China Change, 2016年5月13日，<https://chinachange.org/2016/05/13/is-china-moving-to-restrict-religious-freedom-for-the-hui-muslims/>。
72. 《中国宗教法律比较：2015年和2016年》，作者：Thomas DuBois, Academia, https://www.academia.edu/28414977/Chinas_Religion_Law_2005_vs._2016。
73. 《宗教迫害威胁下的中国穆斯林》，作者：Carey Lodge, Christian Today, 2016年7月21日 <http://www.christiantoday.com/article/why.chinas.muslims.under.threat.of.religious.persecution/91142.htm>。
74. 《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 洛杉矶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saudi-arabia-20160201-story.html>。
75. 《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James Leibold。
76. 《中国的清真食品法：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打交道，“伊斯兰教”立法引争议》，作者：Matthew S. Erie, 外交官，2016年5月27日，<http://thediplomat.com/2016/05/chinas-halal-constitution/>。
77. 《叶小文：警惕宗教“泛化”后面的“极端化”》，作者：叶小文, 环球时报，2016年5月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5/8873522.html>；《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作者：James Leibold。
78. 《中国是否在限制回族的宗教自由？》，作者：Wai Ling Yeung。
79. 《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3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3-annual-report>。
80. 《为了真主、北京和马克思：中国的年轻伊玛目遵循党的路线献身伊斯兰教》，Japan Times, 2016年5月23日，<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6/05/23/asia-pacific/social-issues-asia-pacific/for-allah-beijing-and-marx-young-imams-in-china-espouse-islam-through-prism-of-party-line/#.WAEOnmWy1SV>。

81. 同上。《41名维吾尔人被拘留，只因没参加党干部的葬礼》，作者：Shohret Hoshur, Brooks Boliek, 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3月23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a-detains-03242016163359.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82. 201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举办了“2013年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情况交流会”，来自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10所伊斯兰教院校的30余名负责人和教师参加会议。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乐斌在发言中要求“各经学院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见《2013年全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情况交流会在京召开》，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1月31日，<http://www.sara.gov.cn/xwzx/xwj/19007.htm>；《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
83. 采访一位现居美国的维吾尔记者。
84. 《强化解经成果应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国家宗教事务局，2013年2月4日，http://www.sara.gov.cn/ztzz/2013gzhy/jlcl_2013gzky/19055.htm；《2013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度报告》，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2-annual-report>。
85. 《努力增加麦加朝觐人数》，作者：Cui Jia, 中国日报，2016年7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6-07/07/content_26000048.htm。
86. 《中国维吾尔穆斯林切盼自由前往麦加朝觐》，作者：Ananth Krishnan, The Hindu, 2011年10月30日，<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s-uyghur-muslims-yearn-for-liberal-hajj-regime/article2580392.ece>。
87. 《维吾尔穆斯林试图前往麦加朝觐在土耳其被拘留》，作者：Shohret Hoshur, Memetjan Juma和Brooks Boliek, 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5月18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ese-uyghurs-detained-05182016135332.html>。
88. 采访一位2008年至2014年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照片中的新疆》，作者：Graham Adams, 外交官，2013年4月17日<http://thediplomat.com/2013/04/by-graham-adams/?allpages=yes>。
89. 《乌鲁木齐市大街小巷将建949个便民服务站》，新华网，2016年10月27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6-10/27/c_1119797874.htm。亦见于James Leibold的推特账户，2016年10月27日，<https://twitter.com/jleibold/status/791808479035920385>。
90. 《中国在新疆登记宗教信徒》，作者：Qiao Long, Luisetta Mudie, 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5月2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registration-05022013112851.html>。
91. 《乌鲁木齐火车站首先在新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新华网，2016年7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xinjiang/urumqi_hightech/2016-07/07/content_26006747.htm。
92. 采访一位2008年至2014年曾经数次造访那个地区的国际观察人士，2016年4月。
93. 《2014年新疆国家安全诉讼趋缓，刑事诉讼飙升》，对话基金会，Human Rights Journal, 2015年3月10日，<http://www.duihuahrjournal.org/2015/03/xinjiang-state-security-trials-flat.html>。
94. 《中国新疆维吾尔伊玛目和农民因参加非法宗教活动被判刑》，作者：Hoshur。
95. 采访一位现居土耳其的前维吾尔政治犯，他希望保持匿名，2016年11月。
96. 同上。
97. 《萨拉菲派在中国的兴起加剧穆斯林内部的猜疑与分裂》，作者：Jonathan Kaiman。
98. 采访现居美国的维吾尔记者；亦见于《中国的苏菲派：沙丘背后的圣殿》作者：张彦 (Ian Johnson), 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3/04/25/china-xinjiang-sufi-shrines/>。
99. 《朝圣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圣殿》，作者：Alexandre Papas, 见于《维吾尔地区活着的圣殿》作者：Lisa Ross, (Monacelli Press, 2012)。
100. 《简报：中国企图将维吾尔所有宗教信仰活动定为非法》，维吾尔人权项目，2014年5月8日，http://docs.uyghuramerican.org/5-8-14_Briefing-Religious_Restrictions.pdf。
101. 《新疆和西藏的宗教管制》（会议论文），作者：Julia Famularo。
102. 例如2015年1月生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亦见于2015年2月生效的乌鲁木齐市有关条例：《乌鲁木齐市禁止穿戴遮面裹体服饰》，作者：Grose and Leibold；《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制：对突厥穆斯林的隐藏威胁？》，作者：Julia Famularo, 2049计划项目，2015年3月31日http://www.project2049.net/documents/Famularo_PRC_Religious_Regulations_Xinjiang.pdf。新疆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经济学人》记者说，他们的公司警告雇员如果搭载戴面罩仅露眼睛的乘客，将会被罚款5000元。见《新疆的民族动荡：遮不住的威胁》，经济学人，2013年7月6日，<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0491-more-outbreaks-violence-show-governments-policies-are-not-working-unveiled-threats>。
103. 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4月提供的数据，2015年的人均收入是4万元（\$6400）。每月平均收入为3300元（\$530）。按照国外专家估算和中国国家媒体的定期报导，南疆地区维吾尔人的收入，尤其是农民，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见《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1/weodata/index.aspx>。
104. 《中国为穆斯林世界打造宏大炫目主题公园》，作者：Kyle Haddad-Fonda,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2016年5月11日，<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5/11/chinas-massive-garish-new-theme-park-for-the-muslim-world-hui-minority-yinchuan/>。
105. 《中国对穆斯林的双重待遇》，作者：Huzafa Khan, Inquilabist, 2016年9月17日，<http://inquilabist.com/index.php/2016/09/17/chinas-duplicious-treatment-of-muslims/>。
106. 《政府管制宽松，回族公开宗教活动》作者：Andrew Jacobs, 纽约时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nytimes.com/2016/02/02/world/asia/china-islam-hui-ningxia.html>。
107. 采访 Julia Famularo。
108. 《中国维吾尔人藐视斋戒禁令》，作者：Umar Farooq, 半岛电视台 (Al-Jazeera), 2014年7月5日，<http://www>。

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4/07/chinese-uyghurs-defy-ramadan-ban-20147471125107552.html。

109. 据报导，一位和田地区的地方官员解释说，政府正试图强迫商店销售烟酒，因为在过去三年当地社区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戒酒，而政府将这个看做它丧失了宗教权威方面的影响力。见《中国当局命令维吾尔穆斯林店主购进酒和香烟》，作者：Shohret Hoshur, Mamatjan Juma和 Joshua Lipes，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5月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order-05042015133944.html>。
110.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1. 《简报：中国企图将维吾尔所有宗教信仰活动定为非法》，维吾尔人权项目。
112.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3. 采访现居美国的一位维吾尔记者。
114. 《41名维吾尔人被拘留，只因没参加党干部的葬礼》，作者：Shohret Hoshur, Brooks Boliek，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3月2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china-detains-03242016163359.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115. 《维吾尔人因观看穆斯林电影被判7年徒刑》，作者：Shohret Hoshur, Richard Finney，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5月9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film-05092016151441.html?searchterm:utf8:ustring=shohret+hoshur>。

IV: 藏传佛教

迫害严重程度:

藏传佛教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藏传佛教



略有增加

主要调查发现

- 1 复兴与发展:** 在“文革”的残暴破坏之后，藏传佛教有了显著复兴。在过去十年，它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汉族精英中赢得了数百万新信徒，这些人与大约600万藏族人一起加入了这个传播广泛的宗教信仰。
- 2 严密管控:** 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施行严格控制，尤其当其事关对流亡的达赖喇嘛的虔信——这是很多信徒的核心原则。官方人员派驻寺院、无处不在的监控、例行的“再教育”运动、对旅行和通讯的限制、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绝大多数寺院僧众和很多世俗信众都产生了影响。不过，针对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藏传佛教派别，管控措施的落实程度有所不同。
- 3 武力打压:** 在藏族地区，中国安全部队会快速采取强制措施镇压他们认定的宗教不同意见，包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真枪实弹。人权团体和媒体的报导显示，自2012年11月以来，至少有321名藏人因涉及宗教行动或意见表达而遭到拘禁，其中75人被判处徒刑。³ 每年都有若干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间丧生。⁴
- 4 在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续了胡锦涛时代的政策和打压运动，并且深化和扩大了某些管控措施。一些新的管控措施增强了政府与僧俗信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对协助自焚者判罪，取消过去允许的节日活动，加强对私人宗教活动的粗暴限制，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篡改藏传佛教教义和操纵宗教领袖的传承。
- 5 经济的胡萝卜和大棒:** 政府采取各种不同的奖惩措施，鼓励地方官员使用强制性而非合作性的方法来处理与藏传佛教界的纠纷。经济手段也逐渐地被用来作为一种集体处罚方式，用以吓阻抗议行动或对宗教打压的反抗。这种措施常常会影响整个家庭或村庄的生计。



2016年，在强拆前和强拆中的著名色达五明佛学院。据报中国当局试图降低来此学习的藏人和汉人的人数。

图片来源：维基媒体 / Jimmy Lee, Contact 杂志

6 韧性与抗争：尽管遭受了超过20年的镇压，事实证明藏人私下对达赖喇嘛的虔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中国官员和媒体对达赖喇嘛持续不断地斥责和污蔑，是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最令藏人反感的部分之一。强迫僧俗信众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的扩大，一直是挑起抗议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2009年以来的（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也有很多藏人采取较为细致的抗争方式，创造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受到禁止的宗教活动或分享信息。



“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

—张庆黎，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07年3月¹

“政府的宣传是没用的，人人都知道这些是假的。（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所有藏人的一切。在西藏，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见到尊者。”

—尼玛拉姆，最近来自四川的流亡难民，2016年8月²

藏传佛教在当今中国

若干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和它遍布各地的僧尼寺院网络，一直是藏区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这个地区很多宗教场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自17世纪中期的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统治整个西藏高原以来，政治与宗教权威尤其密切相关。

藏传佛教独特的宗教传统——它的宗教经典、舞蹈、密宗修行以及作为寺院教育中心部分的辩经活动——都与在中国其他地区被广泛接受的大乘佛教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宗教活动通常包括在寺院中进行供养、念诵祈祷文、在家中设立佛堂、庆祝一年一度的各种节日、完成在拉萨和高原其他地区各处圣地的朝拜等等。⁵ 这些活动在中国的藏区相当普遍常见。不过，同样常见的是大批部署在一些主要寺院周围的重装武警和警察，以及安装在宗教场所内部和周边的监视摄像头。

过去10年，限制措施在绝大部分藏区都有所加强，但是执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众群中有所不同。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截至2014年在全国各地共有3600座有宗教活动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庙宇，有14.8万名藏传佛教僧尼，远远超出汉传佛教僧众的统计数字，显示出宗教制度在藏人中所占据的特殊重要地位。⁶ 据称，其中有1787个宗教场所和超过4.6万名僧尼位于西藏自治区境内。⁷ 尽管无法获得信众的确切数字，一般认为除非是担任中共党员或是政府官员，生活在中国的628万藏人绝大多数都会参与某种形式的藏传佛教活动。⁸

除了公共视野中民众的虔诚和政府的管控之外，还有一系列针对僧俗信众宗教活动的幕后限制措施，严厉的——有时是致命的——镇压行动通常由安全部队执行。过去10年，限制措施在绝大部分藏区都有所加强，但是执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众群中有所不同，而且也随不同的特殊时间点有所波动。有若干原因导致了这些差异：

- **地理位置：**相比于其他省份的藏区，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明显更加恶劣，尽管这种差异近年来逐渐缩小。在四川、青海和甘肃的那些有主要寺院的地区管控似乎更加严厉，而在其他更加边远的地区以及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庆）则比较宽松。⁹ 因而，有些村庄一轮接一轮地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其中就包括了强制攻讦达赖喇嘛，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基本上可以幸免于此。¹⁰ 藏传佛教的那些来自中国的汉族追随者们通常实践的是一种混合版本的信仰，结合了一些来自汉传佛教传统的因素。他们的宗教实践或许不包括对达赖喇嘛的崇拜，这就意味着他们会面临比较少的官方制约。
- **地方官员的态度：**尽管有来自中共中央的强硬政策，地方官员在管制他们自己的辖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少数藏族自治州，某些尤其本身是藏族的官员对宗教活动较为了解，并和当地寺院保持着一种更具合作性的关系。除非受到中央当局的压力或是被迫处理一些备受关注的抗议事件，他们较少采用敌对性的措施，对一些违反政策的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¹¹ 甚至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党委书记领导下，打压的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¹²
- **不同的藏传佛教派别：**达赖喇嘛领导藏传佛教最大的派别格鲁派，不过信奉其他派别的藏人同样尊崇达赖喇嘛。很多宗教限制措施同样施加在属于宁玛派和噶玛噶举派的寺院和信众身上。尽管如此，尤其在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上，那些来自非格鲁派的高僧们似乎较易抵挡一些官方的限制性措施。同时，雄天（Shugden，藏传佛教中的一位神灵）信仰者与达赖喇嘛有着历史恩怨。近年来，中国当局试图利用他们之间的内部分歧，给雄天派寺院和宗教领袖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甚至鼓励格鲁派寺院的僧人崇拜雄天。¹³
- **寺院规模：**寺院规模大小悬殊，小到只能容纳10到20名僧尼，大到如同一座城市，有数千

人居住其中。大型寺院更易于吸引政府注意力和产生政治异议，进而导致受到安全部门的镇压和干预性管控。

- **敏感日期和事件：**安全部队的部署、通讯管制的实施以及对大型集会的限制，事实上都未必是永久性的。相反地，当局经常是在一些政治敏感日期之前采取这些措施——比如3月份的西藏起义周年纪念日或是7月份的达赖喇嘛生日等等——或者是为了响应某些事件，比如自焚或是在某个集市上发生的小型抗议。

由于当局扩大了干预性限制措施、“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以及加强对西藏自治区以外更多地区和较小寺院的监控，上述在管控措施方面的种种差异，近年来已经逐渐消失。

藏人中的藏传佛教信徒人数大体保持稳定，而在过去十年有关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追随者，尤其是一些城市精英。据信有数百万人皈依了藏传佛教。¹⁴ 一些观察人士把藏传佛教，而非汉传佛教，在汉族人当中越来越受欢迎归因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能够直接地为信众们提供更加广泛的精神引领，以及很多汉族信徒对获得超自然能力的兴趣。¹⁵

这种变化对藏区的宗教活动兼有正负两面的影响。一方面，拥有大量汉族信徒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庙宇有更好的管道获得捐赠和来自非政府管道的资金，以及在北京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汉族支持者或许能够在危机时刻进行某种干预，缓和镇压行动并且促使地方官员和寺院领袖通过协商解决冲突。¹⁶

另一方面，汉族信徒的增加也许会引发新的政府干涉。例如，中国政府在2016年1月发布的政府认可的转世活佛数据库，一些专家解读，因为这样的宣告对于藏人信徒几乎没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当局此举主要是力图诱导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的汉族信徒。¹⁷ 一位学者也把自2016年夏天开始的对喇荣佛学院的一系列强拆行动，归因于政府担心其在汉族信徒中的影响力，据报导，有至少1万名学员在那里完成了学习，这个佛学院的一位资深宗教领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累计有超过200万追随者。¹⁸

中共政策的起起伏伏

在1950年，中共军队入侵藏区，并且轻松击败了藏军。第二年，这个地区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并。最初，中共领导的政府试图与西藏政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建立起一种合作性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很快土崩瓦解。¹⁹ 1959年，中国军队镇压了在拉萨发生的大规模起义，据称有上万人被屠杀。达赖喇嘛被迫带领大约10万名支持者逃亡印度。²⁰

1965年，大部分西藏领土被纳入西藏自治区，而西藏高原的东部地区则被作为藏族自治州并入相邻的各个中国省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间，西藏地区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或摧毁。成千上万的僧尼被迫脱下袈裟还俗，任何表达宗教信仰的行为都受到严格禁止和严厉惩罚。²¹

汉族信徒的增加也许会引发新的政府干涉。

在1980年开始的改革时期，政府重新允许有限度的宗教活动，寺院的重建也逐步开始。恢复的规模和步伐很快引起了党的领导人的警觉，并在1980年代后期试图对寺院施加一些干预性管控措施。在1987至1989年之间，这些管控和其他一些不满情绪引发了在拉萨和周边地区近200起大体上是和平的抗议示威。随着反政府抗议在1989年3月升级，政府在拉萨实行戒严，持续到1990年5月。当时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胡锦涛，后来在2003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0年代的政策特点是，中共稳步提高了对藏传佛教的管控措施并努力削弱流亡的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将达赖喇嘛认定为敌人，这是一个关

键性的转变。中国国家媒体随即开展对达赖喇嘛的中伤诋毁，对拥有达赖喇嘛画像和崇拜达赖喇嘛的禁令也很快见诸报导，不过当时这些禁令的法律基础依然不明确，执行程度也因人而异。²² 在随后几年，中共统战部在各个寺院开展了各种“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这些强制性的“学习班”例行地要求僧尼对达赖喇嘛进行口头和书面的声讨。²³

到200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内的各种限制措施已经相当严格，而周边省份仍然相对宽松，藏人依然可以在各省区之间旅行以及获准出国。仅在2007年，就有数千藏人利用各种机会去拉萨甚至去印度旅行，进行朝拜或聆听讲经说法。²⁴ 从2005年左右开始，中国当局开始扩大“爱国主义再教育”和其他强悍的措施，以期降低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影响力。

学者们认为，这些管控措施的扩张是导致2008年3月10日拉萨动荡的关键因素，当时来自拉萨哲蚌寺的僧人领导了一场1959年起义周年纪念游行。²⁵ 在安全机关镇压了僧人们的抗议之后，骚乱爆发了。一些藏人袭击汉族居民并焚烧了汉族和回族人拥有的商铺以及政府办公场所。很快地，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的藏人聚居地区爆发了超过150起大体上是和平的抗议活动。

政府最初的犹豫，明显是为了避免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仅仅几个月时间引发一场引起世人关注的冲突，但最终决定部署大量武装部队作为响应。在至少四起事件中，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枪。²⁶ 中国有关当局报导说在拉萨有19人丧生，主要是死于火灾。²⁷ 而海外藏人团体则声称有至少100名藏人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示威的过程中，遭到杀害。²⁸ 在最初的镇压行动之后，各个寺院被安全部队重兵严控长达数月，同时有数百名涉嫌参与抗议或向海外提供消息的僧俗藏人遭到逮捕和监禁。²⁹

据说，很多官员对西藏高原各地发生的众多大规模藏人抗议事件感到震惊，因为很多人觉得过去9年里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意味着藏人已经接受了中国的统治并且降低了对达赖喇嘛的虔信。³⁰ 事件后中共领导人重新检视了他们的对藏政策，但其非但没有放松那些引发不满情绪的限制政策，反而是强化它们。很多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僧人和学者一再指出，2008年是政府管理藏传佛教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至今，藏区遭遇了更严格的旅行限制、更密集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及在宗教庆典活动和寺院周围部署更为强化的安全力量。³¹

习近平治下的藏传佛教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掌中共之后，他继承的是一个形势殊为紧张的西藏高原。一系列自2009年开始的自焚抗议事件在那时达到顶峰。³² 据报导，由于西藏的文化空间长期遭受侵蚀，以及藏人2008年后在宗教信仰、旅行、儿童教育和日常生活受到的日益严厉的限制，他们深感愤恨和无助，这些经历和感受因而促使他们采取如此决绝的抗议行动。³³ 仅在2012年11月，人权组织报导了28起自焚事件，表明有些藏人至少希望吸引习近平的关注，并希望他能采取较为怀柔的政策。³⁴

在2013年上半年，有那么一个短暂而罕有的政治机遇，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学者发表了数篇文章，呼吁在西藏地区采取更加宽容的政策。一位来自中央党校的专家建议不要再将达赖喇嘛看做敌人，甚至应该允许他作为“宗教领袖”访问香港。³⁵ 有观察人士认为，曾担任胡锦涛副手和统战部部长的令计划³⁶ 在推行对藏强硬政策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其在2015年1月被捕或许会为比较“怀柔”的对藏政策创造一些空间。³⁷

这种乐观态度估计迄今未见任何成效。习近平尚未恢复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上一次为人所知的会谈还是在2010年。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当局基本上延续了胡锦涛时代采用的手法，包括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更加明目张胆的大

“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

— 习近平，2015

规模严厉侵犯，有时甚至还导致了人员伤亡。

在2015年期间，中共的对藏政策似乎成为官方的优先议程，其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有关这个地区的白皮书，³⁸ 8月中共召开了由习近平亲自主持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国家媒体对于这两个事件的报导显示，中国政府打算保持强硬姿态，同时加强教育运动。官方声明明确拒绝了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在中国之内实现真正自治的“中间道路”提议，并断言中共将选择下一世达赖喇嘛。尤为重要的是，在7月份召开的一个高层战略论坛将焦点放在如何协调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省份藏区的“维稳”措施，这个能意味着将来对周边藏区也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³⁹

尽管政策在总体上是延续的，不过有关当局还是对若干现行限制措施的范围进行了深化和扩大。下面援引的各种措施——包括处理自焚案件的指导方针和篡改藏传佛教教义的计划——都是直接由中央当局推动发起的。在2015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宣称要“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传统…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则似乎是由其他较低阶的政府当局主动发起。

1. 以“连坐”阻止自焚：自2012年底开始，一些地区的官员采用诸如取消自焚者家庭的公共福利或者停止自焚者村里的国家资助项目。⁴¹ 2012年12月份，中央的司法和公安机关公布了指导方针，要求将所有参与自焚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协助、聚众行为都视作刑事犯罪，在部分案例甚至可以被视作故意杀人。⁴² 2013年，政府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抓捕自焚者的亲友并判以长期徒刑。
2. 频频禁止节日庆典：尽管有些宗教庆典过去就被禁止，比如达赖喇嘛的生日，但是自2012年以来地方当局限制了更大范围的庆典活动。2014年5月，政府对试图前往岗仁波切峰（Mount Kailash）的人下达了旅行禁令，这座山峰是藏传佛教一处重要的朝圣地。随后在6月份，（那曲地区）比如县的一项地方规定严厉禁止藏传佛教信徒前往参加一个大型法会（指2014年7月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拉达克地区举办的时轮灌顶法会——译者注），这是藏传佛教信徒们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之一。⁴³ 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动，像2015年6月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译者注）的赛马会，也因为间接表达了对达赖喇嘛的崇敬而被取消。⁴⁴ 即便有些节日活动得到许可，也经常伴随有大量武警部署，破坏宁静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摩擦也会迅速升级为致命冲突。⁴⁵
3. 加强处罚一般信徒的宗教活动：虽说全国各地的中共党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但西藏地区包括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学生和教师，都被禁止或积极阻止参加那些其他人通常被允许的藏传佛教日常的宗教活动，包括去寺院进行供养和在家中私自设立佛堂等等。⁴⁶ 2015年期间，在一项明显是为了强化这些禁令的行动中，西藏自治区当局对中共干部和公务员当中的违纪行为进行了处罚。根据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所说，这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那些“对宗教明里不信暗里信”的人。⁴⁷ 另外，在2015年初，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干部们传阅了一份文件，其中列举了各种可能受到严惩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被解读为支持西藏独立；像念颂祷文和烧香这样普通的宗教活动也被名列其中。⁴⁸
4. 篡改教理教义：一个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方案在习近平当政后变得来势汹汹，这项方案旨在篡改藏传佛教的教理教义，使之能更好的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⁴⁹ 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教授在他2016年出版的《党即是佛》（Buddha Party，暂译）一书中详述了这个方案。该方案在各项内容当中包括了，自2012年起举办藏学会议，以确定藏传佛教的教义中哪些是对党有利的，并且每年出版类似于《藏传佛教教义阐释》（2011年出版）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据称是各个寺院的指定阅

读，而且已经成为“爱国主义再教育”课程的核心内容。

一个同时出现的事态发展是，2011年10月在拉萨开办了一所新的政府支持的“西藏佛学院”，它的第一届毕业班已于2013年完成培训；该佛学院所属的“尼姑部”也正在建设中。⁵⁰ 一位学者认为官方的这些努力与2016年开始的对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存在某种关联，此前若干年政府对喇荣五明佛学院一直比较宽容。⁵¹ 最近一些年，这个佛学院的各寺院领袖在推广一项伦理层面的“佛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运动已经赢得成千上万的藏人追随者，因而可能被当局看做是官方自身试图改变藏传佛教信仰内容的竞争对手。⁵²

有众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就算这些手段明显地增强了不满情绪，而且在遏制达赖喇嘛的影响力方面收效甚微。

首先，中共对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内在的焦虑依然未变。正如学者本·希尔曼（Ben Hillma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注意到的，“有组织的藏传佛教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对共产党在西藏地区统治的最大的潜在威胁。”⁵³

第二，这些政策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假设，即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相关的民族认同——将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消亡。中国领导人依然对他们以现有工具实现这个长期目标的能力，保有自信，即便过程中有偶尔的动荡挫折。⁵⁴

第三，领导人的个人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1年8月上任，直至2016年8月离任。自上任伊始，他就开始实施若干项目，旨在对民众进行监控和在僧俗信众当中灌输中共的信条。对于西藏的这个地区而言，地区领导人的变动似乎要比一年后北京更全面的权力交接对政府的日常行为影响更大。

第四，虽然令计划遭到清算，但“统战部”依然是中共的一个实权部门，也是在藏区实行诸如“爱国主义再教育”这样的“管控与拉拢”策略的主要推手。统战部目前的上级主管是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他也是政治局下属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

最后，有关官员提拔和对西藏地区的中央集权式的资金分配等结构性因素，也促使地方官员将精力集中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打压社会动荡，而不是去解决社会需要以及和宗教人士建立合作性的关系。同时，给地方政府输送的数十亿元“维稳”经费也刺激了安全机构的扩张，使安全部门有持续其打压行动的机构性利益。⁵⁵

主要政治管控手段

中国对西藏的僧俗信众实施了范围广泛的管控措施。这些措施日益侵入和蚕食到一些原本不受骚扰的生活领域。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监控措施——通过安全部队、线人、闭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监控，甚至包括无人飞机⁵⁶——已经给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动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和恐惧的氛围。在公共场所和寺院里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和口号，时时提醒僧俗民众官方的各种宗教管理规定，要求人们将对国家的忠诚放在首要位置，以及告知违反规定——比如携带念珠或其他宗教物品进入政府大楼或学校——将会遭受的惩罚。⁵⁷

所有这些措施，再加上以下列举的这些主要管控措施，似乎都是服务于中共旨在管理藏传佛教的一些目标：

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监控措施已经给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动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和恐惧的氛围。

- 削弱寺院与周围社区之间的联系
- 切断民众与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宗教领袖们之间的纽带
- 提高政治上忠诚的宗教领袖和有利于政府的教义阐释的影响力，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政府指定的班禅喇嘛
- 在藏人当中培养宗教认同度较低的社会经济精英
- 限制寺院社群的规模和寺院教育的质量。
- 阻止因宗教信仰或对达赖喇嘛的虔信而引发的抗议

1. **管控宗教领导人，包括转世活佛：**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如中国佛教协会，不遗余力地掌控对宗教领袖的任命，并利用他们来向其信众传达政府立场。就藏传佛教而言，由于转世系统在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和高僧（如一些主要寺院的住持）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项任务尤为棘手——甚至有些荒诞。作为明确表示自己是无神论和拒绝相信灵魂转世的中共，坚持要把对自己的政治忠诚作为前提条件来管理转世灵童的选择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认可。

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发了一份文件，名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声称活佛转世必须得到国家批准。⁵⁸ 2016年1月，有关当局发布了一个新的官方认可的转世活佛（朱古）的网上数据库，引人注目的是达赖喇嘛被排除在这个数据库之外。近年来，那些试图对他们的未来转世提供指导或是征求达赖喇嘛意见的寺院领袖，或是遭到拘捕、驱逐，或是被禁止与他们寺院的僧人继续进行交流。⁵⁹

按照2015年8月发布的官方统计，有超过7千名官员在西藏自治区的1787座寺院里工作。

2. **对僧尼寺院实施大规模管控：**有一长串政府规章条例影响着寺院的生活，其中包括各个寺院许可的人数限额，有关在寺院内和周边社区举行宗教活动必须获得官方批准的规定，以及要求详细记录寺院财务状况和每月汇报“爱国主义再教育”的进展。⁶⁰

通过摄像头或是在寺院中实际部署警力进行的大规模监控，从而威逼僧人就范，同时也提供途径来识别政策落实中的漏洞。对拒绝服从者的处罚包括从逐出寺院、开除僧籍、逮捕入狱直至彻底关闭寺院。过去，官方工作小组进驻寺院，尽管有时会长达数月，但仍仅是临时性措施，并且，寺院日常的管理委员会还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僧尼领导。如今，在寺院永久性派驻政府官员的管控模式自2011年8月起逐步扩大，并通过2012年1月发布的管理规定而得以正规化。⁶¹ 按照2015年8月发布的官方统计，有超过7千名官员在西藏自治区的1787座寺院里工作，平均每座寺院四名。⁶²

3. **“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扩大化：**自1990年代起，就断断续续有意识形态教育运动，但是从2008年以后，此类运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漫长。而且已经逐渐超出寺院的范围而向藏区一般民众延伸，如强迫学生、公务员、农民和商人参加学习讨论、唱红歌、及看宣传电影。

从2011年开始，据报导有超过2.1万名干部被派往西藏自治区各地乡村。除了政治监控和其他任务，据称他们还要在宗教场所和信众当中举办“爱国主义再教育”学习班。⁶³ 这样的学习活动通常会要求谴责达赖喇嘛，承认政府选定的班禅喇嘛以及宣誓效忠于中共的政治权威。“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向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更多寺院和一般民众的扩张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变化，而且据称在很多藏人中引起反感。

尽管达赖喇嘛准许藏区的信众们可以在遭受逼迫时对他进行谴责，因为这事关自我保护，但是很多忠诚的信徒依然对这种做法感到难受。⁶⁴ 那些屈从的人指出他们因此所遭受的心理摧残而最终中断他们在寺院的长期研习。⁶⁵

4. 在藏区内外限制旅行：在过去十年，藏人出国变得越来越难，无论是寻求庇护或是去印度或其他的国家的短暂访问。进入尼泊尔的难民人数从2007年的超过2000人锐减到2014年的大约100人。2015年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显示，藏人常常被拒发护照或是在从印度旅行返回之后受到讯问。⁶⁶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对这些限制措施的效果感到骄傲，他在一次媒体采访中声称，“在2015年，西藏自治区无一人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印度举办的法会。”⁶⁷

在藏区，僧尼出国旅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近期的游客还提到了一项自2012年起执行的非正式禁令，限制任何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访问这个地区，包括那些前往朝圣的人。⁶⁸ 学者们也注意到越来越严格的旅行限制，尤其是藏人再也无法逃出境外，更加剧了他们的绝望情绪，进而激发了自焚等极端行为的出现。⁶⁹

5. 加强信息控制：局部地区的互联网和手机通讯封锁——尤其在那些出现自焚事件的地區——时有发生，而且自2012年初以来愈加频繁，并持续到2016年。⁷⁰ 2016年，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5年479起藏人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押的案件，确认其中有71人是由于传播图片或信息而遭逮捕。⁷¹ 那些案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涉及传播与自焚相关的消息，被告人最高被判处13年刑期。⁷² 那些曾经与藏区同仁保持密切联系的流亡海外的僧人和活动人士报告说，到2016年初，从藏区获得信息已经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此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只能停止与国内的人联系。⁷³

一位著名喇嘛在狱中去世，据报导安全部队开枪驱散了大约一千名集会悼念他的群众。

6. 动用武力镇压，伤亡时有发生：在藏区的安全部队经常使用武力手段来镇压和处罚那些他们认为的政治异议，这包括一些出自宗教信仰的非暴力行为。2012年以来，有很多藏人由于拥有或分享达赖喇嘛的图片、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或是制作和传播其他被查禁的有关宗教或宗教压迫的信息，遭到拘押或被判入狱。⁷⁴ 曾经遭受拘捕的人不断提供有关酷刑的记录，例如殴打、电击棒电击、被迫长时间保持一个难受的姿势等等。⁷⁵ 这些虐待，再加上得不到医疗照顾，据报每年都有若干西藏良心犯在拘押期间丧生，这其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⁷⁶

除了发生在警察局、违法设立的拘留中心和监狱的虐待事件，据了解安全部队会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有时甚至是在宗教庆典期间，而涉事军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在2015年7月一个著名的案件中，著名喇嘛旦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⁷⁷ 据报导安全部队开枪驱散了大约一千名集会悼念他的群众，至少有15人因枪伤被送往医院。⁷⁸

经济奖惩：胡萝卜、大棒和旅游开发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日益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汉人对藏传佛教日趋浓厚的兴趣，在过去十年，藏区国内外游客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可预期地，青藏高原各地的官员都试图利用这个生财之道。由于西藏自治区增加了旅行限制，包括时常禁止游客进入，自治区周边各省的藏区获得了游客们的广泛青睐。

在云南省迪庆州，地方官员与藏传佛教领袖建立起实质的关系并且为修葺重要寺院提供资金。双方在迪庆州的主要城市被更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虚构的人间天堂——之后，都从旅游业的急速发展中获得了利益。据报导，这些经济收入使得寺院可以资助年轻的僧人去其他宗教机构深造。一般信众也从以旅游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了利益，旅游业提供了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不像政府工作人员那样受到各种宗教限令的约束。根据学者本·希尔曼（Ben Hillman）的研究，这种富有成效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迪庆州采取了“中国藏区最为开放的方式对待藏传佛教”。⁷⁹

在其他一些藏传佛教地点，旅游业据称则对宗教自由产生了较为不利的影响。例如，拉卜楞寺的僧人们就抱怨，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造访干扰了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⁸⁰ 在西藏自治区，一位国外观察者则关注到，在一座寺院内部和周围原本住着一些藏人朝圣者的地方，现在已经由一些针对中国游客的停车场和纪念品商亭取而代之。⁸¹

中国当局还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促使藏人顺从政府各项指令和举报他们的同胞。政府提供最高20万元（3.1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提供与自焚事件或其他抗议行为僧人相关信息的举报人。“顽固不化”的寺院所获得的政府资助会转而流向那些政治上更加忠诚的寺院，或是世俗的社会服务提供商，抑或是新的基础建设项目。⁸²

政府提供最高20万元（3.1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提供与抗议行为僧人相关信息的举报人。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威胁要从那些不遵从有关宗教规定或禁令的家庭或村庄撤走政府补助。⁸³ 有些家庭或村庄因为参与了政治或宗教的抗议行动而被禁止采集冬虫夏草——这种每年只有几周可以采集的药草是很多藏人的一项可观的收入来源。⁸⁴

社会反响与抗争

中国对藏传佛教施加控制的多重手段，已经在西藏高原各地的僧俗民众当中造成明显不满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反感或引发骚乱的官方行为不只是政府过度使用武力而已，还包括对平常生活的无处不在的管控，比如旅行禁令、禁止私下敬拜达赖喇嘛、在寺院里的政治宣传等等。⁸⁵ 这些管控措施对众多参与或未曾参与某种政治抗议的僧众都造成了影响。

这些干涉，加上官方惯常以施恩者自居的腔调，在藏人当中造成了强烈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政府不尊重和故意亵渎他们宗教信仰。日益增多的官方使用极端暴力的案例进一步说明中国官员和安全部队对藏人的生命缺乏尊重，2014年流亡海外的僧人和酷刑幸存者果洛久美（Golog Jigme，拉卜楞寺僧人）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即表达了这种感受，他说“政府觉得我们藏人还不如动物，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⁸⁶ 学术性的研究和藏人抗议者的记述都一再指出，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那些抗议行为，而不是流亡的运动人士或是达赖喇嘛的鼓动。然而，中国政府却一直声称藏人的抗议行为是受到“敌对势力”的影响以及“达赖集团”的煽动。⁸⁷

由于施加在那些公开挑战官方政策人士身上的严厉惩罚，以及通过政治化的司法体系寻求正义的前景渺茫，大多数藏人用四种方式来响应限制性的宗教政策——逃亡境外、⁸⁸ 合作、回避和“阳奉阴违”。

- **逃亡境外：**在2008年以前，每年有数千藏人逃亡。那些成功出逃的僧人和宗教领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他们的动机是想要接受良好的寺院教育，这在藏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⁸⁹ 随着西藏高原各地越来越多的警方检查站和尼泊尔边界的军力增强，逃亡这一选项已经基本被堵死，不过每年还是有很少一批难民出逃。
- **合作：**有很大一批藏传佛教领袖与中国当局积极合作，还有一些人寻求与地方官员进行洽商，从而在与他们对信众的责任和服从官方指令之间求得平衡，以图将官方的镇压行动降到最低程度。⁹⁰ 积极合作的最突出的事例是现年26岁由政府认定的班禅喇嘛确吉杰布。他在各种政府主办的会议上发言，还在一些特殊场合对信众进行教导，并在2010年年仅二十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全国政协委员。官方媒体和统战部网站上刊登的文章中，经常特意发表其他一些僧人、住持和官方认可的活佛们的照片和言论，指出他们执行党的路线并感谢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支持。⁹¹ 很多藏人对这些人持怀疑态度，而其他一些在当地社群德高望重

的宗教领袖则试图与地方官员建立起一种合作性的关系，以此来缓解冲突和抵御迫害，这些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⁹²

- **回避：**当政府在他们的寺院里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时，回避策略在僧侣们当中尤为普遍。根据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一座寺院的流亡僧人说，2012年官员们来寺院举办一系列学习班，尽管一再被要求参加，很多僧人还是不出席。他表示，由于官员们担心在寺院里引起抗议，宁可不强迫僧人们参加——这座寺院因曾经发生抗争而闻名，而类似的骚乱对官员们自己也会产生不良影响。⁹³

被迫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学习班的那些僧人们，很多人尽量修饰他们的发言，只承认官方宣传中要求背诵的某些部分，诸如尊重官方的宗教政策等等，而避免发表更加敏感，像谴责达赖喇嘛之类的意见。⁹⁴ 在另一些情况下，据了解一些僧尼在“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或是其他官方检查期间——例如确认寺院里有无18岁以下的僧人或者是否所有人都有获得在寺院学习的官方许可——会暂时逃出他们的寺院，躲避在当地社区或是在周边的山里。⁹⁵

- **“阳奉阴违”：**藏民众当中私下的抗争行动几乎和他们力图破坏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样的广泛和多样。这些抗争出现在中国政府无法触及的私人和精神信仰范围。很多僧侣和一般信众秘密保有达赖喇嘛的画像或检查者无法当下察觉的其他代表这位精神领袖的物品。这些物品或是藏在盒子里、在照片框背后、存在电子设备里，或是在毯子下面。有些地方官员或是同情藏人、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些地区仅仅禁止公开张贴画像。⁹⁶ 很多藏人还在家中私下教育他们的孩子有关达赖喇嘛的事迹或是其他他们或许无法透过一般管道接触的藏传佛教的教义原则。⁹⁷

201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藏人庆祝拉嘎节（Lhakar，藏语意为“白色星期三”）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虽说该运动主要聚焦于展示文化认同（例如说藏语、穿戴藏装），但由于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其因而有强烈的宗教意涵。⁹⁸ 相对于其他人，越来越多的藏人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寺院进行供养，或是在家中和当地宗教场所悬挂经幡。⁹⁹ 类似地，在禁止展示某些宗教象征的背景下，一些藏人会悄悄地佩戴“和平护身符”，代表他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决心遵从“佛教十善德”和不对藏人同胞暴力相向。他们通过这种间接的和非对抗性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和致力于藏人团结的决心。¹⁰⁰

藏民众当中私下的抗争行动几乎和他们力图破坏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样的广泛和多样。

尽管冒着监禁、酷刑和死亡的危险，每年依然有许多藏人僧俗民众以积极的和政治性的抗议方式反对政府对宗教的打压政策。¹⁰¹ 这些抗议几乎都是非暴力的。类似2008年拉萨自发性的骚乱事件和2013年在那曲比如县发生的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但是相对而言，已经少有发生。

自焚：近年来在藏区发生的最为激烈、极端和有争议的抗议形式，是自2011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¹⁰² 尽管最初的一些案例主要涉及僧尼，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信众采取这一行动，到2016年中期，自焚者中的信众人数已经超过了僧侣。从地理位置上看，绝大多数有记录的自焚事件（大约95%）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中以四川省发生数量最多。这种差异或许反映了西藏自治区对抗议运动和信息更加严格的管控，以及在2010年之前相对自由的地区，对打压政策更加强烈的反应。

虽说各项不同的官方政策都似乎激发了自焚抗议的发生，至少有些带有宗教色彩的部分，从抗议者呼喊的口号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口号包括“愿达赖喇嘛长久驻世”、要求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或是要求释放最初由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喇嘛等等。但是，一些对藏区问题有深

入了解观察者认为，自焚抗议事件的增加大体上可以解读为生活在中国统治下的藏人绝望情绪的一个信号，尤其当逃亡境外变得愈加困难的时候。尽管如此，这种抗议方式——以及达赖喇嘛没有对其积极加以指责——明显地在佛教信徒和西藏学者们中间引起了争议，有些人把自焚者看作殉道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便是在极端情况下，自杀行为也不应该被宽恕或美化。¹⁰³

公开抗议：随着当局将对自焚事件的惩罚扩展到自焚者的朋友、家人和甚至整个村庄，采取这种抗议形式的人数似乎在减少，在2016年上半年仅发生了两起有记录的自焚事件。取而代之的，发生在集市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单人抗议事件变得引人注目。这样的示威活动通常只有一名僧尼或是信徒手持达赖喇嘛的照片或是代表西藏独立的图片，比如西藏国旗，走过街市。安全部队通常会立即扑向抗议者并拘押他们。违犯官方禁令的较大规模的集会也依然偶有报导。

得失胜负谁评说

虽然面对种种困难和愈加严厉的打压，上文所描述的各种抗争依然取得了某些成功。最为显著的是在中国境内藏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尽管他已经流亡印度超过50年，尽管中国政府想方设法对他进行妖魔化、否定他的宗教权威和强迫信徒们谴责他。

事实上，这种韧性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中国政府自己的言论和旨在镇压所有对达赖喇嘛虔信迹象的各种运动。例如，来自中央统战部的一位高官认为，除了各种其他理由，政府支持的新建西藏佛学院在“抵御达赖集团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方面也是非常必要的。¹⁰⁴再者，如果僧俗信众没人参加为达赖喇嘛进行的祈祷活动，或是没人在公共场所展示达赖喇嘛的画像，青海省有关当局就不会在2015年颁布的规定中，特别加入具体条款来禁止类似活动和重申有关惩罚。¹⁰⁵

至于其他的抗争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对于个人示威者甚或是自焚者而言，只要能够进行抗议并有他人在警方采取行动前目睹其抗议行为，就意味着一种胜利。逃离警方拘押并流亡境外的僧人果洛久美解释说，他成功抵达印度就是一个胜利，但是他被迫离开不愿意离开的故土，则是一个损失。他的案件得到国际关注，他说他两次提早获释和最终没有被判入狱得益于国际社会为此施加的压力。¹⁰⁶

对于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与中国当局磋商的藏人宗教领袖们而言，哪怕是获得小小的让步或是得到某些宗教活动的许可也是胜利。不过，想要减少与政府当局之间分歧的努力并非总能如愿以偿。2014年在那曲比如县，安全部队在一座神山附近发生的冲突中，向民众开枪，事后寺院领袖支付了受伤民众的医疗费用，然而当局最后依然在这年年底关闭了这座寺院。最近，在喇荣佛学院，尽管人们认为学院的领导人们与地方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但是大规模的强拆行为在2016年从未停止。¹⁰⁷这些挫败从长远而言，将使得避免冲突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表明妥协与调和得不到任何回报。

未来展望

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权威长期以来明确而又复杂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的主要宗教中独一无二。这已经给中共的政策带来特别的挑战——官员们试图在某些程度上允许一些宗教活动，而同时要强力镇压任何被认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行为。一直以来各种限制性措施都在强调后者的优先地位，不断地侵蚀破坏日常和平的宗教活动，并在越来越多的僧俗信众当中激起怨恨。

达赖喇嘛在2011年就已经将所有手中所剩的政治权威移交给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但是中国政府依然把他看做一个政治威胁，而不纯粹是一个宗教人物。事实上，中共寄望在十四世达

中国境内藏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最强有力的证据来自中国政府自己的言论和旨在镇压所有对达赖喇嘛虔信迹象的各种运动。

“如果习近平有时间好好梳理对藏政策，停止攻击达赖喇嘛，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问题能够因而得到解决。”

— 学者罗伯特·巴内特

赖喇嘛圆寂之后，集中力量控制他的转世。政府已经宣称，下一世达赖喇嘛将出生在西藏境内。

由于藏人对达赖喇嘛虔信的韧性，以及不愿意真正接受政府支持的班禅喇嘛，政府的声明似乎注定造成更多冲突。反之，如果中共领导人能决定采取更为调和的措施并接受达赖喇嘛作为宗教人物的作用，他们或许会因为社会紧张程度的降低而收获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有关西藏问题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认为，“如果习近平有时间好好梳理对藏政策，停止攻击达赖喇嘛，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问题能够因而得到解决。”¹⁰⁸

注解

1. 《民怨沸腾导致藏区反抗》（Simmering Resentments Led to Tibetan Backlash），Jim Yardley，《纽约时报》，2008年3月18日，<http://www.nytimes.com/2008/03/18/world/asia/18china.html>；《张庆黎做客新华网：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新华网，2007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2/content_5792651.htm。
2. 本文作者在2016年8月进行的采访。
3. 基于藏区案件的分析列举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中，这些分析来自于人权团体的报告和新闻媒体报导。见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2016年11月30日浏览）<http://www.cecc.gov/resources/political-prisoner-database>。
4. 《冷酷无情：中国“维稳”运动中藏人遭遇拘禁和迫害》，人权观察，2016年5月22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6/05/22/relentless/detention-and-prosecution-tibetans-under-chinas-stability-maintenance>。
5. 对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境外藏人研究者的采访，2016年7月。
6. 《信仰佛教人数众多，全国佛教僧侣22万居五大教之首》，中国民族宗教网，2014年4月3日，<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14041545-1.htm>。
7. 《西藏僧尼享受更多福利》，巴丹尼玛和达琼在拉萨报导，《中国日报》，2014年1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01/17/content_17242870.htm；《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9月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dfwtbbs/Document/1447090/1447090_4.htm。
8.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pccsj/rkpc/6rp/indexch.htm>。
9. 《一中多藏：迪庆是“有西藏特色”的发展模式？》，Ben Hillman，《亚洲民族》杂志（Asian Ethnicity）11, no. 2（June 1, 2010）：269–77。
10. 在四川的一个村子对尼玛拉姆（Nyima Lhamo）的采访，2016年8月。
11. 《一中多藏》，Hillman；对Julia Famularo的采访，2016年8月。
12. 例如，在2005年至2010年担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张庆黎，就被认为是一名强硬路线领导；国家媒体曾引用他严词诽谤达赖喇嘛的言论，他亲自督导强化了“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相反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1980年代担任自治区书记的伍精华则领导了一段宗教复兴和重建的阶段。当时在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下，全国有一种政治自由化的氛围。
13. 《中国拉拢一个佛教派别在全球诋毁达赖喇嘛》（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the Dalai Lama），David Lague, Paul Mooney, and Benjamin Kang Lim，路透社，<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7，http://savetibet.de/fileadmin/user_upload/content/berichte/2007ReligionReport.pdf。
14. 《达赖喇嘛说，中国人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在加深》（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issue is growing says the Dalai Lama），达赖喇嘛办公室，2012年1月3日<http://www.dalailama.com/news/post/783-chinese-understanding-of-tibetan-issue-is-growing-says-the-dalai-lama>。
15. 《当今汉族与藏传佛教：一个来自南京的案例》（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ibetan Buddhism: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Alison Denton Jones，Sage Publishing，June 1, 2014，<http://scp.sagepub.com/content/58/4/540.short>；《藏传佛教与汉族：更强大的现代中国给西藏传统添加新内涵》（Tibetan Buddhism and Han Chinese: Superscribing New Meaning on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Modern Greater China），Joshua Paul Esler，http://research-repository.uwa.edu.au/files/4389752/Esler_Joshua_2013.pdf。
16. 采访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学程主任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2016年7月。
17. 采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人员，2016年4月。
18. 采访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2016年8月；见索达杰堪布的新浪微博，在2016年11月10日，该微博有2,151,223名粉丝。<http://www.weibo.com/suodj>。
19. 形势自195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越发危急。藏人对中共的疑虑开始增加，在西藏东部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反叛。在拉萨的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的权威正在逐渐遭到侵蚀，这更增加了不满情绪。随着东部藏区战斗的加剧，藏人中的反中情绪也在增加，促使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产生广泛担忧。

20. 《雪域境外流亡记》，约翰·艾夫唐（John Avedon），（New York: Vintage, 2015），72。
21. 《龙在雪域》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限制与异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与对藏管制》（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 The Third Forum and the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Tibet），《当代中国事务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41, no. 4 (February 1, 2013), 45–107。
23. 同上。
24.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宗教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7。
25. 人权观察，《中国禁区：媒体封锁西藏和其他“敏感”话题》，July 6, 2008, <https://www.hrw.org/report/2008/07/06/chinas-forbidden-zones/shutting-media-out-tibet-and-other-sensitive-stories>。
26. 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党即是佛：中国如何界定和控制藏传佛教》（The Buddha Party: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s to Define and Control Tibetan Buddhism），（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 《儿童在拉萨骚乱的火灾中被烧死》，中国日报，2008年3月2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3/24/content_6559963.htm。
28.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转折点上的西藏：春季的起义与中国新镇压》，2008年8月6日，https://www.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Tibet_at_a_Turning_Point.pdf。
29. 同上。
30. 《党即是佛》，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
31. 2016年8月对一名2014年抵达印度的西藏僧人的采访，他是一名酷刑幸存者；2016年8月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和语言学院教授约翰·鲍尔斯的采访。
32. 自2009年以来，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省份已经确认有144起自焚抗议：2011年12起，2012年86起，2013年27起，2014年11起，2015年7起，2016年截至3月发生一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自焚抗议地图：2009-2016》，2016年3月2日，<https://www.savetibet.org/resources/fact-sheets/self-immolations-by-tibetans/map-tibetan-self-immolations-from-2009-2013/>。
33. 很多自焚者的言论和遗言也显示，抗议的主要听众对象是他们的藏人同胞，很多自焚者强调藏人要团结要通过减少藏人之间的暴力冲突、说藏语、给孩子们传授藏人的文化传统来抵制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约翰·鲍尔斯的采访。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西藏的政治性自焚：原因与影响》（Political Self-Immolation in Tibet: Causes and Influences），Revue d' Etudes Tibetaines 25 (2012), 41–64,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ret/pdf/ret_25_03.pdf。
34. 自焚事件最多的月份据报导是2012年11月。《藏人为何自焚？》，茨仁唯色（Tsering Woesser），《纽约时报书评》，2016年1月11日，<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6/01/11/why-are-tibetans-self-immolating/>。
35. 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3年度报告》，October 10, 2013,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3-annual-report>；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来自中国内部对西藏政策的新挑战》，2013年6月27日 <https://www.savetibet.org/new-challenges-to-tibet-policy-from-inside-china/>。
36. 《中国前任国家主席的助手令计划被捕》，查尔斯·克洛佛（Charles Clover），金融时报，2015年7月20日，<http://www.ft.com/cms/s/0/a1e33ca6-2f4f-11e5-8873-775ba7c2ea3d.html#axzz4HhwJYdrl>。
37. 对罗伯特·巴内特的采访，2016年7月。
38. 《西藏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全文）》，2015年4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15/c_1114974653.htm。
39. 《日印特殊伙伴关系与中国》，苏巴什·迦毗罗（Subhash Kapila），南亚分析，November 13, 2016,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china>。
40. 《西藏：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团结，习近平说》，Claude Arpi, August 26, 2015, <http://claudearpi.blogspot.com/2015/08/tibet-cherish-unity-with-china-as-if-it.html>。
41. 《“荒诞而可怕”的新规则把矛头指向家人、村民和寺院，加快对自焚事件判罪》，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4年2月24日，<http://www.savetibet.org/absurd-and-terrifying-new-regulations-escalate-drive-to-criminalize-self-immolations-by-targeting-family-villagers-monasteries>。
42. 《煽动自焚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甘南日报》，2012年3月12日，<http://gn.gansudaily.com.cn/system/2012/12/03/013508017.shtml>。
43. 《当局向西藏比如县藏人运动施加进一步限制》，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2014年7月13日，<http://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150-further-restriction-imposed-on-tibetans-movement-in-driru-tibet>。
44. 《中国在达赖喇嘛生日前夕禁止藏区群众集会》，Richard Finney 等，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6月10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blocks-06102015160216.html>。
45.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西藏观察，2016年4月，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tibets_intolerable_monasteries.pdf。
46. 《限制与异动》（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西藏的动荡与区域自治的局限》（Unrest in Tibet and the Limits of Regional Autonomy），本·希尔曼（Ben Hillman）。见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编辑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反抗》（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Tibet and Xinjia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39。

47. 部分英文翻译见《中共西藏书记在南希佩洛西访问拉萨时，谈在反达赖喇嘛的斗争中划“红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11月13日，<https://www.savetibet.org/tibet-party-boss-speaks-of-establishing-red-lines-in-the-anti-dalai-lama-struggle-as-nancy-pelosi-visits-lhasa/>；《共产党警告那些暗中追随达赖喇嘛的各级干部》，Edward Wong, 《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
48. 《为达赖喇嘛祈祷和点酥油灯是“非法的”：热贡地区的新规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4月14日，<https://www.savetibet.org/praying-and-lighting-butter-lamps-for-dalai-lama-illegal-new-regulations-in-rebkong>。
49. 2016年7月，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
50. “西藏佛学院首批学员毕业 被授予自设学衔”，中共中央统战部，2013年7月16日，<http://www.zyztb.gov.cn/tzb2010/S1831/201307/741370.shtml>。
51. 2016年7月，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中国：佛教寺院面临强拆》，人权观察，2016年6月9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6/09/china-buddhist-monastery-faces-demolition>。
52. 《非暴力：青藏高原上的移动信标》（Non-violence as a shifting signifier on the Tibetan plateau），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当代佛教》（Contemporary Buddhism）(2016), 1-19,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39947.2016.1189155>;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2007年8月2日，<http://www.sara.gov.cn/zcfg/bmgz/571.htm>。
53. Hillman, 《西藏的动荡》（Unrest in Tibet）。
54. 对Julia Famularo的采访，2016年8月。
55. Hillman, 《西藏的动荡》（Unrest in Tibet）；对Robert Barnett的采访，2016年7月。
56. 对一名西藏僧人的采访，2016年8月。
57. 《广场上的宣传：在中国西部向维吾尔人和藏人传达政府有关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Antonio Terrone. 见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编辑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反抗》（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40-59。
58. 国家宗教事务局,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
59.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来的西藏抵抗运动中的作用》。
60. 很多这些管控措施都是基于2007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办法，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出版的《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一书中有记载和英文翻译，见第89页。
61. 在西藏自治区，这种管控要求一个新的官方委员会来管理日常运作和强化宣教运动。在自治区以外，原有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系统得以保留，只是加入了一名政府官员作为副主任，当然会有些例外。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据报导，当局下令在2014年6月之前所有寺院必须由干部或党指派的人员替代原来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管委会成员。
62. 美国国务院《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部分（含西藏、香港和澳门），本文数据采集于2016年11月30日，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dynamic_load_id=256099&year=2015#wrapper。
63. 《达赖喇嘛对信众们说，“谴责我吧”》，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Canada Tibet Committee, 1999年2月8日，http://www.tibet.ca/en/library/wtn/archive/old?y=1999&m=2&p=8_3。
64. 2016年8月对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的采访；《中国：监控西藏无止期》，人权观察，2016年1月18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1/18/china-no-end-tibet-surveillance-program>。
65.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中国统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66. 《中国对藏人和其他人的国际旅行限制》，人权观察，2015年7月13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7/13/one-passport-two-systems/chinas-restrictions-foreign-travel-tibetans-and-others>。
67. 《共产党警告那些暗中追随达赖喇嘛的各级干部》，Edward Wong, 《纽约时报》，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立党之本》，张磊,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11月9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11/09/content_19075.htm。
68. 《西藏的动荡》，Ben Hillman。
69. 对John Powers的采访，2016年8月。
70. 《妇女骇人吊死震惊藏区，警察禁言所有质疑》，Simon Denyer, 《华盛顿邮报》，2016年8月2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young-womans-death-in-tibet-provokes-anger-and-a-brutal-crackdown/2016/08/25/239b628a-63bd-11e6-b4d8-33e931b5a26d_story.html。
71. 《冷酷无情》（Relentless），人权观察。
72. 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州比如县的茨城坚赞（Tsultrim Gyaltzen）和宇杰（Yulgyal）在2013年10月，分别被判处13年和10年徒刑，罪名是“从事分裂活动和散布（与抗议活动有关的）谣言破坏社会安定。”
73.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74. 《因达赖喇嘛照片被判入狱18年》，自由西藏，2014年4月1日，<https://freetibet.org/news-media/na/18-years-prison-dalai-lama-picture>。
75. 僧人南杰慈成（Namgyal Tseltrim）2013年5月11日从拉萨的一所监狱被释放，此前他被关押了将近8个月，没有正式逮捕、控罪或判决。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到酷刑导致右手失去功能。根据当地的一位藏人透露，当局在南杰慈成寺院里

- 的住处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达赖喇嘛讲经说法的DVD。当局随后指控南杰慈成犯有“分裂国家”罪。见《无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5年2月26日，<https://www.savetibet.org/newsroom/torture-and-impunity-29-cases-of-tibetan-political-prisoners/#tortured>。
76. 《西藏宗教领袖旦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去世》，Patrick Boehler, 纽约时报，2015年7月13日，http://www.nytimes.com/2015/07/14/world/asia/tenzin-delek-rinpoche-tibetan-religious-leader-dies-in-chinese-custody.html?_r=0。
 77. 同上。
 78. 《照片披露藏人遭中方枪击惨状》，藏人行行政中央，2015年7月15日，<http://tibet.net/2015/07/grievous-photos-emerge-of-tibetans-injured-in-chinese-firing/>；《无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比如县实施新的严厉“整治”措施：尼师遭到驱逐并威胁要拆毁寺院和玛尼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November 20, 2014, <https://www.savetibet.org/harsh-new-rectification-drive-in-driru-nuns-expelled-and-warning-of-destruction-of-monasteries-and-mani-walls/>。
 79. 另有一位观察者注意到，这个地区也是一个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地方，一些藏人僧侣的汉语比藏语更熟练——这或许是寺院与官方关系比较摩擦的一个原因或是结果。见《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Hillman。
 80.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1. 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研究者的采访，2016年4月；《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82.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3.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了西藏自治区江达县当局，命令居民叫回他们家人中在其他省份的佛教中心学习的僧尼，那些被发现违反命令的家庭被威胁取消所有形式的政府补助。见《西藏一个县的僧尼在宗教镇压运动中被迫返乡》，Kunsang Tenzin, Karma Dorjee 和 Richard Finney报导，自由亚洲电台，2014年10月24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return-10242014162330.html>。
 84. 例如，在2014年9月，直接针对比如县的抗议活动，比如县人民政府下达严厉指令控制居民。列举出的惩罚措施如下：“悬挂或私藏达赖画像的普通群众将强制接受为期6个月的法制教育，并剥夺收集冬虫夏草的权利两年。”《比如县实施新的严厉“整治”措施：尼师遭到驱逐并威胁要拆毁寺院和玛尼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85. 《广场上的宣传：在中国西部向维吾尔人和藏人传达政府有关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Terrone。
 86.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观察。
 87. 《广场上的宣传》，Terrone。
 88.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9. 《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90.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
 91. 《环球时报》报导：来自昌都一座寺院的Jizhong活佛说，“现在是藏传佛教历史上最好的时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展爱国爱教的传统，为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做贡献。另见环球网，“Training course for new Living Buddhas held.”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6253.shtml>。
 92. 一些观察人士一直把喇荣五明佛学院作为发展与地方官员积极关系的例证，但是这个事例在2016年当局发动强拆学院住所时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见《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Hillman。
 93. 对一位西藏僧人的采访。
 94. 这种方法并非总能成功，因为官员们也采取了相应的变化并要求更加直接的斥责。见《共产党才是活菩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95. 同上。
 96. 采访茱莉娅·法莫拉罗（Julia Famularo），2016年8月。
 97. 采访尼玛拉姆。
 98. 与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藏研究者的电子邮件交流。亦见于《拉嘎星期三运动：西藏精神的庆典》，美国之音，2012年7月13日，<http://www.voaitibetanenglish.com/a/1404065.html>。
 99. Tsedo, “Lahakat,” American Himalayan Foundation (blog), March 9, 2012, <http://www.himalayan-foundation.org/blog/114374>。
 100. 《非暴力：西藏高原上的移动信标》，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10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抗议事件受到中国政府无关宗教的政策或行为引发，例如有关学校的教学语言或是损害当地环境的开发项目等等。由于本报告主旨为宗教，这些抗议因而没有被考虑在内。
 102. 有一起自焚抗议发生在2009年，但是由于在时间上属于独立事件而没有计算在内。
 103. 对罗伯特·巴内特和境外希望保持匿名的藏人学者的采访，2016年7月。
 104. 朱维群，时任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见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2012年度报告》，2012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2-annual-report>。
 105. 《中国发布“有关西藏独立的20项违法行为”》，Oliver Arnoldi,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2015年2月25日，<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436-china-issues-20-illegal-activities-related-to-the-independence-of-tibet>。
 106. 西藏观察，《果洛久美加措访谈》，2014年7月，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an_interview_with_golog_jigme_gyatso.pdf。

V: 法轮功

迫害严重程度:

法轮功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法轮功



略有降低

主要研究结果

- 1 法轮功的存续:** 尽管共产党已经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17年斩草除根式的镇压, 中国仍然有几百万人继续修炼法轮功, 而且很多人是在镇压法轮功开始后才开始修炼。这显共产党镇压机器是失败的。
- 2 持续的大规模迫害:** 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广泛受到监控、任意羁押、判刑、酷刑, 他们还是被法外处死的高危群体。自由之家独立证实了, 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 有933起法轮功学员被判处上至12年徒刑的案例, 原因是行使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案例仅仅是法轮功被判刑的部分案例, 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据信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和法外拘留场所。
- 3 镇压中的裂缝:** 尽管对法轮功的镇压仍然持续, 但在一些地方, 打压似乎有所减缓。习近平没有明确表示其有意扭转对法轮功的政策, 但是和镇压法轮功连在一起的周永康等官员在反腐中遭到清算及判刑, 加上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劝导警察不要镇压他们, 看来起到了一定作用。
- 4 经济剥削:** 中共当局每年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镇压法轮功, 同时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利润丰厚的经济上的掠夺, 包括向他们索取钱财、监狱强迫劳动等形式。有证据显示有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 用于器官移植手术, 这种情况仍然持续进行中。
- 5 应对与抵抗:** 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多种非暴力策略应对镇压。他们尤其注重与警察和公众分享法轮功信息、违反法轮功修炼者人权事件的信息、以及其它反驳国家宣传的内容。近年来,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法轮功修炼者也加入了这些努力, 如人权律师、家庭成员和邻居等。



1998年法轮功修炼者在广州公开打坐，1999年中国共产党取缔了法轮功。这样的集体打坐仍然遭到禁止。

图片来源：明慧网

“对法轮功的镇压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共产党发起的】最糟糕的宗教迫害的例子。”

—研究中国宗教状况的著名学者，渥太华大学教授André Laliberté，2015年。¹

“抓人的命令持续来自高层，但有时公安局的人会挡回去，说这些人只是为了健身而练功。”

—一名中国人权律师，2013年²

严酷镇压一种受欢迎的气功

法轮功是一种信仰实践，主要由五套气功打坐功法以及佛教道教传统教诲组成，尤其强调真、善、忍信条。法轮功修炼者练功、学习法轮功著作、试图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这些价值。他们相信这些价值与宇宙的精神相和谐，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带来更健康的身体以及心理和精神启迪。³ 法轮功虽然包括一些宗教特点，但其组织非常松散，没有专职神职人员、正式成员身份，不接受捐赠，也没有专门的敬拜场所。⁴

在1990年代初和中期，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府支持以及国家媒体的正面报导。李洪志在1992年向中国大众传播法轮功。⁵ 在接下来的两年，他在国家气功协会的组织下，在全国各地讲课，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⁶ 那时期的国家媒体赞扬练法轮功的好处，并报导学员获得“健康公民奖”。李洪志甚至受政府邀请，于1995年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讲课，此一活动在今天令人难以想象。⁷

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共产党，都有人开始修炼法轮功。

李洪志完成了这个正式的讲课系列后，法轮功继续经由口碑和非正式的各地志愿者网络传播。志愿者教功，并在朋友圈以及集体练功场地分发法轮功资料。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从医生、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到共产党员，都有人开始修炼法轮功。尽管法轮功学员也会聚在一起练功，但许多人把法轮功看作一种个人修行，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而不是一项集体事业。不像被多年镇压后的今天，早期的法轮功资料中，既没有显示任何政治谋求，也不批评共产党。根据政府来源以及国际媒体报导，到1999年左右，中国大约有至少七千万法轮功练功者；法轮功代表则声称，法轮功人数那时已达了一亿。⁸

1999年7月，法轮功突然被禁止。比较知名的法轮功信仰者遭到逮捕，任何继续练功的人被当作国家敌人而遭到镇压。那时开始出现了法轮功信仰者被绑架、酷刑、甚至杀害的报导。法轮功的名字、李洪志的名字、以及一系列同音字都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删除，国家媒体或者中国外交人员在谈到法轮功时都无一例外地使用妖魔化的语言。

问题出在哪里？

共产党对法轮功戏剧性地变脸不同寻常，即使放到共产党既有的限制宗教的政策框架内也是如此。多年以来，观察人士对为什么镇压以及镇压是否可以避免而进行猜测。

总的来说，共产党对任何把自己的精神信仰上置于对党的效忠之上的群体都持不容忍态度。即使如此，学者、目击者、和其他了解内情的观察者指出了一系列特有的特点和因素，认为它们是导致这个群体突然遭受特别严重打压的原因。

- **受欢迎：**当1999年练习法轮功的人数超过7千万的时候，它超过了当时共产党6千3百万党员这个数字，⁹ 是佛教以外中国第二大信仰群体。
- **意识形态竞争：**法轮功强调的真、善、忍世界观看来令共产党不满，因为它与唯物主义、政治斗争、以及民族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原则相冲突。¹⁰ 法轮功有效地提供了另外一套道德指南，它的传播被视为对共产党权威的一种根本挑战。¹¹
- **党国‘渗透’：**法轮功在维持党国统治的一些重要国家机器中很受欢迎，如军队、国内安全部队、国家媒体、以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¹² 共产党逐渐开始担心法轮功练功者对法轮功信仰原则的忠诚高于对中共领导人的忠诚。

- **独立公民社会网络：**共产党长期以来寻求将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和其它形式的草根集体活动为己所用，或者打压它们。¹³ 90年代中期，共产党曾经试图对所有气功团体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1996年，政府主办的气功协会（法轮功也隶属于此）要求在修炼者当中建立党支部，还寻求从法轮功教学中谋取利润。李洪志选择与气功协会脱离关系，希望法轮功保持个人练功的形式，不要形成正式会员制，不要涉及收费。¹⁴ 法轮功继续通过松散的练功网络和自愿协调者在中国各地传播。
- **打压升级的时期：**从1996年至1999年期间，党国体制内许多人仍然对法轮功持积极态度，公开声称它的健身效果，乃至对社会稳定的作用。¹⁵ 但是几名最高层领导人开始视法轮功为一个威胁，导致对法轮功开始打压。1996年，国营出版社停止出版法轮功书籍。法轮功试图向不同的政府组织登记，但都遭到拒绝。政府报纸开始不时对法轮功进行抹黑。警察开始监控法轮功学员，有时驱散学员集体练功。¹⁶
- **向最高领导层请愿：**1999年4月，政府对法轮功的骚扰不断加剧，天津几十名学员被殴打和逮捕，那些呼吁释放他们的人被告知命令来自北京。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安静地聚集在与中南海接壤的国家信访局外，请求结束打压，尊重他们练功的权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非常公开的请愿活动令中共领导人十分意外，由此引发了对法轮功的镇压。¹⁷ 然而，那次的大规模请愿是对中央官员（包括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指示下打压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在这次请愿前，党的机器已经开始对法轮功进行打压。¹⁸
- **江泽民的个人角色：**4月25日的抗议后，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法轮功持一种和解的态度。¹⁹ 他与学员代表见面，并指示释放天津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之后，聚集在北京的法轮功抗议者自愿解散。但是时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说法轮功对政权权威是一个严重挑战，“是建政50年来没有先例的”。²⁰ 在当年6月7日的一份内部档案中，江泽民明确发出解体法轮功的指示。²¹ 这个决定非常突然，而且与国内安全情报部门之前的调查结论“法轮功不构成任何威胁”不相符。²² 一些专家称，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感到不安，而他本人当时在公众眼里的声望正在下降。²³

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员对法轮功遭受镇压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寻求把对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有害的“邪教”。但是这样的声称与中共内部的档案内容不符合，在法轮功传播的其它国家，也没有什么有害结果。国际学者反复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没有邪教的特征。²⁴ 即使在中国，“邪教”这个标签直到镇压发生几个月后的1999年10月才出现在党的话语中，而宣传机器则对中文“邪教”这个词的英语翻译进行了操纵。这表明暴力镇压在前，邪教标签在后，中共是在镇压法轮功遭到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批评后才这样做的。研究中国宗教的著名学者David Ownby指出：

“给法轮功贴上所谓邪教的标签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误导，中国当局由此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说辞抹去法轮功的吸引力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之外的活动效力。”²⁵

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治体系下，一旦江泽民做出取缔法轮功这个任意而且很可能违法的决定，并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常委头上，那么就没有什么制度或法律障碍来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江泽民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党内领导小组和一个法外便衣警察队伍来领导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也就是1999年6月10日建立的610办公室。²⁶

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镇压轰轰烈烈展开，共产党镇压机器压向法轮功。媒体上充斥连篇累牍对法轮功进行抹黑的节目，成千上万人被逮捕，数百万人被迫签署停止练功保证书。来自北京的前法轮功良心犯赵明解释说，“党的镇压机器本来就在那里，江泽民按下了按钮。”²⁷

法轮功之前之所以被允许传播，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气功这个灰色地带，而不属于90年代已经开始的对有组织宗教的限制范围。它从共产党意识形态防御体系的隙缝被漏掉了。从这个角度看，组织松散、思想独立的法轮功与无神论专制政权的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如此，换一个最高领导人，共产党的镇压也许不会这样暴力和致命，甚至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现今中国的法轮功群体

考虑到共产党镇压法轮功之残酷，没几个国外或中国国内的观察者认为法轮功会存续下来。的确，许多学者、记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致看法是，法轮功在中国国内已经成功遭到粉碎。²⁸ 由于长期处于镇压环境下，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如今在中国有多少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在法轮功被取缔17年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多达百万人计，²⁹ 很可能高达以千万人计之多。³⁰

综合几点信息，对当今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的合理估计至少大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万之间，一些海外的法轮功来源的估计数目则为两千万到四千万。³¹

作为2010年起一场旨在减少法轮功信仰者人数的全国运动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网站常常把那些还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成员称为“再犯”，即从监狱释放后重新开始修炼的个人。³² 在有些情况下，政府指令向低层官员提供这些人口的人数。比如说，江西省2009年4月的一个工作计划要求官员将还没有放弃的法轮功修炼者人数减少一半，将“再犯”人数控制在当地已经放弃练功的人口百分之十以下。³³ 1999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大约为七千万至一亿，按百分之十算，那么有七百万至一千万人重修，尽管并不是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强迫放弃修炼，其他学员则自愿放弃了。

在法轮功被取缔17年后，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多达百万人计，很可能高达以千万人计之多。

明慧网是一个海外法轮功中文网站，在中国国内有广泛而活跃的联系网络。据明慧网2009年5月的报导，使用者通过大约20万个安全的网路连结点，即“资料点”，从中国国内上传和下载了该网站的材料。官方档案显示，这些登录明慧的“资料点”在中国各地都处于活跃状态。³⁴ 自由之家对负责协调这些网站的法轮功活跃分子进行采访后发现，每个点一般都会向几十个练功者传递印刷材料或CD。³⁵ 这些信息同样也可以得出中国国内大约有七百万到一千万人在练功以及分享法轮功相关信息，特别是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练功的人都会从事这种风险很大的活动。

至于法轮功的发展趋势，自由之家采访过的多位律师指出，在法轮功1999年被禁多年后，他们接触到多起近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例子。³⁶ 2013年中浙江和湖南当地政府网站公布的档也谈到法轮功在本地区的“回潮”和“扩展”。³⁷

考虑到法轮功在1990年代的流行程度，如果没有被禁止的话，法轮功很可能早就超过了七千万人。法轮功修炼者指出，它受欢迎的主要因素是它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且在不需要过寺院生活的情况下提供精神的提升，这是它与其他气功门派或宗教相比的好处。³⁸ 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详尽报告的，尽管对法轮功的镇压在全国范围内仍在继续，但在一些地方，打压显然已有所缓和。如果未来几年人们感到修炼法轮功受惩罚的危险在降低，许多人有可能会重新恢复修炼，或者首度开始修炼。

习近平治下的法轮功

在1999年的镇压后，当政府看到法轮功修炼者没有因为政府命令而停止修炼，2001年共产党开始强化打压。从一月份开始，新一轮的妖魔化宣传充斥媒体，³⁹ 到当年年中，《华盛顿邮报》的一份调查报导发现，中央当局允许系统的使用暴力强迫人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⁴⁰ 当

胡锦涛2003年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江泽民仍然领导军队并保留了极大的权力。与此同时，许多江泽民的人马，包括罗干以及后来的周永康，都被安置在重要高层位置，使得他们能够在江泽民2004年完全退休后继续其镇压法轮功的政策。

因此，在胡锦涛时期，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送往劳改营和监狱，遭到极恐怖的酷刑。⁴¹ 许多人仅仅因为家里私自拥有法轮功书籍而被抓捕和惩罚。⁴² 中央当局定期发起新一轮的抓捕，包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以及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⁴³ 从2006年开始，有关法轮功良心犯被杀害、为移植手术提供器官的指控开始出现。⁴⁴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起担任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党国当局与法轮功的关系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迹象：一方面是持续大范围迫害，另一方面是，迫害在一些地区出现缓和。

迫害继续，时有升级

习近平没有对党的法轮功政策及其根除法轮功的目标作出任何正式改变。中国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继续遭到抓捕、监禁、酷刑，有时被杀害，这种基于信仰的迫害仍在大范围进行中。

2013年，中央610办公室发起了一场为期两年的“教改最后一役”的全国运动。⁴⁵ 全国各地的政府网站上发布了通知，包括当地法轮功修炼者每年必须进“学习班”学习的比例。⁴⁶ 尽管劳教制度已经在2013年得到废除，还是有大量当局有备案的修炼法轮功的人处于被抓的高危状态，不管是通过正常的法院系统，还是通过法外黑监狱，在那里他们被强迫放弃法轮功。⁴⁷

自由之家对中国法院档案的分析表明，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至少有597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一审中被判徒刑，刑期最高达12年。⁴⁸ 此外，对话基金会说他们记录了2013年336名法轮功良心犯被审判的文件，⁴⁹ 这使得习近平上台以来囚禁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达到至少933名。这些案例发生在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中的29个。

然而这个数字并不全面。根据对话基金会数据，中国政府的信息来源显示，2013年被审判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可以合理估计为“对话”所能记录到的三倍。⁵⁰ 诸如明慧网这样的法轮功来源所记录的数据显示，在同一时段，有2,500名以上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判刑，从2013年以来至少有22,000人被逮捕，尽管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后来获得释放。⁵¹ 还有成千上万法轮功修炼者据信被关在法外的“法治教育中心”、“黑监狱”，以及审判前关押人的看守所，不少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被判刑的法轮功修炼者至今仍在狱中。⁵²

只要被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受到不同形式的心理和身体酷刑，这样做的目的是摧毁他们的意志。最常见的方法是强迫法轮功修炼者观看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录像、剥夺睡眠、殴打、长时间被拉四肢、电棒电击、包括对乳房和生殖器进行电击。⁵³ 这样的酷刑会导致长期残疾、有时死亡。在黑龙江省一起广为报导的案例中，45岁的高一喜和他的妻子2016年4月从家里被抓到看守所后仅仅10天，高一喜便死于警察手下。他们被怀疑修炼法轮功，并分发法轮功材料。⁵⁴ 明慧网还记录了从2013年1月到2016年11月有292例法轮功修炼者死于羁押中或其它形式的迫害的案例。⁵⁵

在对610办公室网站进行了详尽搜索后，我们找到的证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除西藏外，法外安全人员在中国所有省份、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直辖市都十分活跃。这些人员的主要工作看来是监督当地那些已知修炼法轮功的人，在政治敏感日的时候留意他们的活动，如5月13日（法轮功建立纪念日）、4月25日（1999年中南海请愿日）、7月20日（法轮功迫害发起日），

始于2012年11月，至少有900人被囚禁，因为练习法轮功或者散布法轮功的信息。

防止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些日子私下聚会，或公开展示横幅、散发材料。的确，被访谈者多次指出，大规模的逮捕常常发生在这些日期前后。⁵⁶

两种情况可能会间接加重法轮功修炼者的恶劣处境：

1. **《刑法》第300条下更残酷的惩罚：**2015年11月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将第300条下的刑期提高到15年至无期徒刑。⁵⁷ 这条针对“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的条款于1999年10月写进刑法，试图回溯性地将取缔法轮功合法化。⁵⁸ 中国法官利用这个条款作为把法轮功修炼者、少数人权律师、以及其它一些被禁宗教信仰者判处徒刑的依据。截至2016年11月，自由之家没有发现法轮功修炼者在此修正条款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例。
2. **打压为法轮功修炼者辩护的人权律师：**2015年7月，中国安全部门对人权律师群体以及更广的“维权”运动发起了打压，拘留或审问了300多名律师和他们的助手。其中大多数之后获得了释放，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被囚禁至今，并面临严重的政治性的“颠覆”罪指控。这些被拘禁的律师中，有些在他们本人被抓前不久曾帮助被逮捕的法轮功修炼者，如王宇、王全璋、和李和平律师。因为如此，给法轮功修炼者找代理律师变得比较困难，但还是有数以百计的律师愿意代理敏感案件。⁵⁹ 这与2000年代初期几年形成强烈对比，那时要找到一个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此类无罪辩护的律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被怀疑修炼法轮功，45岁的高一喜和他的妻子2016年4月从家里被抓到看守所后仅仅10天，高一喜便死于警察手下。

打压机器的裂缝

考虑到共产党对法轮功的一贯记录，人们也许认为迫害会不变或不停升级。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学者Stephen Noakes 和研究者Caylan Ford认为，中共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卡在一个两难处境。⁶⁰ 在投入亿万美元的资源进行打压后，如果共产党突然宣布扭转对法轮功的政策，那么它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损害，而且会面临放松对其它宗教进行管控的压力。同时，共产党仍然非常恐惧任何大规模、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这也是取缔法轮功的一个潜在因素之一。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有证据显示，对法轮功的打压出现了裂缝，使得一些地方官员回避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迫害。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情形，而且看来并非孤立事件，包括在拘留仅仅几天后释放一些法轮功长期修炼者，⁶¹ 警察允许法轮功成员在拘留期间炼功，⁶² 或者警察主动保护他们。⁶³

这个趋势也许已经开始影响司法判决，鉴于对法轮功的镇压最能体现中国司法体系的“人治”特点，这一变化尤其值得关注。2015年6月，陕西省一名法官向一名名叫庞友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出已知第一例“免除惩罚”的判决。庞友立即被无罪释放，而之前有大量对他的声援活动。⁶⁴ 自从中国2013年取消了劳教这种变相监禁制度后，更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判进入普通的监狱，⁶⁵ 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示，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要大大少于劳教制度存在时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

带来这些变化的看来有几个互相交迭的因素：

- **与镇压法轮功相关的主要官员遭到清算：**在习近平的反腐中，几名在推动和实施镇压法轮功中起了关键作用的高层“老虎”遭到清算，并被判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前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2015年6月11日，官方媒体宣布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天，上述案例中的陕西法轮功修炼者被判无罪。与司法和执法

部门交流的法轮功人士利用这一类案例，劝导底层官员与打压法轮功保持距离。⁶⁶

- **打压机构官僚体制的弱化：**周永康和李东生遭清算，加之劳教被废除，看来削弱了那些专事打压法轮功的官僚机构。自从李东生2013年被捕以来，610办公室三年换了三个领导人，最近对黄明的任命在2016年5月。如此快速的人事变动，以及负责人的阶段性空缺，与李东生连任四年形成鲜明对照。⁶⁷ 另一方面，自从2013年至2015年间“改造”运动的结束，自由之家发现，没有任何由中央来集中推动打压法轮功的证据。相比之下，2010年至2012年的任务刚刚结束，下一波的动员2013年就紧随其后。

另一个显示打压法轮功热度下降的迹象是，中共内部非常有影响的纪委2016年7月发起了前所未有的、为时两个月的对中央610办公室的巡查。⁶⁸ 虽然610办公室的地方下属分支继续在全国各地发挥职能，但是由于领导层的不确定以及弱化，当地警察就有了消极怠工的空间，因为他们自己反感迫害法轮功，或者担忧对自己将来会因打压而遭到惩罚。

- **与司法执法机构直接沟通的长远效果：**十多年以来，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律师以及家人一直通过电话或者亲自与警察、法官等进行直接沟通的方式，敦促他们不要逮捕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或者让他们知道对法轮功的打压是非法的，被告是无辜的。这些努力看来已逐渐收到成效。一位曾经打过几千个这种电话的受访者说，“在中国各地，警察越来越明白真实情况；在很多案例中警察暗暗帮助法轮功。”⁶⁹ 一位代表过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也有类似观察。“由于法轮功修炼者与当地官员交谈，有些人改变了态度，意识到法轮功成员并无任何威胁，因此他们不会逮捕他们。”⁷⁰

2015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的规定，放宽立案程序。中国境内和海外的法轮功信仰者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努力：就他们所遭受的酷刑和折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并直接点名江泽民为这些罪行的责任人（见下）。⁷¹ 许多因素驱使酷刑受害者提起这样的诉讼，但被访者反复提到的一个动机是希望让司法系统最高层的人知道江泽民的罪行，希望高层能做出“正确选择”，“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或者至少他们本人回避参与迫害。⁷²

政治控制的主要方法

从1999年7月起，中共使出全部手段对法轮功发起了镇压。在镇压早期，党的镇压方法十分公开，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官方媒体抹黑铺天盖地，公开焚书，在运动场内拘押大批人被捕，电视播放作秀审判，在天安门广场殴打抗议者等。⁷³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当局看到法轮功不会轻易被铲除、公开镇压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后，镇压手段变得更加隐蔽。

这十七年镇压期间，中共使用了拘留、判监、酷刑和言论屏蔽等手段对付法轮功。不过过去五年的一些趋势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官员优先事项和方法的变化：

1. **实人监控外加电子监控：**官方有备案的法轮功修炼者长期以来遭到警察部门和街道委员会的监视，跟踪他们，对他们进行定期家访，查看他们是否还在练功。从迫害早期起，当局便对法轮功成员的电话以及因特网使用进行监控，但是中共政府的监控能力过去十年来有了巨大扩展。今天，中国安全部门还根据公共场所安装的监视录像镜头以及地理定位数据，来追踪法轮功修炼者，并在他们分发资料的时候抓他们。法院档案以及法轮功难民所提供的口述显示，当局收集种类不同、细节详细的证据对法轮功成员进行定罪，包括公交车上的录像、网络浏览历史以及手机记录。⁷⁴

被判刑的法轮功活动人士都是因为包括录音留言、在诸如微信或QQ这样的社交媒体发帖、使用翻墙工具下载被屏蔽的网站的内容。

2. 继续将“转化”作为一个主要目标：2008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转化”定义为“一个对意识形态重新设置的过程，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各种身体和心理上的胁迫，直到他们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为止。”⁷⁵ “转化”从一开始就是镇压法轮功的一个中心目标，通过强迫学员书面保证放弃法轮功而“根除”之。当局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包括酷刑、惩罚家庭成员或狱友、使用药物削弱他们的意志。⁷⁶

政府网站提到“转化指标”以及需要监控那些已经被释放的人，确保他们不再重新修炼。⁷⁷ 尽管放弃信仰常常是提前释放、或释放的前提条件，但是屈服于压力并不一定表示对被拘押者的迫害到此为止。许多“转化”了的修炼者被转到监狱的另一个区域，从事强迫劳动，有些则要求他们向其他法轮功修炼者施压放弃信仰，以证明他们已经诚心诚意地转化了。被关押时在压力下被迫转化的修炼者表示被迫背叛信仰给他们带来的长期心理影响。

3. 反击法轮功资料的影响：言论审查和抹黑宣传从一开始就是镇压法轮功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共产党需要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气功组织为什么突然成了威胁。对中国互联网言论审查的研究一再得出结论说，与法轮功相关的关键词受到最严重的审查。⁷⁸ 作为应对，法轮功修炼者自己在网上和网下发起大规模、多方面、复杂的公共教育活动。⁷⁹

努力在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中占上风成为中国警察打击法轮功的核心日常工作。自由之家对可查到的2016年的59法院判决书进行分析后发现，所有被判刑的法轮功活动人士都是因为行使自由表达权利或获取信息的权利而遭到惩罚。他们被指控的所谓“罪行”包括录音留言、在诸如微信或QQ这样的社交媒体发帖、⁸⁰ 使用翻墙工具下载明慧网的内容，⁸¹ 或仅仅是拥有显然是要被分发的大量传单或光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610办公室网站不停地提到要在本地区清除法轮功资料，⁸² 鼓励居民上缴手写法轮功讯息的纸币，⁸³ 禁止居民安装卫星天线，以防止他们观看被禁的境外电视台或异见人士运营的台。⁸⁴ 宣传方面，陕西省当局的一个创新是，在2016年4月委托人制作了一部显然是反法轮功的“微电影”，一种在手机时代越来越流行的网络短片。⁸⁵

法轮功修炼者的人不管去哪里，不管做什么，仅仅因为自我确认是法轮功修炼者便有被拘禁的危险。

4. 孤立法轮功，使他们得不到社会支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措施支持法轮功，包括在法庭为法轮功辩护的人权律师，以及联署要求释放一名法轮功邻居的普通公民。⁸⁶ 针对这些，中共当局通过一系列做法，离间法轮功信仰者和他们现有或潜在的支持者。代理法轮功案例或批评迫害行为的律师被殴打、取消律师资格、骚扰以及监禁。只要发现他们当中有法轮功修炼者，房东、同事、狱友也遭到连坐。⁸⁷ 反法轮功宣传项目鼓励大众参与，签署“保证卡”或参加学校征文比赛。⁸⁸

所有这些压制活动渗透到了生活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学校到工作场所，从超市到公共交通，从申请护照到登记户口，从计算机到手机。已知是法轮功修炼者的人不管去哪里，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当涉及到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仅仅因为自我确认是法轮功修炼者便有被拘禁的危险。

许多这些措施及其实施方式是不合法的，违背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协约的承诺、中国自己的法律、甚至违背共产党自己的明文规定，如其声称“任何强迫信教的人放弃信教的行为，都是侵犯别人的信仰自由。”⁸⁹

循着钱的踪迹：花费、剥削、和器官活摘

打压法轮功是一件花费巨大的工程，要求相当大的物力和人力资源。要计算中国每年总共花多少钱打压法轮功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网上有一些官方数据可资参考，包括2014年和2015年对9个省份不同县区内13个地方上610办公室的花费计算。这13个办公室所覆盖的人口大约为1400万，总开支为890万人民币（约137万美元）。如果将这一人均投资应用到中国的13.7亿人口，那么全国所有610办公室的年度预算是8亿7900万人民币（约1亿3500万美元）。⁹⁰而这仅仅是涉及打压法轮功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不过在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中，钱的作用并不止于单纯的开支。多种形式的经济诱因和剥削使得党国体制内的个人从继续打击法轮功中获得经济利益。这包括：

- 地方警察讹诈、收取贿赂、或偷窃财产⁹¹
- 官方对安全人员的奖金或财政奖励，对举报法轮功活动的居民的奖励，法庭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罚款⁹²
- 法轮功修炼者被系统化地强制劳动，而这一现象在劳教制度废除后仍在监狱和传统的看守所继续存在⁹³

全国范围内的610办公室的年度预算为890万人民币（约137万美元）。

正是在这样一个非人化宣传、囚禁期间酷刑、以及经济利益的背景下，对法轮功群体终极形式的经济剥削被报导出来：杀害法轮功修炼者，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高价出售给中国病人以及外国“器官移植游客”，成为数以亿计的器官移植工业。这些指控首先出现于2006年，数个由外国记者和法律专业人员进行调查发现这样的指控是可信的；⁹⁴医疗界一些人士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忧虑。⁹⁵

中国供移植手术用的器官的来源毫无疑问存在严重问题。⁹⁶对这些来源进行详尽的调查为本报告能力所不逮。然而，自由之家阅读了其他调查者所汇集的现有证据（包括与中国医生的通话）；访谈了曾被关押的法轮功良心犯，后者提供了监禁期间抽血化验的详情；与一名台湾医生谈话，他的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并与一名军医院雇员的朋友会面，这名军医院雇员对直到2011年从法轮功修炼者摘取器官有第一手了解。⁹⁷通过上述阅读和访谈，我们发现可信的证据表明，从2000年代初开始，大量法轮功囚犯被杀害，以便摘取他们的器官。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暴行仍在继续。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规模十分巨大，而且还在扩大，但是死刑犯人数过去十年却逐渐减少。⁹⁸在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有问题的做法后，中国政府发起了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能力仍然十分微小。此外，2014年，一名高层卫生官员宣布，来自囚犯的器官将与这个自愿系统的数据库汇合，尽管身为囚犯的人是不可能提供“自愿”捐献自由意向的。⁹⁹

2016年6月一个根据公开资料对中国医院器官移植数目的详细研究显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要比官员经常声称的一年一万例多好几倍。¹⁰⁰这表示已知的供应量和实际移植数量之间的差距要比之前估计得大得多，提示法轮功修炼者、其他良心犯、和刑事犯面临的危险实际上更大。

社群反应和抵抗

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信仰者在应对共产党迫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在法轮功被禁最初期，许多人到当地政府部门请愿。当他们看到低层地方官员毫无反应，就开始给更高层政府写信，或直接到北京请愿。他们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经历，试图说服官员法轮功对社会不构成任何威胁。到了2000年，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广场拉横幅、练功，但大多数人马上遭到逮捕。

2001年，当修炼者看到至上而下中止法轮功的镇压是不可能的，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公众以及地方警察，主动向他们讲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敦促他们不要参与迫害。修炼者大量制作和分发传单与自制影碟，一名学者将这种倡导活动称为“中国的私密出版物（Samizdat）”¹⁰¹ 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设计了翻墙软件，制作了供在中国境内散发的录像，成立了报纸、电台、和卫星电视，向中国境内的观众和听众传播关于法轮功以及其它人权问题的未经审查的新闻。

明慧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海外法轮功修炼者和中国境内修炼者之间的通讯管道，汇总受迫害经历，并提供各种资料。这个网站有一个相当于工具箱的板块，里面有最新的翻墙工具、可供下载的录像、如何挂横幅的说明和如何录制自动化电话的说明。¹⁰²

这些内容不断有调整，因为修炼者会判断哪些东西更能被中国境内用户接受，也因为许多人对共产党平反法轮功的意愿或能力失去信心。一些类型的内容是稳定不变的：如个人练功得益的叙述；全国范围内以及地方上发生的权利侵害事件；法轮功在世界的传播；以及对共产党不实宣传的反驳等。¹⁰³

中国境内的法轮功信仰者在应对共产党迫害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坚韧、非暴力和创造性。

过去十年，更多种类的信息进入中国境内流通，包括中国古典舞蹈光盘、以及《九评共产党》。《九评》是2004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对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批判，并为中国如何从几十年暴力的政治运动（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中修复提供了一个道德先见。这些内容显示，法轮功活动分子不仅局限于为法轮功正名，终结迫害，而是寻求复兴传统文化，为未来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做准备。

法轮功修炼者2012年以来的草根抵抗以及倡导活动可以分为以下五大类：

- 1. 营救被捕的法轮功修炼者：**当一名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押时，特别是当此人在社群内比较知名时，中国境内外的修炼者形成了以多种形式向当地官员施加压力促使该修炼者获得释放的策略。比如说，境外的几组志愿者会用从中国境内获得的电话号码（有时同情法轮功的警察给他们提供这些号码），给当地警察、610办公室官员、检察官、法官等打电话。一个志愿者小组的协调人说，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可能会打多达3000个电话，试图营救350名法轮功修炼者。¹⁰⁴ 在中国境内，修炼者给地方当局写信，雇人权律师为被抓的修炼者辩护，越来越多地在非法轮功信仰者当中传播请愿，要求释放某个修炼者。¹⁰⁵

尽管很难确定这些努力的实际效果，但的确有被抓的成员被释放的案例，如前面所指出的陕西的庞友。庞友的律师说，当他和一名警察见面、要求会见当事人的时候，有人递给这名警察一迭信，而且电话在不停地响；警察说这些电话来自庞的朋友。¹⁰⁶ 在庞友的原籍北京，至少有一千位居民联名请愿，要求释放他。¹⁰⁷

- 2. 根据新技术和言论审查情况而对公共教育进行调整：**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公共教育努力来说，中国手机数量的增加和因特网的普及既构成了挑战，也创造了机会。某些类型的媒介，诸如录像光盘，变成不再那么流行，效果也因而下降。一些活动人士转向QQ或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在上面分享录像和其它内容的链接，只要注意不用自动化过滤的关键词。¹⁰⁸ 然而，日益钳紧的言论审查和监控、对实名制更严格的实施都成了新的障碍，需要人们不停地创新。比如说，与其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更安全和更高效的办法是获得大量登记过的电话卡和手机，用它们同时打自动录音电话。当一位北京的法轮功修炼者被当局用定位技术跟踪后，当地的活动人士开始敦促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不停移动。¹⁰⁹

- 3. 利用法律管道，对迫害提出挑战：**中国的法律体系包含制度化的政治控制，更多地是一个

压迫工具，而不是一个保证公正的机制。然而，一来出于原则，二来寄望于给体制内的人一个起积极作用的机会，法轮功修炼者经常从事法律倡导活动。鉴于很多人权律师愿意为法轮功案件辩护，越来越多的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雇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或者对判罪提出上诉。自由之家对法院档案进行分析后发现，在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间，二审法庭做出了至少275个法轮功案件判决，表明一定比例的被关押法轮功修炼者决定上诉，尽管二审推翻一审判决的机会极其渺茫，近乎不存在。

- 4. 对江泽民提起诉讼，追究责任：**从2015年5月起，大量法轮功酷刑幸存者采取攻势，利用法规中的一个变化，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指认他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2015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要求司法部门接受公民个人所提出的刑事控告；在此之前，司法当局有空间拒绝这样的控告。明慧网的一系列文章指出了这一政策的改变，并建议修炼者利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呈交他们被迫害的经历，要求调查江泽民。不少江泽民的关键人马在反腐中被拉下马。

中国境内外的被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开始起草法律控告书，并将之寄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个人寄或者联合寄都有。一名发出控告书的受访者说，他可以查到邮件确实已经寄达并被签收，但他没有收到任何进一步的信息。¹¹⁰ 明慧网报告说，到2016年7月为止，有20万以上修炼者寄出了控告材料，材料也常常投到网站上发表。尽管无法确认这个数字，自由之家研究人员获得了几份控告书的副本，并与寄了控告书的北京、上海、黑龙江、以及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交谈。这些修炼者表示知道其他几十人也这样做了。许多人指出，虽然有些原告被抓了起来，但是绝大多数寄控告书的人没有遭到报复，或者在被抓后很快获得释放。

- 5. 鼓励其他公民退党：**从2004年底至今，法轮功修炼者传播的一份核心文献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九评共产党》，包括文字、录像和录音版本。Noakes和Ford解释说，这本书的出版者还“鼓励公民发表‘退党’声明，象征性地断绝他们与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的关系，以便净化良心。”¹¹¹ 自由之家与法轮功活动人士的访谈以及中国官方档案中多有提到《九评》，都表明“退党”已经成为法轮功在中国境内进行社区活动的一个焦点。¹¹²

2011年对退党活动的一项研究发现参与“退党”的人其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退党”是基于一个信念，即共产党已经末日来临，为了确保中国和平过渡到一个不那么专制的政府，中国民众必须经历一个道德觉醒过程，并且坚持非暴力。¹¹³ 到2016年11月为止，追踪退党运动的网站声称中国境内和境外有超过2.5亿人宣布退党、团、队的声明。尽管这个数字无法被核实，但是从2016年初起，中国法院档案确认了多例法轮功修炼者因为拥有呼吁退党的材料而被捕并判刑的案例，这表明共产党本身很重视退党运动。¹¹⁴

尽管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但是法轮功在社区中的努力以及倡导活动看来至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仅仅从法院档案中也可以看出法轮功信息分享的规模，经常一名修炼者被指控拥有几百份传单、光盘、或电话卡。在受到众多声援后，一些修炼者获得了释放，有些接到生源电话的警察据说改变了态度，对法轮功修炼者较有人性。¹¹⁵

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批非法轮功修炼者加入了法轮功的行动中。尽管中国政府2015年对人权律师发起了大规模打压，但是很多人权律师继续代表法轮功当事人。¹¹⁶ 中国境内有成千上万人联署要求释放法轮功修炼者，不仅限于要求释放他们被抓的邻居，而且支持对江泽民的起诉。¹¹⁷ 先前提到的2011年对退党声明的研究以及自由之家的访谈记录都表明，大多数退党的人并不是法轮功修炼者。与此同时，这些年来，有些知名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也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包括高智晟、胡佳、魏京生、和杨建利。

未来展望

法轮功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共产党宣传，恐惧甚至仇恨法轮功修炼者。每一天，仍然有很多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参与逮捕、监禁、和刑求那些不放弃法轮功的中国公民。然而在1999年7月，中国国内很少有人认为，17年后的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仍在修炼法轮功，邻居们会联署支持法轮功的请愿，江泽民会成为一连串刑事控告的对象。

法轮功在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幸存下来这一简单事实，既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证明共产党的镇压机器是一场失败。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现实，以及导致法轮功被取缔的因素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说，江泽民和共产党制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将数以千万计政治上本来忠诚的公民以及党员变成了一个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群体，而这正是他们当初所担心的。

法轮功在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幸存下来这一简单事实，既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也证明共产党的镇压机器是一场失败。

习近平成为党总书记以来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使得我们很难预测共产党未来会怎样对待法轮功，但是与以前不松手的打压相比，这一不确定性代表着一个变化。考虑到几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周永康这样有权的人会进监狱，那么江泽民遭到打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是因为腐败，而不是因为他在反法轮功中起的关键作用。

这样一个举动有可能为自上而下为法轮功平反而铺平道路，但是除非发生这样的变化，当地官员所面临的选择将继续是重要的，有时会有生与死的不同。¹¹⁸

注解

1. André Laliberté, “共产党对宗教的政治化：一个有选择性的回顾”，《亚洲研究》69, 第一期 (2015): 185-211 页。 <https://www.degruyter.com/abstract/j/asia.2015.69.issue-1/asia-2015-0010/asia-2015-0010.xml>.
2. 与人权律师A的访谈，2013年11月。
3. David Ownby, 《法轮功和中国未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Benjamin Penny, 《法轮功宗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之前是通过师徒之间以略微不同的方式私下传授的，是亚洲地区精神传承中常见的。
6. Ownby, 《法轮功和中国未来》。
7. Penny, 《法轮功宗教》。
8. Seth Faison, “在北京：沉默抗议者的怒吼”，《纽约时报》：1999年4月27日；Joseph Kahn, “法轮功运动领导人成为知名人物”，《纽约时报》：1999年4月27日；Renee Schoff, “扩大中的组织令中国左右为难”，美联社，1999年4月26日。
9. “中国共产党”，今日中国网站，2016年11月17日看到的资料，<http://www.chinatoday.com/org/cpc/>。
10. Vivienne Shue, “中国发生合法性危机？”，收录于《21世纪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危机、争议与正当性》，Peter Hays Gries 和 Stanley Rosen 编辑，(纽约：罗德里奇-科尔松出版社，2004年)。
11. 在法轮功被取缔后，新华社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做出了这一暗示：“事实上，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伦理与文化进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2. 胡志明, “从军官到难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书面声明, “法轮功：回顾与最新情况,” 2012年12月18日。 <http://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hearings/2012/CECC%20Hearing%20Testimony%20-%20Hu%20zhiming%20-%202012.18.12.pdf>; E. J. Dionne Jr., “对法轮功的迫害”，《华盛顿邮报》，1999年11月16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1999-11/16/019r-111699-idx.html>。
13. Gary King, Jennifer Pan 和 Molly Roberts, “中国的审查方法如何允许对政府的批评但是对集体表达进行消声”，《美国政治学评论》，2012年7月，<http://gking.harvard.edu/publications/how-censorship-china-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
14. Noah Porter, “法轮功在美国：一个民族志研究”，南佛罗里达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人类学系硕士论文，2003年7月18日，<http://etd.fcla.edu/SF/SFE0000113/FalunGongInTheUS-NoahPorter-Thesis.pdf>。
15. “大众鸦片？”《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杂志，1999年2月22日。
16. David Palmer, 《中国气功热：身体、科学、乌托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
17. 人权观察, “危险的打坐：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2002年1月，<http://www.hrw.org/legacy/reports/2002/china/>。
18. James Tong, 《紫禁城的复仇》(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根据4月25日上诉中的描述，记者Ethan Gutmann 的说法更进一步。他说中南海示威是政府故意安排的一个陷阱，为镇压制造借口。Ethan Gutmann, “府右街发生的事”，《国家评论》，2009年7月13日。

19. 宗海仁,《朱镕基在1999》(纽约州卡尔普雷斯:明镜出版社,2001年)。
20. 据说江泽民在1999年4月的一个高层会议上这样表示。摘自发表于2001年9月18日香港《信报》的《朱镕基在1999年》节录。
21. 《北京之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1999年6月7日,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1/60/2003727210907.htm>。
22. 与王友群的采访。王友群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秘书。2016年6月。
23. 林和立,“中国会为镇压法轮功付出高昂代价”,CNN,2001年2月9日。
24. Ownby,《法轮功和中国未来》; Penny,《法轮功宗教》。
25. Ownby,《法轮功和中国未来》。
26. Sarah Cook and Leeshai Lemish,“610办公室:管控中国的精神”,《中国简报》,詹姆斯敦基金会,2011年9月16日, 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38411&cHash=2dff246d80ffd-78112de97e280ce9725。
27. Leeshai Lemish,“法轮功为什么被取缔?”《新政治家》杂志,2008年8月19日, <http://www.newstatesman.com/blogs/the-faith-column/2008/08/falun-gong-party-chinese>。
28. 例如,见 James Tong,《紫禁城的复仇: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1999-2005》(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Bruce Gilley,“中国政治的模式:踢走社会”,《当代中国杂志》20,第70期(2011年):517-533页。
29. 能够支持数百万计这个估计的一个指标是明慧网所记录的“郑重声明”。这些是法轮功修炼者递交给明慧网的,他们希望声明:他们在压力下被迫放弃法轮功是无效的。到2016年7月26日为止,一共有564,683人发表了“郑重声明”,在此之前的两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39-148人发表“郑重声明”。因为并不是所有修炼者都曾经被逮捕、或者被迫放弃法轮功、或能够翻墙上明慧网,这个数字只代表了整个群体的一部分。尽管不可能确认所有这些声明的真实性,自由之家所采访的几个人都曾经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这表明很多这样的声明来自中国境内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见“44人声明开始重新修炼”,明慧网,2016年7月26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6/7/26/44%E4%BA%BA%E5%A3%B0%E6%98%8E%E4%BB%8E%E6%96%B0%E5%BC%80%E5%A7%8B%E4%BF%AE%E7%82%BC-331908.html>。
30. 例如,韩志光律师2009年告诉英国《电讯报》说,数以百万计的人修炼法轮功,而且修炼者还在增加中。Malcolm Moore,“尽管已被取缔10年,法轮功继续在中国‘壮大’”,《电讯报》,2009年4月24日,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5213629/Falun-Gong-growing-in-China-despite-10-year-ban.html>。
31.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法轮功:信念和信众分布”,2010年4月26日, <http://www.faluninfo.net/article/1041/Falun-Gong-Beliefs-and-Demographics/>。
32. “继续镇压法轮功”,《中国季刊》223(2015年):658-679页。
33.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党发起三年运动,要求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改造’”,2011年3月22日, <http://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ommunist-party-calls-for-increased-efforts-to-transform-falun-gong>。
34. 自由之家获得的涉及法轮功修炼者的法院判决书显示有这么多。样本中2016年所有被判决的59个人都因为分发关于法轮功的信息而遭到惩罚。其中23份判决书明确提到明慧网是这些材料的来源。
35. 与一名来自上海、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36. 与人权律师C和D的访谈,2013年11月。
37. Stephen Noakes 和 Caylan Ford,“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38. Ryan John Taylor Adams,“改变者:台湾法轮功中的中国自修传统”,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2012年。
39. 这场宣传攻势的核心是五名被指称是法轮功学员的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然而,《华盛顿邮报》、海外中文媒体、以及其他分析人士的调查发现,这些自焚者并非法轮功修炼者,而这一幕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幕,目的在于妖魔化法轮功。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喋喋不休的报导使得更多中国公民视法轮功为一个危险的组织,应该受到镇压。Philip P. Pan,“人火点燃中国之谜”,《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4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1/02/04/human-fire-ignites-chinese-mystery/e27303e3-6117-4ec3-b6cf-58f03cdb4773/?utm_term=.7bdd871eb486; 新唐人电视,《伪火:中国国家电视的欺骗手段达到悲剧性的新标准》,Falsefire.com,2016年11月30日查看, <http://www.falsefire.com/>。
40. John Pomfret 和 Philip P. Pan,“酷刑重挫法轮功”,《华盛顿邮报》,2001年8月5日,可在下面连结阅读<http://www.faluninfo.net/article/566/-i-Washington-Post-i-Torture-Is-Breaking-Falun-Gong/>。
41. 一些专家,如记者Ethan Gutmann,估计2000年代中期或末期在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数在45万至100万之间。他是根据大量访谈做出的评估,法轮功修炼者占劳改营、监狱以及各种拘押实施监禁犯人的15-20%。Ethan Gutmann,《屠杀:大规模杀人,摘取器官,以及中国消除异见的秘密方法》(安姆赫斯特:普罗米修斯出版社,2014年)。也见国际特赦组织,《“换汤不换药”-中国废除劳教》(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http://www.amnesty.org/es/library/asset/ASA17/042/2013/en/f7e7aec3-e4ed-4d8d-b99b-f6ff6ec860d6/asa170422013en.pdf>; 中国人权捍卫者,《劳改恶行仍在继续,没有改善》,2009年2月4日, http://docs.law.gwu.edu/facweb/dclarke/public/CHRD_RTL_Report.pdf。
42. 见北京卜东伟的案例:“中国:恐惧酷刑或非人待遇/良心犯:卜东伟(又名David Bu), (M),”国际特赦组织,2006年8月29日,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049/2006/en/>。
43. 与一名来自上海、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44. David Kilgour 和 David Matas,“血淋淋的摘取: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被摘取器官的指控的报告,修订版”,2007年1月31日,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45. Noakes 和 Ford,“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对法轮功的镇压为什么仍在继续”; Matthew Robertson,“记录中国的一个‘改造’运动”,《大纪元》,2013年11月16日,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361576-documenting-a-campaign-of-transformation-ordered-in-china/>。

46. Matthew Robertson, “北京发起对数以百万人进行洗脑的‘最后一战’”, 2013年11月15日,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360610-final-battle-to-brainwash-millions-launched-in-china/>.
47. Sarah Cook, 《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自由之家, 2015年1月),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china/politburo-predicament>.
48. 这些档案是2016年6月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收集和下载的。我们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和分析。从2014年1月1日起, 中国法院必须按规定在网上公布判决书, 可阅读的判决书数量大增, 甚至包括法轮功这种敏感案件的判决书。然而, 网上数据库并不完整, 有些案件的判决书不时被除去。见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6年11月29日查阅, <http://wenshu.court.gov.cn>.
49. 这个数据是根据“对话基金会”的报告得出来的。“对话”政治犯数据库中2013年在300条下被判刑的517人中, 65%是法轮功修炼者, 也就是说336人。见对话基金会, “新疆2013年国家安起诉、邪教审判数量增加”, 2015年1月7日, <http://www.duihuahrjournal.org/2015/01/state-security-indictments-cult-trials.html>.
50. 同上。
51. 这个总数统计由自由之家研究人员计算, 依据是明慧网每年提供的各种统计。比如说, “2014年迫害统计: 983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判刑, 635名被判刑”, 明慧网, 2015年1月15日,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5/1/15/147980.html>.
52. 比如说, 150多名北京奥运会前被逮捕并判刑的法轮功修炼者,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据报导还在监狱服刑。“值得注意的是和可引用的: 中国的奥林匹克囚徒”, 《华尔街日报》, 2016年8月9日, 见明慧网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5/1/15/147980.html>.
53. 与陈振平的访谈, 2008年至2015年中国囚禁的法轮功修炼者; 国际特赦组织, 《中国: 茫无尽头 – 中国的酷刑与刑讯逼供》, 2015年11月12日,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2730/2015/en/>.
54. 与试图帮助高家的中国人权律师的访谈, 2016年7月; Matthew Robertson, “法轮功修炼者狱中死亡真相被掩盖后, 突然逃离中国北部”, 《大纪元》, 2016年7月6日,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2107981-a-sudden-escape-from-chinas-north-after-cover-up-of-falun-gong-death-in-custody/>.
55. “统计与图表”, 明慧网, 2016年11月17日查看, <http://library.minghui.org/category/32,95,,1.htm>.
56. 与一名来自上海、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57. 中国法律翻译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 2015年9月1日, <http://chinalawtranslate.co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88%91%E6%B3%95%E4%BF%AE%E6%AD%A3%E6%A1%88%EF%BC%88%E4%B9%9D%EF%BC%89/?lang=en>.
58. 尽管有这一变化, 中国律师和国际法律专家认为, 除了共产党档外, 没有任何法律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Bryan Edelman 和 James T. Richardson, “法轮功与法律: 中国法律社会控制动向”, Nova Religio: 《另类和新宗教》杂志6, 第2期(2003年4月): 312–331页; Yiyang Xia, “中国镇压法轮功的不合法性以及对当今法治的影响”, 为欧洲议会听证提供的书面声明, 2009年, http://www.europarl.europa.eu/meetdocs/2009_2014/documents/droi/dv/506_yiyangxia_506_yiyangxia_en.pdf.
59. 例如, 明慧网报导说, 他们2015年对法轮功修炼者审判的记录中(共242例), 律师在48%的案例中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明慧网, “2015年明慧人权报告: 501起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新审判”, 2016年1月20日,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6/1/20/154880.html>.
60. Noakes 和 Ford, “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对法轮功的镇压为什么仍在继续”。
61. 与一名来自黑龙江、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62. Matthew Robertson, “法轮功盼望着一个新中国”, 《大纪元》, 2016年6月30日,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2062536-falun-gong-looks-forward-to-a-new-china/>.
63. 与一名来自天津、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64. 与王友群的访谈, 与一名来自北京、希望匿名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65. Sarah Cook, 《政治局的困境》。
66. 一名经常给警察打电话的受访者解释说, 修炼者们指出这些案例, 向低级警官显示, 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因为犯下这些罪行而带来的后果。“周永康和李东生被清洗对他们震动很大。610办公室最高领导人都被拿下了, 你们还有什么前途?” 与一名希望匿名的法轮功海外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67. Larry Ong, “中国政权不寻常地宣布对‘中国的盖世太保’开始纪检巡查”, 《大纪元》, 2016年7月8日, 2016,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2110591-inspection-of-chinese-gestapo-begins-with-unusual-announcement/>; 林韵诗, “62岁傅政华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财新, 2016年5月9日, <http://archive.is/gQozJ> <http://archive.is/mdWTV>.
68.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第十四巡视组专项巡视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动员会召开”, 2016年7月7日, <http://archive.is/cyFVI>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2110591-inspection-of-chinese-gestapo-begins-with-unusual-announcement/>.
69. 与一名希望匿名的海外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70. 与人权律师A的访谈, 2013年11月。
71.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 “习近平访美之际, 酷刑受害者告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 2015年9月22日, <http://faluninfo.net/article/1323/As-Xi-Jinping-Visits-US-Torture-Victims-Sue-Ex-leader-Jiang-Zemin-in-China/?cid=84>.
72. 与来自北京和上海、希望匿名的多名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 2016年6月。
73. Noakes 和 Ford, “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74. 邓和陈炳玉(音译), 2016年1月14日: 陈炳玉是两名被公交车上散发法轮功材料的被告之一; 公交车和道路录像后来被用来作为指控她的证据。见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 “曹月玲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6年4月26日,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d227f882-f7b3-4118-833f-90049cbb7a0>.
75. 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2008年年度报告”, 2008年10月31日,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

- al-reports/2008-annual-report.
76. 与陈振平的访谈，2016年8月。
 77. Noakes 和 Ford, “路径依赖以及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78. 同上。
 79. 法轮功修炼者使用传统媒介和新技术分享信息，戳穿政府的抹黑宣传，曝光恶行，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使用的传统媒介包括自制传单和短波广播；新技术包括网络翻墙软件、社交媒体应用、和多媒体手机信息等。
 80. Noakes 和 Ford, “路径依赖以及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 “倪某犯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年4月28日，<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ab6a7014-6396-4450-b5af-41f8973eb734>.
 81. 黑龙江省宝清县人民法院, “高某某、姜某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年3月29日，<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dcc49862-5359-449f-b021-93644b91ce12>.
 82. 吉林市昌邑区政府, “昌邑区左家镇开展‘双清’工作”，2016年3月15日，<https://archive.is/R39rP>.
 83.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 “向反宣市说‘不’”，2016年5月12日，<https://archive.is/Vf18t>.
 84. 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5年桂林是境外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整治实施方案”，2015年7月20日，<https://archive.is/Ku2rn>.
 85. 延安市政府采购中心, “中共延安市委610办公室反邪教微电影制作成交公告”，延安市政府网站，2016年4月29日，<https://archive.is/VIYJJ>.
 86. Sarah Cook, 《政治局的困境》。
 87. 东海县牛山街道办事处, “牛山扎实推进无邪教创建”，2014年11月3日，<https://archive.is/U6Re8>.
 88.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共产党发起三年运动，要求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改造’”；Noakes 和 Ford, “路径依赖以及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89.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国家宗教事务局，1982年3月31日，<http://www.sara.gov.cn/zcfg/zc/497.htm>。英语译文见：Donald MacInnis, 《当今中国宗教：政策与实践》(纽约：奥比斯出版社，1989年)，8-26页，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Document_no_19_1982.pdf.
 90. 例如，见下面的连结；剩下的12个在作者的存档中。漳州市政府, “2015年度中共漳州市委610办公室预算说明”，2016年5月27日，<http://archive.is/8OP8e>.
 91. 法轮功及其家人常常报告说遭到当地警察勒索。警察要求修炼者家人缴各种不同的“费”，支付修炼者被带到一个法外“强制改造”中心关押时的住宿费，或者为使修炼者获释而贿赂警察。法轮功修炼者难民报告说，警察抄家寻找法轮功活动的证据时，常常没收个人财产、现金、电子产品等，而且再也不还。法院档案也支持这种说法，常常列出从被告家里查抄走的计算机、电话、打印机等。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需要支付打压成本，而打压被妖魔化的一个少数人群体不需要负责，此外就是中国执法机构普遍存在的腐败。
 92. 一些金钱奖赏和提升是官方许可和鼓励的。法院档案显示，除了判刑外，2016年初，法官还对被抓到练功、外联或进行倡导活动的法轮功修炼者课以一千至两万元不等的罚款。一些地方网站有广告说，向举报法轮功修炼者的居民提供奖赏。那些有效地打压或“转化”修炼者的警察会获得提升和金钱奖赏。相比之下，记者Ian Johnson 详细地记录了，在山东省，当一个地方的法轮功修炼者到北京上访时，省委书记如何向低级官员罚款。这种情况鼓励酷刑，在1999-2000年间导致很多例死亡。Ian Johnson, “死亡陷阱：一个中国城市如何使用酷刑来控制法轮大法”，《华尔街日报》，2000年12月26日，<http://www.pulitzer.org/winners/ian-johnson>.
 93. 对许多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拘押期间强迫劳动是非常普遍的。当出口产品中出现囚犯藏在里面的字条时，这种情况得到了国际注意。尽管中国的许多囚犯（刑事犯和政治犯）被强迫从事劳动，法轮功特别引人注意，因为1999年镇压发生后，监狱里、特别是劳改营里法轮功囚犯人数激增。然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剥削并没有因为近年劳改制度被废除而减少。监狱和看守所都存在强迫劳动，有时候规模比劳改营还大。劳改废除后，大量法轮功案件由法院受理，修炼者不可避免地成为监狱系统较大的一支劳力队伍。
 94. Kilgour 和 Matas, “血淋淋的摘取”；Ethan Gutmann, 《屠杀：大规模杀人，摘取器官，以及中国消除异见的秘密方法》(安姆赫斯特：普罗米修斯出版社，2014年)。
 95. 比如说，A. Sharif, M. Fiatarone Singh, T. Trey, 和 J. Lavee, “从中国死刑犯摘取器官”，《美国器官移植》杂志14, 第10期 (2014年): 2246-2252页，<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ajt.12871/pdf>.
 96. 中国官员在器官来源问题上前后不一，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不透明。例如，中国多年来否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用作器官移植手术。但在更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强迫摘器官的指控出现后，官员在2006年11月又承认，大多数移植手术用的器官来自囚犯。Anna Schecter, “中国承认出售囚犯器官”，The Blotter (博客),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2006年11月27日，http://blogs.abcnews.com/theblotter/2006/11/china_admits_se.html.
 97. 与一名希望匿名的台湾泌尿学家的访谈，2016年6月；与北京一名希望匿名的科技工作者、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北京受访者的朋友把这个高度敏感的事件告诉了他，知道他是法轮功修炼者，用来警示他。
 98. 对话基金会, “中国2013年对2,400人处以死刑”，2014年10月20日，http://duihua.org/wp/?page_id=9270.
 99. A. Sharif, M. Fiatarone Singh, T. Trey, 和 J. Lavee, “从中国死刑犯摘取器官”。
 100. David Kilgour, Ethan Gutmann, David Matas, “血淋淋的摘取/屠杀: 更新版”，2016年6月22日，http://endorganpil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Bloody_Harvest-The_Slaughter-June-23-V2.pdf.
 101. Noakes 和 Ford, “路径依赖以及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102. 见“数据点基础技术”，明慧网，<http://www.minghui.org/mh/fenlei/79/>.
 103. Noakes 和 Ford, “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对法轮功的镇压为什么仍在继续”；与一名希望匿名的上海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04. 与一名希望匿名的法轮功海外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05. 与王友群的访谈；与一名北京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也见Sarah Cook, 《政治局的困境》。
106. 与王友群的访谈，王帮助庞雇了律师。
107. 与一名北京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也见Frank Fang, “原来是官员，现在是打击目标”，《大纪元》，2015年1月25日，<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1220423-once-an-official-now-a-target-in-china/>。
108. 与一名上海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09. 与一名北京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10. 与一名上海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11. Noakes 和 Ford, “管控中国境内的政治反对群体”。
112. 与一名上海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与一名来自天津、目前生活在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4月；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王某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一审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年5月20日，<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7e68a163-05c4-4e67-9b1b-c63bb7bafdde>。
113. Caylan Ford, “传统与异见在中国：退党运动及其对共产党的挑战”，乔治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11日，https://www.allmystery.de/dateien/79056,1337890746,Ford_Caylan2011Tradition_and_Dissent_in_China-The_Tuidang_Movement_and_its_Challenge_to_the_CP_MA-Thesis.pdf。
114. 见来自山东省的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例。这名修炼者因为拥有《九评共产党》和其它明显用于发散的材料而于2016年4月被判处三年徒刑。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王某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一审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年5月20日，<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7e68a163-05c4-4e67-9b1b-c63bb7bafdde>。也见山东省这个因为拥有如何谴责党的指导材料以及其它物品的法轮功修炼者于2016年1月被判三年徒刑的案例：山东省蒙阴县，“张某甲、张某乙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一审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年1月30日，<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bc33df52-ab28-46b9-804a-30f5db18fbc2>。
115. 与一名希望匿名的法轮功海外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16. “2015年明慧人权报告：501起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新审判”，明慧网，2016年1月20日，<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6/1/20/154880.html>。
117. 与一名北京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118. 其中一名受访者描述说，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官员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与一名上海法轮功修炼者的访谈，2016年6月。

建言

本报告所描述的种种事态发展，给中国和国际社会既造成了损失，也提供了机遇。人身伤害、家庭破碎、生命损失几乎每天发生，但是人们也发现了信仰宗教、减少迫害和利益同胞的新途径。

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受到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在这个群体中，按照本研究报告的评估，有估计8千万到1亿2千万的信众属于遭受“严重”或“非常严重”迫害的信仰团体，这凸显了他们迫在眉睫的困境。

如本报告概论部分所述，党国体制与宗教团体关系的远非仅仅局限于一特定的政策领域，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个愈发相互连结的世界，双方的互动及其后果影响超越中国国界。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实现法治、提高言论自由、减少腐败、保障社会稳定和构建真正的民族和谐方面，中国当局没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除非他们能开始放松宗教管制、终止官员免责权和释放宗教犯。事实上，持续不断的打压反而可能违背中共、外国政府和国际人权团体所共同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

与此同时，尽管本报告力图对中国的宗教复兴、打压和反抗提供一个综合性评估，但是有关这个议题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查。

有鉴于此，自由之家敦促中国政府、外国决策者、国际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員立即尽可能地采取下述建议措施：

A. 对中国政府的建言

- **采取更加包容的管制架构。**在法律框架内，采取确立宗教场所的法人地位和放宽登记注册规则等措施，扩大宗教活动空间。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取消宗教场所必须隶属于“爱国协会”的规定，从而可以使更多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佛教和道教寺院庙观，以及像法轮功这样的非正式团体得以合法与公开运作。
- **放开对特定人群参加宗教活动的禁令。**解除对儿童宗教活动的限制，让有关规定符合中国已经批准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解除对新疆和西藏地区一般信众宗教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公务员和教师这样的政府雇员，让他们可以从事伊斯兰教“五功”和藏传佛教日常主要信仰活动。
- **撤回那些严重限制宗教信仰空间的武断决定。**中共的若干宗教政策法律基础薄弱，形成程度不一的打压，并导致了信众的强烈反抗。中共应当考虑撤回这些决定。例如：

- 允许藏人尊崇作为宗教人物的达赖喇嘛。停止在国家媒体对他进行诽谤，停止混淆宗教信仰与政治分裂主义，停止惩罚那些拥有达赖喇嘛画像和教导资料的信众。
- 废除对法轮功的禁令，裁撤凌驾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
- 停止浙江省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允许礼拜场所重新安放被拆除的十字架。
- 解除对信众的国内外旅行限制，包括宗教学习或朝圣。解除对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员前往宗教冲突地点的限制，例如维吾尔和藏人聚居区。
- **释放所有宗教犯。**释放那些仅仅因为和平行使宗教自由和宗教表达权利而遭到监禁的所有个人，包括那些记录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CECC）《政治犯数据库》中的人士。在未来涉及宗教信徒的案件诉讼过程中，给予法官更大的权威来区分和平宗教活动与暴力行为。
- **采取措施停止官员免责权。**按照广泛的司法改革尝试，鼓励法官在涉及宗教违法的案件中，拒绝采纳那些透过酷刑所获得的证据。调查所有酷刑指控，以及所有在被拘押期间或在安全部队手中的可疑死亡案件，起诉本报告所提及的所有非法致死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信守中国作为《反酷刑公约》成员国的承诺，落实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相关建议。
- **停止利用囚犯进行器官移植。**终止所有利用囚犯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促使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际稽核机制，审核器官来源，以证明器官捐赠体系是完全自愿和透明的，而非牺牲死囚犯和宗教犯。为调查这一问题的国际专家提供签证、旅行自由和取得医疗档案和与相关人员对话的途径。

B. 对美国、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建言

- **把宗教自由作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优先考虑事项。**鉴于中国侵害宗教自由的规模和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关注这一问题的共同信仰者，宗教自由问题值得民主国家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交往时予以特别关注。
 - 就落实上文所述建议向中国政府施压。
 - 确保政府各级官员，包括总统或首相，以及各个机构在与中国官员们所有的会谈中既要提出总体上的人权问题，也要特别提到宗教自由问题（在美国，这应该包括来自白宫、国务院、财政部、美国国际发展署和国会的各级官员）。
 - 任命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宗教自由大使。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恶劣和最无孔不入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之一，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老练的外交谈判者。根据过去的经验，那些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受委任者能够更有效地接触中国官员并提出这些敏感问题。
 -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要结合其他重要的人权问题（比如司法改革或言论自由），并且要提到所有相关的宗教团体，慎选语言，避免无意间强化中国政府正当化其宗教限制和诽谤信众的论调。
- **吸引人们关注侵权事件以及这些事件与他国之国家利益的关联。**
 - 强调那些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或迫害的具体个案。前政治犯不断提及当外国官员提出他们的案件时，他们在狱中的待遇会有所改善，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由于这样的干涉而获释。
 - 发表公开宣言和私下外交行动，实时针对当地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
 - 在国会采取行动，包括举行听证会、在议会发表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官员递交公开信以及起草有关立法草案。

- **充分利用前往中国访问的机会。** 在访问中国之前，各国官员（包括总统、首相、其他内阁成员、部长、副部长、联合国特派员、大使和议员等等）应该做到以下事项：
 - 与近期逃离中国的宗教信众会面，聆听他们对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记述，了解紧迫问题。
 - 在筹备与中国省市级官员会面时，利用可以公开获取的资源确定当地宗教自由状况和那些遭遇迫害的当地信众的姓名。这些资源包括自由之家这份报告的附件地图、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以及各人权团体的个别案例报告。
 - 在访问期间或之后，如果该地区宗教迫害有所增加，做好准备进行有力的回应，例如2016年在20国峰会前后出现的基督徒遭迫害案件。
- **加强对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惩处。**
 - 对于那些对宗教信众进行虐待、酷刑和迫害的官员**实施禁止入境和财产制裁**。很多中国官员因私人事务前往美国或欧洲旅行，并在国外银行账户上拥有资金。通过拒发护照和冻结海外资产来惩罚作恶者是一个有效途径，可以确保这些人受到正义的制裁并防范未来的施暴者。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些措施的实施不需要制定额外的法律。例如，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对于那些曾经从事“特别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外国官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美国政府可以拒绝他们入境。
 - **立即搁置或取消中央和地方或是省级官员的正式访问或交换计划**，以响应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
 - 对于美国政府，要按照《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中国继续列为“特别关注国家”（CPC），并根据这项法律施加额外惩罚**。自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即“从事或默许系统性的、持续的恶性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行政部门通常选择不按照《宗教自由法案》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
- **实施多边行动**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国家应当参照最近一份有关中国的广泛人权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对宗教信众的迫害以及部分宗教团体日益恶化的处境。有些国家或许有选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不会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外交部门应该鼓励这些国家参与多边行动。
 - **各国议会间的行动方案：**民主国家的议员们应该就中国宗教自由议题组织进行联合访问，制定共同决议，发表公开声明或信件。
- **资助各类有助于中国宗教信众的项目、政策和研究。**
 - 提供短期紧急资金援助，让宗教信众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获得法律援助，离开中国或满足其他紧急需求。
 - 为那些被迫无限期逃离中国的个人提供必要的长期资金援助，他们当中很多人由于其难民身份而无法工作。
 - 捐款人应该支持那些挑战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计划，包括那些因安全考虑而设在中国境外但影响中国当地情况的计划。
 - 政府机构、跨部门专项工作组、非政府组织、新闻记者和学者们从事的研究活动都需要资助。优先考虑事项可包括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完整记录以及下文所列举的其他领域的调查项目。

- 抵制北京输出迫害宗教少数民族群的企图。
 - 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尤其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层级。
 - 确保全面保护宗教团体中的运动人士之结社和言论自由，尤其在中国高层官员访问期间。
 - 抵制遣返宗教难民回中国的压力，近年来一些政府一再实施这一令人不安的做法，尤其在南亚和东南亚。

C. 对国际民间社会和宗教组织的建言

- 「认领」中国教友，作为舆论和道义支持。中国境外的宗教机构和信众团体应当“认领”那些经审查属实的宗教犯，为那些和他们享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受害者提供精神的、舆论的、甚至是资金上的支持，或是通过对其他宗教的成员予以同样的支持从而达成各宗教团体间的团结一致。这样的协助可以包括每周为受害者进行祷告、给外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写信、为被拘押者家属募集金钱、物资、或所需服务。
- 整合各自为阵的维权努力，共享最佳维权方法。尽管各种专门化的人权倡导是重要的和有效的，但是各种不同的团体可以通过在有共同利益的各种主题上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支持基督徒、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海外团体与中国境内的法轮功追随者应该开展协作项目和维权运动。他们还应该分享那些有效减少国内教友遭受迫害的策略，例如培训草根信众如何在与官员对话时，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或是由海外活动人士致电警方、法庭和检察官，敦促他们释放被拘押的宗教人士。
- 改善对宗教犯和施害者的记录。若干人权组织和海外网站对中国的宗教信众遭拘押和囚禁案件进行监督，但是这些监督努力在不同宗教团体间是不完全和不均衡的，有时还缺乏国际可信度。有些计划方案已经开始对从事恶性虐待活动的中国官员进行身份确认，但是他们的数据库也同样千差万别，可能需要独立查证，而且这些数据不全部是英文的。国际民间社会团体应该填补这样的空缺，并充分利用能够获得的中国政府数据，包括法庭判决，以补充来自草根信众的报告。一个联合数据中心能够整合、研究和公布这些信息。更详实记录犯人和施害者将降低他们的匿名性，改善被拘押者在中国的境遇；给决策者、民间人权倡导团体、学术交流、商业交易和培训项目提供相关信息；强调重大侵害人权事件中的个人责任；给中国镇压机关中的成员提供部分吓阻力。
- 就强制劳动和器官摘除进行联合调查。这两个议题影响到多个信仰团体和经济部门，涉及强大的跨国元素和严重的人权后果。因此，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包括特定的宗教或民族群体、刑事司法、劳工权益和医学——的研究者们进行的联合调查将有助于这两个议题的研究。有关宗教犯被迫从事劳动的调查应当聚焦于2013年废除“劳教”制度以后发生的变化，并设法识别中国良心犯加工销往境外的产品，这类产品的进口在有些国家是非法的。对滥用器官移植的调查应该追踪中国不断扩大的器官移植产业中的器官来源，以确定这些器官在何种程度上是违反捐赠人意志，摘除自不同的宗教犯群体，以及党和政府官员们的卷入程度。
- 为上述及其他计划提供非政府资助。私营基金会、个人慈善家和捐赠机构应当为上述各项提议提供资助，还应该为旨在扩大中国的宗教自由、记录侵害人权案件和反击打压势头的其他各种计划提供资助。鉴于很多团体在中国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一些宗教组织不正规的组织结构，捐赠者应当建立起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资助机制，包括支持那些设立在中国境外但是对境内的情况能产生直接影响的计划。

D. 对学者与新闻记者的建言

- **审慎选择语言和数据源。**当写作有关中国宗教问题时，学者和记者们需要留心他们对官方言论的采用，以免无意中为那些误导和诽谤受迫害群体的宣传背书。他们应该就这些议题征求各种不同的数据源，包括难民们的记述和海外团体的研究成果。尽管各种数据的可信度各有不同，但是在身居中国境外的受迫害宗教团体成员中，以及他们的外国支持者当中，有很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可靠的目击证人和有价值信息的提供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或作品存在固有的偏见而弃之一旁，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并且非常可能限制国际社会对事件真实情况的理解。
- **为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新课题。**除了上文中提到议题，研究和调查报告的主题还包括：
 - **宗教政策：**在2016年实施新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之后，在省级和地方层级，在宗教政策领域和宗教迫害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
 - **经济紧张关系：**尤其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政府的财政诱因和经济开发遭遇宗教限制和抵制，这种状况是否会增加汉传佛教和道教领导人与官方的紧张关系。
 - **天主教：**在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问题显然即将达成协议的背景下，官方与非官方教会受到的不同待遇。
 - **基督教新教：**中国政府对付新教教会的手段变化，包括对政府认可的礼拜场所日益增加的骚扰，在何种程度上会扩散到浙江省以外的地区，并影响先前政教关系相对宽松的其他地区。
 - **藏传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在西藏和维吾尔地区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这种侵权行为是否在持续增加，当地民众作何反应。
 - **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境内处境的变化，包括持续中的大规模侵权现象，政策执行力度不均衡的趋势，以及对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的运动。
 - **新兴宗教运动：**针对新兴或是比较小的宗教团体可能的迫害，由于他们不广为人知和孤立，常常不在外国观察者的视线之内。

Notes

This image shows a full page of blank, lined paper. It features approximately 28 horizontal blue lines spaced evenly across the page, typical of standard notebook paper. The lines are thin and light blue, set against a plain white background. There are no margins,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